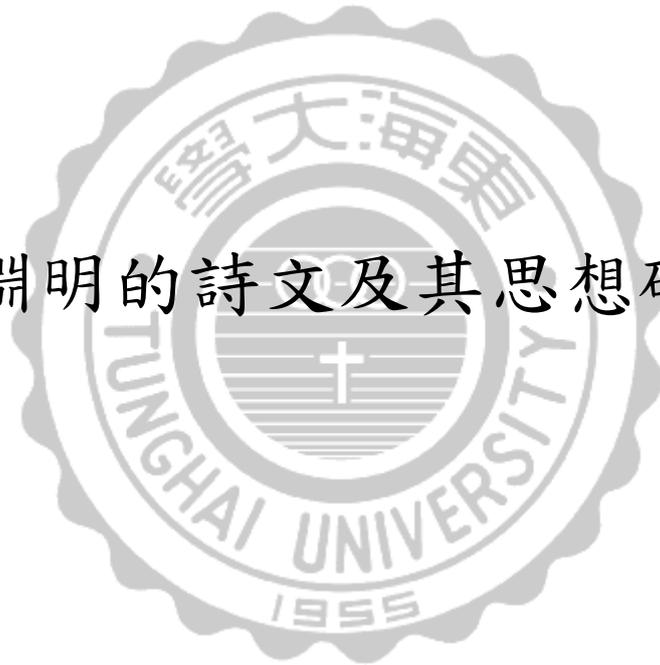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論文

陶淵明的詩文及其思想研究



指導教授：王建生

研究生：張惠琴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摘要

本論文主要為研究陶淵明之作品及其思想，研究方法以三個層面為基要，即「文」、「史」、「思想」。以下分茲說明：「文」即指文學作品本身。在方法上主要以透過對陶淵明詩文作品本身的剖析，從詩風的豪放與平淡、寫作技巧上的諷刺與比喻、詩體結構上的以文為詩，這些文學藝術上的面向都加以討論，並延伸至作品背後的旨意與內涵之解讀。「史」即指對作者以及創作情境的時空背景加以敘述分析。陶淵明為東晉名將陶侃之後，其少年時代多有雄心抱負，欲有所作為。然則中年以後，因為政治環境的改變，個人理想與現實無法調和，陶淵明因而選擇寄情於田園生活，這些都涉及到時代背景對文人的情感與作品的影響。「思想」即指透過後世所累積、陳述的陶淵明形象，探討其文學背後所反映的各種思想，從文本中所蘊含的訊息，以及時人、後人對陶氏詩文的評價，就中分析其作品體現的精神思維。

本文的結論指出，陶淵明的作品呈現出三種性格表現，分別是不屑於官場、率性自然、政治原則。陶淵明其詩飲酒當中亦含田園風景，記田園生活亦兼懷古代隱士高人，懷古幽情亦或在飲酒之際，因此渾然天成；其文大抵多為述志表意之作，或直言之，或假借情景、人物而寄寓之，從中皆可顯現淵明的志趣所在；其思想則受儒、道、佛三家影響而別出一格，對於儒家文化選擇以刻苦的「君子固窮」來實踐己志；對於道家思想則以「復返自然」的態度而有別於當時清談作風；對於佛教教義則或取其詞語入其詩文，以體現自我對生命與世事的感悟。此三者構成了淵明遊於儒、道、佛三家卻獨立自成一家之思想特質。

關鍵字：陶淵明、飲酒詩、固窮、自然、隱士。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
第二節 研究回顧.....	- 2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設計.....	- 12 -
第二章 陶淵明的生平概述.....	- 14 -
第一節 陶淵明的生平.....	- 14 -
第二節 陶淵明的時代背景.....	- 20 -
第三節 小結.....	- 27 -
第三章 陶淵明的詩歌作品分析.....	- 28 -
第一節 飲酒詩.....	- 28 -
第二節 田園詩.....	- 47 -
第三節 詠懷、詠史詩.....	- 55 -
第四節 其他主題的詩.....	- 59 -
第五節 小結.....	- 69 -
第四章 陶淵明的韻散文作品分析.....	- 71 -
第一節 辭賦.....	- 71 -
第二節 記傳文.....	- 89 -
第三節 疏祭文.....	- 100 -
第四節 贊文.....	- 110 -
第五節 小結.....	- 117 -
第五章 從陶淵明詩文看思想態度.....	- 118 -
第一節 儒家的入世思想.....	- 118 -
第二節 道家的自然思想.....	- 121 -
第三節 佛教思想.....	- 126 -
第四節 融合成自我一家的思想.....	- 128 -
第五節 小結.....	- 131 -
第六章 結論.....	- 132 -
參考書目.....	- 136 -
附錄：陶淵明詩文作品繫年.....	- 141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陶淵明是中國古代文學裡第一位以田園詩、隱逸詩著稱的詩人，其詩文作品由於獨樹一幟的清幽閑淡風格，吸引了後人的關注。鍾嶸《詩品》稱讚陶淵明：「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¹陶詩此種風格，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所流行的宮廷詩文相比，後者過於重視形式，無視內容，一味講求詞藻華麗，成為各種冷詞僻語以及典故的堆疊。相形之下，陶淵明的詩文顯露出真實的生命力，從其詩文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在當中呈現出的生平遭遇、人格特性、審美趣味與文學素養，即使到了今天，陶淵明的詩文仍在中國文學裡獨樹一格，佔有一席之地。後代詩人每多讚賞陶淵明詩歌文字所反映的真切情感，甚至產生了專以和對陶詩的「和陶詩」這種的詩體來。因此，陶淵明詩文意象的營造，實在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王叔岷〈論鍾嶸評陶淵明詩〉²一文認為：

陶詩應列上品，固無疑義。惟齊、梁時代之文學界及文學批評界，偏重辭彩之美。陶詩之特點，乃意境之美。辭彩之美，易受賞識。意境之美，難於領會。與鍾氏同時之劉勰，所著《文心雕龍》，為文學批評之寶典。其〈明詩篇〉自詩之定義、起源，評述至劉宋時代之詩，標舉歷代之代表作家，曾無一語涉及陶公，此誠一大疏漏！³

可知儘管陶淵明之詩在當代人眼中較難受到賞識，但是後代對陶詩的意境之美，卻有相當的感同身受，顯見隨時代與文學潮流的發展，陶詩的特點方廣為後世所接受。王氏又云：

¹ 張懷瑾，《鍾嶸詩品評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95-296。

² 王叔岷，〈論鍾嶸評陶淵明詩〉，收於氏著《陶淵明詩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27-538。

³ 王叔岷，〈論鍾嶸評陶淵明詩〉，收於氏著《陶淵明詩箋證稿》，頁528。

陶公退隱田園，故其詩多田家語。然亦不為田家語所限。……其詩不為田家語所限；其人亦不為隱逸詩人所限。⁴

其說甚有發明，揆諸陶淵明的文學作品，自非僅有田園風格之作，而其一生顯然也非隱逸詩人一稱可以況比，因此筆者以為，在分析陶氏詩文作品之特點與意境脈絡後，當從其詩文所反映出的作者思想著眼，探討在各自作品裡陶淵明所顯現出其人格與思想的不同面貌。

第二節 研究回顧

陶淵明詩文的研究至今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本文擇要參考的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三個部分簡略介紹。

一、專書

(一)、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⁵

王氏《證稿》較為接近古人為詩集作注解的形式，其書博採古人注解陶詩文字，並以案語考證陶詩的字辭與評述陶淵明詩意，配合袁氏《箋注》對照，使筆者對陶詩的分析能更為深刻。

(二)、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⁶、《陶淵明研究》⁷

袁氏長期研究陶淵明詩文，其所校注的《陶淵明集箋注》是本文所主要參考的陶淵明詩文文獻的底本。《陶淵明研究》則是袁氏將諸篇與陶淵明詩文相關之研究主題匯集而成的論文集，在分析陶氏詩文背後所蘊含的思想與文學意境時，對筆者頗有參考價值。

⁴ 王叔岷，〈論鍾嶸評陶淵明詩〉，收於氏著《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537。

⁵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⁷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三)、 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⁸

該書論及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地位的高低，作者認為唐代是一個關鍵期，陶淵明之作品，唐代以前由於時代風尚、個人好惡等因素影響，並不為評家所重，唐代以後，風氣改變，愛好之人大增，而陶淵明詩文精妙處，漸為評家所體悟。作者總結陶淵明對後世文學有四點影響，第一點是促成田園詩派的形成與發展。第二點是人品詩品同受仰慕，成為後世效法典型。第三點是賦予後代詩詞曲小說戲劇書法美術新素材。第四點是引起後世極為熱烈之研究風氣。其說相當有見地，可茲參酌。

(四)、 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⁹

該書緒論總論陶詩之文學特質及其歷史評價，主體則分成三個部份。「詩歌專論」部分共五章，主要是宏觀現存陶詩，就其主題內涵，并情懷意境，綜合整理，分專項專題，包括宦遊之嘆、隱居之樂、飢寒之困、無成之悲等，論析陶淵明如何在同類詩歌傳統中創出新境，表現出個人獨特的風格色彩。另外則針對陶淵明之四言詩，論其在《詩經》之後的承傳與開拓。「詩文散論」部分有三章，分別以陶集中屬於比較特殊文類之三篇作品為焦點，就其所代表的不同文類體式之傳統，論析陶作在題材、形式、構思、或旨趣諸方面表現的特色。「詩人綜論」部分有三章，自前人較少注意之角度，觀察陶淵明其人。主要是從陶淵明詩文中流露的，縈繞不去的儒家情結，對生前身後名的關懷，以及其筆下所述日常家居生活中妻子之間的互動關係，分別加以論析。透過作者的分析，可以對陶淵明詩文之獨特風貌，有進一步了解，並對陶淵明既單純又複雜，既灑脫又執著的人格情性，有深一層認識。

(五)、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¹⁰

本書對元代以前的陶淵明詩文作品在各朝代文壇上的評價與流行有著深入

⁸ 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台北：文津，1993年)

⁹ 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台北：允晨文化，2009年)

¹⁰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

的分析研究，其中作者認為宋代是陶氏作品在歷代評價上升至高峰的階段，自宋代以後，陶淵明詩文其形式、詩意、境地不斷被文人模仿、學習，從而確立其文學之地位。

(六)、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¹¹

該書注解形式採先對字詞闡釋白話語意，後附典故考證及補充說明，便於今人閱讀參考。在注解以外，龔氏亦對陶淵明詩文在各個版本中的字詞進行校勘比對，使筆者對陶氏詩文旨趣更有體會與認識。

(七)、 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¹²

該書是作者多年研究魏晉文學與思想的研究成果，對研究魏晉時期中國的文學與思想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例如〈從建安到太康〉一文論述尚情與唯美是魏晉文學演變的關鍵因素；〈陶詩任真說〉一文對釋「任真」為「聽任自然」的說法提出反駁；〈關於魏晉清談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就清談名義、空義及起源三個方面，提出了與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從王弼答裴徽問論魏晉玄學的思想綱領與論述策略〉則從十個方面分析了《世說新語·文學》第八條的內涵，從而論證「援道入儒，融合儒道」這樣的思維，正是魏晉玄學的思想綱領，而王弼的「以無為本，以有為末」及「孔子體無而言有，老子是有而說無」的架構則是魏晉玄學的論述策略。

(八)、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¹³

作者於陶淵明其交遊、年壽等問題皆於書中加以梳理，並辨明陶淵明集之版本，定全書為十卷，一至七卷以宋紹熙三年曾集本為正，八卷以下依元李公煥箋注本，於每一篇題，抉其本旨，辨其年月，復通釋全篇，對眾家之說擇取善者從之。

¹¹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¹² 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

¹³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台北：正文出版社，1999年)

(九)、 王建生《陶謝詩選評注》¹⁴

該書分成「陶淵明詩選評注」與「謝靈運詩選評注」兩部分，皆由「緒論」、「詩選評注」(包含「原詩」、「注釋」、「詩評選輯」、「案」語)等組成，後有相關傳記。「緒論」部分簡介陶、謝兩人的生平家世、時代背景、思想、詩的風格、特色等等。「詩選評注」部分的「注釋」，則註明詩句出處、「詩評選輯」則收錄前人就單篇詩作的看法、評論、「案」語則是作者對於該詩的分析與評論。

(十)、 陶澍《靖節先生集》¹⁵

該書被諸多學者認為是民國以前，在收集資料與校訂上最為詳盡的舊注本。其中所收錄的〈靖節先生年譜考異〉，更是作者花費極大心力考訂出陶淵明歷年行跡與詩文作品之關係，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十一)、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¹⁶

該書以作品繫年為基礎，從而研究陶淵明其人其文。作者將陶淵明的作品分為四個境界：一是猛志逸四海，二是冰炭滿懷抱，三是復得返自然，四是不覺知有我。由此，不僅可知陶淵明的時代環境，更能深入陶淵明的心靈，知其每一時期的意識形態及創作的原動力，以其意識形態來解釋作品，使陶淵明的精神得以活現眼前。

(十二)、 方祖燾《陶潛詩箋註校證論評》¹⁷

該書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明晰，先使讀者讀陶詩，可以由箋註中了解詩義，不再有不解。第二是詳盡，所有有關陶詩的問題，和作者陶淵明的事跡與詩的關係，都詳細敘述校證；對陶詩更有適足的評論，或引據古人，或自己講評，這些都有助於對詩的了解和欣賞。第三是注意欣賞情趣，在書中加了不少插圖，提供

¹⁴ 王建生，《陶謝詩選評注》(台北：秀威資訊，2008年)

¹⁵ (清)陶澍，《靖節先生集》(台北：華正書局，1975年)

¹⁶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

¹⁷ 方祖燾，《陶潛詩箋註校證論評》(台北：蘭臺出版社，1971年)

讀者想像詩境的空間。

二、期刊論文

(一)、簡澤峰〈生的欲求與死的觀照--〈形影神〉的自我辯證與詮說〉¹⁸

該文採取二個進路來解釋〈形影神〉的意旨：其一，說明「形影神」中「神」的確實意涵。其二，以對話的方式進行論辯解說淵明對於「死亡」的態度。作者從第一進路認為：「形影神」的「神」識是以「心」為基礎，強調隨順自然過生活的「神妙」(感應)作用而言的一種境界之詞，「神」識的背後是帶有詩人情感欲求的「心」。說明陶淵明在面對人生最終的死亡課題時，並非如一般所認知的那樣，完全的超然曠達，用冷靜的神識否定了外在形體需求與社會價值的追求，而是了悟的形、影的片面追求不可得，從存在的實有，即肉體出發，順任本心、本性，隨順「自然」而過生活。作者於第二進路則說明：陶淵明看似用對話的方式自我說解、自我說服對於「死亡」的態度，但他始終並沒有真正的消解內心中聲名與死亡的矛盾糾結。尤其透過和其他詩文的相對話，更隱約的看到陶淵明背後的無奈與焦灼。尤其是對於「名聲」的無法忘懷。在「形影神」中更突顯出「影」的特殊性，這證實了許多學者對陶氏之共識，陶淵明詩文表面上的超然曠達、靜穆，並非我們看到的那樣，而是在泰然恬靜的神識下，潛藏著多股思考上的激流，彼此激盪、衝突、糾結著。

(二)、周靜佳〈陶淵明「飲者」形象的建構--由〈五柳先生傳〉談起〉¹⁹

該文先從各篇史傳皆引錄的〈五柳先生〉分析，這篇膾炙人口的「隱者」自

¹⁸ 簡澤峰，〈生的欲求與死的觀照--〈形影神〉的自我辯證與詮說〉，《興大中文學報》(台中：中興大學中文系)，36期(2014年12月)，頁1-32。

¹⁹ 周靜佳，〈陶淵明「飲者」形象的建構--由〈五柳先生傳〉談起〉，《南臺學報》(台南：南臺科技大學)，38卷2期(2013年6月)，頁137-156。

傳，其實以相當篇幅勾畫了「飲者」，使得文中淡泊的隱士更具人間形象，也影響後世「隱者」與「飲者」連結的想像。其次分析史傳中的飲酒軼事，對照後代詩歌用典，足見其流傳之廣，以及陶淵明在後代飲酒文化中的獨特地位。然後再從自得自適的生活趣味，以及妙契自然的生命真性兩點，來談陶淵明如何深化飲酒的內涵。接著分析後代的討論，自蕭統以下，有許多為陶淵明飲酒解釋的文字，另外也有許多效擬陶詩的作品，以飲酒為高情逸趣的表現，開出悠然閒飲的文化意蘊。作者認為無論是極力為陶淵明擺脫酖酒形象，或是慕陶頌酒寄情詠懷，甚或只是醉飲酣歌攀附風雅，陶淵明無疑是將飲者形象帶入一個更具文化深度的重要關鍵人物。

（三）、葉常泓〈「前隱逸」與「後仕宦」的視野遞換--陶淵明宦遊主題中出處記憶的造現〉²⁰

文中指出，陶淵明於壯年十餘載間嘗經「三出四處」之跌宕，而其以宦遊為主題或明確涉及宦遊的詩賦，至今所存有限。作者認為這類作品再現了陶淵明透過若干詭譎多層的修飾技巧、傳播策略及意義建構，而重新編輯、變造的出處記憶。在標示撰於宦遊途中的作品裡，陶淵明立足於「前隱逸」的視野而描述宦遊、追念歸田，將經過正面印象處理後的歸隱記憶，去評估當下的仕宦生活經驗；在標示撰於歸田期間的作品裡，則遞換為立足於「後仕宦」的視野而記敘歸田、回憶宦遊，將經過負面印象處理後的宦遊記憶，去檢定現有的歸隱生活經驗。至於在非出非處的間歇中所撰者，「前隱逸」與「後仕宦」的視野則摺疊共存，且有所調停及消解。考諸歷來陶淵明研究，「記憶如何被書寫」是一個未獲充份釐析的問題。然而，藉由揭示作者化合了原始生動的經驗、記憶，以及狀似原始生動的「經驗」口吻和「記憶」語態，從而形成的「記憶書寫」，我們將得以察見陶淵明如何一再辯解、修飾、平衡其「三出四處」的遊移和不一致，聲明個人向百代隱逸譜系歸位的趨同性，並引導史家與讀者肯認其歸田意志；其次，亦將得以呈顯其較少被後世精讀的宦遊詩和最為人稱頌的田園詩之間，實存在著意蘊上的

²⁰ 葉常泓，〈「前隱逸」與「後仕宦」的視野遞換--陶淵明宦遊主題中出處記憶的造現〉，《中央大學人文學報》（桃園：中央大學），49期（2012年1月），頁149-195。

重合與理路上的鏈接；最後，則得以修正傳統史家及評論者視陶淵明毫無出處矛盾的「經典化」認知。

(四)、劉奕〈五柳與孤松--陶淵明的文化偶像與魏晉風度〉²¹

作者認為，陶淵明與嵇康、孫綽、張湛的關係，是過去學者較少注意的。嵇康其實可以視為陶淵明的「文化偶像」，陶淵明對柳的喜好應源自嵇康；而陶淵明對孫、張二氏大概也心有戚戚焉，他在家園中種松則應是效法二人。正是通過陶淵明，柳樹在後世凝固了隱逸這一意象。也是因為陶淵明，在家園中種松從不吉利的事變成一種風雅行為。通過柳與松的鏈接，也可以較深入透視嵇康等人在文學與思想上對陶淵明產生的具體影響。最後，審視陶淵明與柳和松的關係，也可以附帶肯定〈五柳先生傳〉是其少作這一傳統說法。

(五)、謝君讚〈論《莊子》與陶淵明「自然」思想的異同〉²²

該文指出，《莊子》中的「自然」可歸納為「境界義」、「當然義」、「自是義」三種，其中境界義的「自然」是《莊子》哲學的核心概念。而〈陶淵明集〉中凡四見的「自然」，雖然有些說法是認為它們的義理內容可與《莊子》境界義的「自然」相互對應，然而本文認為「復得返自然」、「質性自然」與「漸進自然」這三處的「自然」，直接依詩文脈絡來看，應當解釋為：氣性之自由、氣質天性之當然而然，以及漸至單純天然等意思，它們與《莊子》境界義的「自然」不太相同。至於「神辨自然」中的「自然」，考量到〈神釋〉中的「神」應屬形而下的層次，與《莊子》形而上的「常心」不同，而陶淵明的飲酒及其酒境，又未必可等同於《莊子》的工夫實踐與體道經驗，加上正式歸隱後的陶淵明，其詩文所透露的心境，又常擺盪在無成與通透兩端之間，明顯與《莊子》「真人」形象有所差距。因此，「神辨自然」中的「自然」，雖帶有「氣化」的內容，然而此一「氣化」應屬「後天型」，而非「先天型」，陶淵明式的委運順化，恐怕帶有相當的自

²¹ 劉奕，〈五柳與孤松--陶淵明的文化偶像與魏晉風度〉，《文與哲》(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27期(2015年12月)，頁103-123。

²² 謝君讚〈論《莊子》與陶淵明「自然」思想的異同〉，《中正漢學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2015：1(2015年6月)，頁61-92。

勉自勵的成份於其中，而與《莊子》終有差異。

(六)、黃世錦〈論陶淵明的〈讀史述九章〉〉²³

該文指出，「述」是古代的一種文體，陶淵明有〈讀史述九章〉之作，此九章不僅詠贊先賢，且兼有述懷之意。歷來對此九章微旨之探索，自宋代蘇東坡《東坡題跋》肇其端，經葛立方《韻語陽秋》，至清代陳沆《詩比興箋》均有所闡發。綜而言之，前人對此九章之研究，或以「時代先後為次」，或用「以類相從」的歸類方式加以討論，然均不免有歸類不當，不能令人滿意的論述侷限。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由〈讀史述九章〉的文本出發，配合《史記》相關紀傳的記載，陶淵明其他詩文中出現過的述贊中人物，互相徵引，針對〈讀史述九章〉的「主題」立論，以探索陶淵明本篇述贊的寓意與微旨。深入探討陶淵明內心幽隱曲折的世界，對淵明本篇讀《史記》「有所感而記之」的述贊篇章，提出一合理的探討與說明。作者將此九章之主題，分為「歌頌高風亮節」、「肯定急流勇退」、「讚美堅貞友誼」、「歎前賢之不遇」、「寓易代之悲涼」等五個主題，加以闡釋陶淵明的情懷。

三、學位論文

(一)、傅怡菁《論陶淵明之思想及其實踐》²⁴

該文著重於探究陶淵明之思想及其在生命當中之實踐。作者認為陶淵明之思想主要為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佛學思想並未在其生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文中著墨不多。陶淵明儒家思想之形成與時代、地域與家學頗有淵源，作者歸納陶淵明之儒家思想有四大特色，分別為尊經重道、兼善濟世、守節固窮與孝悌為本。而關於陶淵明之道家思想，則歸納為委運任化、追慕自然與任真自得三大特色。陶淵明自幼秉承儒教，希冀在東晉亂世中追求個體生命的安頓與政治秩序的重建，

²³ 黃世錦，〈論陶淵明的〈讀史述九章〉〉，《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屏東：屏東教育大學)，37期(2011年9月)，頁1-24。

²⁴ 傅怡菁，《論陶淵明之思想及其實踐》(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年)

以期實踐內聖外王的理想。他實踐儒家思想表現在嚴出處之操、甘固窮之節與肩聖賢之傳三方面。陶淵明身處於玄風大盛的時代，亦受玄學思潮之影響。固然其生命底蘊是積極進取的儒家，但「有志不獲逞」的人生價值失落卻也讓他認清現實，而將生命重心轉向隱居出世，藉由道家思想以涵養內在之本性，他實踐道家思想的表現有三：全性保真、忘懷得失、興致自然。

(二)、 邱俊揚《陶淵明作品中詩人形象及其修辭現象探索》²⁵

該論文指出，陶淵明在其詩文運用了「對偶」、「疊字」、「設問」、「引用」、「借代」、「反復」、「比擬」、「感嘆」、「譬喻」、「映襯」、「摹況」、「誇飾」、「轉品」、「頂真」、「倒裝」、「層遞」、「排比」等十六種修辭格，兼用修辭格也多達五十五種。「對偶」修辭格出現最多，且陶淵明喜歡以「對偶」的形式使用「疊字」，使句子具備整齊之美，增加了綿長靡麗的韻致。「譬喻」則以「歸鳥」、「失群鳥」、「孤雲」、「青松」、「幽蘭」為意象，藉以襯托出自己孤介高潔的人格。此外，運用「常用詞語與獨特詞語」。如「獨」與「孤」與「幽」三字，反映出陶淵明內心的寂寞，更表達了他「知音難覓」的孤獨感。使用「固窮」六次，說明他讚詠古代貧士的「固窮守節」，並以之為典範。「真」字的運用代表陶淵明實踐「任真」的最高境界，因而能夠「傲然自足」、適性自得。「素」字的運用，表達「抱朴守靜」是君子人一生應當堅守的修心原則。「自然」一詞的運用，說明陶淵明的個性是「質性自然」。

(三)、 王雅華《陶淵明思想矛盾及其超越研究》²⁶

該文認為，陶淵明以「田園詩人」、「隱逸詩人」聞名後世，因此後人皆為他瀟灑飄逸的形象所傾倒，但仔細閱讀其作品，或可見其內心的矛盾、痛苦、掙扎。而造成陶淵明思想矛盾的因素則來自時代環境、思想風貌、家世背景和交遊狀況，進而展現在他個人心性、時仕時隱和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上。且與同時代的文人相比，面對相同的困境，陶淵明汲取了前人的經驗而有所超越，為後世的讀書人建

²⁵ 邱俊揚，《陶淵明作品中詩人形象及其修辭現象探索》(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年)

²⁶ 王雅華，《陶淵明思想矛盾及其超越研究》(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立了美好的典範，更可提供現代人另一種解脫痛苦、安頓生命的方法。

(四)、林瑞真《陶淵明的詩歌研究》²⁷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採取歷史分析法，先由史學角度切入當時時代背景，探討政治、社會等外圍因素對陶淵明所造成的影響，在掌握陶淵明相關的背景之後，再由典籍文獻分析陶詩的內容及其特色，掌握其詩歌的特質，接著站在美學角度，探討陶詩之文學藝術表現及其風格，最後透過各代對陶淵明的評價，總結陶淵明的文學地位、價值及其影響。

(五)、黃巧妮《陶淵明飲酒詩之意象研究》²⁸

該文主旨在於探討飲酒詩之基本單位意象與意象群組合，並藉此剖析詩人飲酒時心中的主要情感與思考。該論文第二章探討陶淵明飲酒詩創作之背景。詩人生活在魏晉動蕩之時，政治上呈現新舊勢力交替的現象，其時代思想則處於儒學勢微而玄學、佛學盛行之世，文學上魏晉文學作品中充滿無為遁世的神仙之說，在偏重辭采之美的時代中，陶詩即使深具意境之美，卻不被時人稱揚。然詩人將酒和詩融進生命中，唐宋後，陶學漸受重視；第三章探討飲酒詩之意象，究其飲酒詩中主要意象有酒意象、鳥意象、菊意象、松意象、風意象、雲意象、雨意象，其中鳥意象與菊花意象是則為陶淵明飲酒詩中的特定意象。這些意象呈現出作者在面對亂世時，其心路歷程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充滿壯志，第二個階段主要呈現出當詩人心中仕隱的掙扎，第三個階段則傳達出陶淵明在體認到心中理想終究難以實現之際，轉而追求獨善其身的高潔人格與避世隱逸的生活，並透露出詩人心中不得已而避世的矛盾情懷；第四章探討飲酒詩之意象群，作者認為飲酒詩之意象群有「雲—風」、「菊—松」、「鳥—松」、「菊—酒」、「山—川」、「日—月」等意象群組合。這些意象群組合共同呈現詩人心中隱逸幽情、高潔的人格特質、嚮往田園生活的閒適自在，且抒發對時間生命苦短的憂慮，追求長生不老的渴望；第五章探討飲酒詩意象塑造特色，就字句篇章而言表現技巧是不露痕跡的，須細

²⁷ 林瑞真，《陶淵明的詩歌研究》(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²⁸ 黃巧妮，《陶淵明飲酒詩之意象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細品嚐方能見出真諦。就飲酒詩意象色彩而言，陶淵明飲酒詩中意象色彩是尚「清」、尚「淡」的，是清虛、清淡、清新的。飲酒詩中意象之聲韻組合，則是悠淡的音樂式流動組合。詩中每一個意象像一個音符，都在流動中遞進、飛升。就飲酒詩意象及意象群所表現的內容特色而言，對田園生活的嚮往，是飲酒詩內容的主調。詩人經由意象及意象群的經營表達出嚮往隱居田園的心志，並且歌詠農村生活的美好，並繼承漢末以來組詩的傳統，以組詩形式，來抒發他隱含其內心悲觀的避世思想，並大加歌詠個人理想與懷抱。

(六)、 陳國恩《陶淵明之思想及其田園詩》²⁹

作者認為，一般魏晉隱逸詩中強調的超世絕俗，在陶淵明的田園詩中反見人間化、生活化等主軸。因此陶淵明的思想及其田園詩，不僅拓展了隱逸詩的境界，也為後世崇尚隱逸者，指出一種比較富有人間情味的生活方式，一種並不憤世嫉俗，違抗當代社會的人生理想。陶淵明將人世間的田園農村，取代了過去隱逸者的巖穴山林，成為歌詠隱逸生活，抒發隱逸情懷的主要環境背景。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設計

本研究大致上以袁行霈的《陶淵明集箋注》與《陶淵明研究》作為主要材料，第一章是緒論，概述研究動機、研究回顧、方法等。第二章是概述陶淵明個人的生平狀況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第三章分析陶淵明的詩，我將陶詩依主題分成四個部分，第一節是飲酒詩，《陶淵明集箋注》中冠有「飲酒詩」者計有二十首，其他在詩題上涉及到「酒」的詩尚有數首，也納入該節當中；第二節是田園詩，如「歸園田居」五首，其他涉及農事、田園者亦納入此節中；第三節是詠懷詩，如「擬古詩」九首、「詠貧士」七首等等；第四節則將其他主題的詩作綜合分析。第四章分析陶淵明的文章，依主題分成四類，第一節是辭賦，如「歸去來兮辭」、「感士不遇賦」、「閑情賦」等三篇；第二節是記傳文，如「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等；第三節是疏祭文，如「與子儼等疏」(又名：與子書)、「祭程氏妹文」、

²⁹ 陳國恩，《陶淵明之思想及其田園詩》(玄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

「自祭文」等；第四節是贊文，如「扇上畫贊」、「讀史述」九章等。第五章則從陶氏詩文綜論其思想脈絡，第一節論其儒家的入世思想；第二節論其道家的自然思想；第三節論其佛教思想；第四節論其融合成自我一家的思想。第六章為結論。

本文的研究方法以三個層面為基要，即「文」、「史」、「思想」。以下分茲說明：「文」即指文學作品本身。在方法上主要以透過對陶淵明詩文作品本身的剖析，從詩風的豪放與平淡、寫作技巧上的諷刺與比喻、詩體結構上的以文為詩，這些文學藝術上的面向都加以討論，並延伸至作品背後的旨意與內涵之解讀。「史」即指對作者以及創作情境的時空背景加以敘述分析。陶淵明為東晉名將陶侃之後，其少年時代多有雄心抱負，欲有所作為。然則中年以後，因為政治環境的改變，個人理想與現實無法調和，陶淵明因而選擇寄情於田園生活，這些都涉及到時代背景對文人的情感與作品的影響。「思想」即指透過後世所累積、陳述的陶淵明形象，探討其文學背後所反映的各種思想，從文本中所蘊含的訊息，以及時人、後人對陶氏詩文的評價，就中分析其作品體現的精神思維。因此本文之研究方法係以考據法、文獻法為核心，考據法指的是利用前人對於陶淵明及其詩文作品的研究成果，加以參考並提出筆者對於陶氏詩文的觀點與詮釋；文獻法指的是透過對陶氏詩文不同注箋版本的比對，對作品字句或作者旨趣加以校讎分析。此外尚有情境法，即將自身代入陶淵明的心境中，以使對於陶氏詩文能有更貼近作者意識的瞭解。本文希望透過這些研究方法，期望對於陶淵明其人及其詩文有更為全面且客觀的考察。

第二章 陶淵明的生平概述

陶淵明身逢亂世，處於東晉與南朝宋交接之時。當時政治局勢混亂，因而造成社會動盪不安。淵明雖為東晉名將陶侃之後，但是到陶淵明時已家道中落，不得不投身於基層吏職以求溫飽，然此終違本性，因而最後去職彭澤令後，便不再出仕。陶淵明的詩文與其生平經歷息息相關，正是因為對世間爭名奪利的情況感到灰心，因而選擇歸隱於田園，放情於自然。本章從文獻資料上有關陶淵明的記載，爬梳陶淵明個人的生平歷往，並述論當時的時代背景，以期能夠較客觀地掌握陶淵明詩文創作的的基本情境。

第一節 陶淵明的生平

按陶淵明的生平，正史中有兩筆記載，茲列如下，《晉書·隱逸傳》云：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

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于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¹

《宋書·隱逸傳》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

¹ (唐)房玄齡 等撰，《晉書》(台北市：鼎文書局，民國 69 年)，卷九十四〈隱逸傳〉，頁 2460-2463。

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²

此外，與陶淵明交好的顏延之，亦有〈陶徵士誄并序〉一文，其云：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³

從上述資料可知，陶淵明當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西元 365 年)，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西元 427 年)，享年六十三歲。⁴陶淵明曾祖為東晉名臣陶侃，都八州軍事，封長沙郡公，追贈大司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則不詳其名，史書亦不見記載⁵，可以肯定的是當在陶淵明幼時即已過世⁶，因此文獻上乃云「母老子幼」，陶淵明其母為孟嘉的第四女，孟嘉為東晉名士，曾任征西大將軍，為三國時代吳國司空孟宗之曾孫。陶淵明雖然出身名家之後，但是到了陶淵明的時候已經家道中衰，因此陶淵明年少時代相當貧困，因此顏延之說陶淵明「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袁行霈認為陶氏於二十歲時開始游宦，謀求生計，不過「淵明任州祭酒之前嘗為生活所迫出任低級官吏，詳情已不可考。」

² (梁)沈約，《宋書》(台北市：鼎文書局，民國 69 年)，卷九十三〈隱逸傳〉，頁 2286-2290。

³ (南朝宋)顏延之，〈陶徵士誄并序〉，《文選》卷 58，轉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合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1-2。

⁴ 袁行霈以為陶淵明享年當七十六歲，生於晉穆帝永和八年(西元 352 年)，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其考證可備一說，見氏著《陶淵明研究》，頁 259-280。

⁵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 259。

⁶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 282。

⁷因此史傳上所云陶淵明任州祭酒，當是陶氏可見最早的正式職官，自陶淵明二十九歲開始，其曾五度出仕：第一次起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幕府；第三次為鎮軍參軍；第四次為建威參軍；第五次任彭澤縣令。⁸出任職官是陶淵明人生中最精華的青壯年時期，也是生活最複雜的時期。這時期的仕宦經歷對陶淵明往後思想形成具有極大的影響。

陶淵明出仕，是為實踐傳統儒家士大夫的使命，肩負家族優良傳統的責任，另一方面當然也是為了家裡的生計。他走出寧靜的書齋，步入複雜的官場，這種轉變讓他適應不良。因為官場文化與他質樸純真的本性差異太大，因此一陣子之後他便解官歸家了。即便後來有機會出任主簿，他也不就。回家親自下田耕種以自給，稱病推託。袁行霈謂「不堪吏職」乃指不堪其職務繁多，其引《宋書·百官志》云：「祭酒分掌諸兵、賊、倉、戶、水、鎧之屬。」⁹東晉末年其制度當與南朝宋相去不遠，可見祭酒一職勞務甚多，位卑事繁，因此或許陶淵明才萌生辭官之意。而主簿與祭酒亦皆事繁之吏官，因此陶淵明不肯屈就，是以拒絕徵任。

後東晉時局大亂，當時朝政腐敗黑暗，晉安帝昏庸無能，而會稽王司馬道子因受皇室重視，握有大權，但是其結黨營私反使東晉步入衰亡。《晉書·刑法志》云：「孝武時，會稽王司馬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¹⁰終而引發全國性的叛變，《晉書·安帝紀》云：「(隆安二年) 秋七月，慕容寶子盛斬蘭汗，僭稱長樂王，攝天子位。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¹¹桓玄與司馬道子兩次抗衡後，占據全國三分之二的地盤，勢力龐大。桓玄打著擁戴晉王朝、反對司馬道子的旗號，儼然成為對抗司馬道子的盟主。且桓玄本人氣質與才學俱佳，也使得文士願意接近他並為之所用。處在這種局勢之下的陶淵明，欲有一番建樹，自然選擇為桓玄效力，遂於晉安帝隆安二年加入桓玄的幕僚團。然而隨著軍事行動節節推進，桓玄逐漸暴露出欲取東晉而代之的狼子野心，陶淵明看出了這態勢，自然不肯再繼續追隨他。

⁷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 288。

⁸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 78。

⁹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 294。

¹⁰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頁 916。

¹¹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頁 250。

晉安帝元興二年(西元 403 年)十二月桓玄篡晉，稱楚，幽禁晉安帝於潯陽。次年二月劉裕率眾討伐桓玄，三月進入建康，進號鎮軍將軍，都督揚、徐等八州諸軍事，掌握國家大權。劉裕為人「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二三日間，風俗頓改。」¹²因此贏得軍民的擁護，加之他打著反對桓玄篡位、恢復晉朝王室的旗號，師出有名，廣得人心，在兩三個月內就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一時之間給國家帶來新的希望。同時劉裕也很注重延攬文武人才，名士陶淵明成為被徵招的對象之一。此時陶淵明眼見國家陷入危難，深感憤慨失望。而一股撥亂反正的勢力興起，正是應該有所作為的時機，於是在元興三年(西元 404 年)三月，陶淵明加入鎮軍將軍劉裕麾下，出任參軍一職。至晉安帝義熙元年(西元 405 年)三月，陶淵明改任建威參軍，他任劉裕參軍頂多一年的時間。陶淵明對劉裕能興兵討平桓玄本來頗為認同，但時日一久，看到劉裕剪除異己、殺害功臣的殘忍面目，令曾經身為桓玄幕府的陶淵明深感自危。加上身為參軍，只是幕府中的顧問職，很難在軍事上有何建樹。這使本來就不是很情願出仕，且性情過於剛直的陶淵明，一心想要抽身離開這是非之地。他採取了一種過渡的方法，先改任建威劉敬宣的參軍，再求為彭澤令，最後找機會辭官歸隱。基於以上種種原因，陶淵明離開鎮軍參軍一職。

劉裕大殺功臣，令陶淵明萌生退意。義熙元年(西元 405 年)三月，陶淵明轉任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¹³劉敬宣是劉牢之之子，劉牢之曾是劉裕的上司，在先前討伐孫恩之亂時劉敬宣救過劉裕，因此受劉裕重用，任命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自知不是劉裕嫡系，且身為北府軍領袖劉牢之的兒子，深怕受到劉裕猜忌而面臨殺身之禍，所以當劉裕任命他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時，他曾請辭。任職建威將軍後，果然受到劉裕心腹劉毅的流言攻擊，令他更加不安，於是趁義熙元年三月(西元 405 年)晉安帝自江陵反正的機會，上表自請解職，終於獲得允許。陶淵明正肩負了為建威將軍上表慶賀復位，或為劉敬宣上表解職的使命。¹⁴陶淵明曾任劉裕參軍，又是沒有權力欲的人，擔任這份工作正是再適合不過的人選。且若劉敬宣解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一職，陶淵明便可順勢解除參

¹² (梁)沈約，《宋書》，頁 9。

¹³ 此建威將軍由來有二說，一說是劉懷肅，其據《晉書·桓玄傳》所云；一說是劉敬宣，其據《宋書·劉敬宣傳》所云。按袁行霽考證，建威將軍當指劉敬宣，見氏著《陶淵明研究》，頁 97-98。

¹⁴ 袁行霽，《陶淵明研究》，頁 94。

軍一職。義熙元年（西元 405 年）三月底，建威將軍劉敬宣離職改授為宣城内史，陶淵明也就順理成章辭去軍職，如願以償回到故鄉。同年八月，陶淵明得到時任太常卿的叔父陶夔舉薦，出任離家未遠的彭澤縣令。雖然縣令一職遠離政治風暴的核心，看似平淡安穩，但是只要身在官場便不可能隨心所欲。在龐大的官僚體系中，陶淵明必須違逆本性作一些降低格調的事，但這又不是性情剛直的他所能忍受的。《宋書·隱逸傳》云：「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¹⁵在不願為微薄薪俸出賣人格的堅持之下，陶淵明在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任期僅八十一天。此後陶淵明不再謀求官職，以薄田農事為生，或受友人予以經濟上的接濟。

陶淵明生性淡泊，不慕名利，雖為東晉名臣陶侃之後，但是對於官場生活始終不能適應，也因此他在卸職彭澤令之後，過著長達二十幾年的隱居生活，從此不再仕官。即便如江州刺史王弘，想要以正式會面方式認識陶淵明，也不得其門而入。主要的原因大概在於正式會面恐怕免不了官場禮儀之類的俗事，況且陶淵明可能也認為王弘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著想要認識朋友的旗號，而或許又是一種變相的遊說陶淵明出來任官。乃至於王弘必須設法表達他的誠意，事實上最後也證明王弘確實是出於友誼與陶淵明結交。陶淵明在史書上的傳記資料透露出他在性格上的三種表現：第一種是他的不屑官場。在他說道他不願為了區區五斗米的薪餉就向官場文化屈服時，陶淵明恐怕是中國文人裡第一個這麼說也這麼做的人，他的事蹟讓後代文人在仕途不順或厭倦官場文化時，得以擁有一種精神上的支持與奧援。第二種則是他的率性真實，陶淵明過著隱居生活並不是矯情以博取高名，也非圖謀所謂終南捷徑，別人帶著酒來拜訪他，他喝完睏了想睡覺，就直接趕客人回去。他的官員朋友來拜訪他，他也不違本性只是順著自己愛喝酒的性格行事，在精神上全然地無拘無束逍遙自由，而這也是後代文人在尋求烏托邦式的典型人物指標時，不由得就會想到陶淵明，期盼自己在生活上也能或多或少仿效他，這也是陶淵明備受推崇的原因之一。第三種，是他的政治認同原則。陶淵明在南朝劉宋取代東晉王室之後，就不再以新的政權的年號用以紀事，只採天干地支的方式記錄。這項特點說明陶淵明是一個雖在隱居但是仍有自己價值標準，

¹⁵ (梁)沈約，《宋書》，頁 2287。

他不認同新政權不肯改換年號，而這樣的風範正如同改朝換代之後的遺民一樣，遺民未必認同新的王朝，因此他們以很多方式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諸如不仕官、不用新年號等，從這點來看，陶淵明可說是一種典型人物，與其詩作唱和，其實也正好反映出自己的堅持與不苟俗流。袁行霈將陶淵明的風流性格總結為「簡約玄淡，不滯於物」¹⁶，反映出陶淵明所以能不屑官場，主要也是率性所致，因為率性所以難以適應虛偽的官場仕途，渴望純樸無爭的自然田園生活，從這點來說，不屑官場與率性真實是一體兩面的。此外，對於陶淵明晚年不書劉宋年號的事情，袁行霈認為存在兩種解釋，一種是忠憤說，認為陶淵明因為忠於晉室，對於劉裕篡晉一事深感不滿；另一種則是認為陶淵明並不存在忠憤的動機，只是忠於自然不問政治之事。¹⁷陶淵明的想法是一回事，而他作品的讀者群的想法又是另一回事，像《宋書》的作者沈約認為陶淵明是出於忠臣之心而有這些行為，蕭統也在〈陶淵明傳〉中因襲之¹⁸，這是沈約等人解讀陶淵明作品的態度，而這樣的態度當然也容易發生在改朝換代的時候，文人需要一些象徵與符號來寄託他們的情緒而使之與我共鳴。古代即有詠史詩的傳統，而陶淵明的隱逸詩自然也被後代作為一種歌詠自然、田園、歸隱、不貳等等不同主題意義的共鳴素材了。

第二節 陶淵明的時代背景

陶淵明身處東晉與劉宋相交的動盪時代，除了政治上時局混亂，兵戈不止之外，在學術思想上該時代也面臨到許多文化衝擊，以下將以政治層面以及思想層面兩部分概述之：

一、政治層面

偏安江左的東晉政權，可以說自建立以來就綱紀不振，朝政昏聩，內憂外患連綿不絕。中葉以後，不僅皇權不具權威，門閥世族政治亦呈現敗落之勢。雖有謝安等人苦心護衛，僅能保持朝政於某種短暫的平衡，淝水戰役中取得空前的勝

¹⁶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 52。

¹⁷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 103-104。

¹⁸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頁 103。

利後，隨著謝安受譖被排擠和司馬道子父子專權，晉孝武帝（西元 373 年）統治後期，東晉政治已如風中殘燭，隨時熄滅。《晉書·刑法志》云：

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貊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昏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¹⁹

在淝水戰役之後，東晉聲勢一度大振，可惜好景不常，謝安受到司馬道子、王國寶等人中傷排擠，為避禍而離開朝廷出鎮廣陵，終於憂懼而卒。隨著謝安病逝，東晉戰勝的榮景曇花一現，即不復存在。太元十四年（西元 389 年）以來孝武帝及司馬道子皆耽溺酒色，日夜酣歌，又親近僧尼，崇尚浮屠，以致朝政無主，政風大壞，而王國寶等邪佞黨同伐異，使朝政又陷入混亂。之後政治危機持續發展，孝武帝與會稽王司馬道子之間的權力爭鬥日漸惡化，雙方各引親信，朋黨競起。《晉書·列傳第三十四·簡文三子傳》云

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為務，媾姆尼僧，尤為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總錄，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²⁰

孝武帝死後，年幼的安帝（西元 397 年）即位，政權旁落於司法道子手中，不久引發王恭、殷仲堪、桓玄等大臣相繼起兵反對。戰亂由其子司馬元顯平定，其後政事皆由司馬元顯執掌。但司馬元顯貪婪腐敗，聚斂錢財，驕傲自大，敗壞朝綱，引發孫恩叛亂，也激化了與桓玄間的矛盾。元興元年（西元 402 年）司馬元顯討伐桓玄，卻因劉牢之倒戈而為桓玄所殺。次年桓玄廢安帝代晉自立，建立桓楚政權，東晉國祚至此中斷。

桓玄在位的時間並不長，元興三年（西元 404 年）二月劉裕起兵討伐桓玄，五月桓玄兵敗被殺。劉裕在孫恩之亂中展現軍事才能，加上發起義軍擊敗篡位的

¹⁹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頁 916。

²⁰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頁 1733。

桓玄，恢復東晉政權，因此憑藉軍功獲得極高名望，並在不久之後掌握朝權。劉裕接著消滅了劉毅、諸葛長民及司馬休之等異己，鞏固了在東晉國內的地位。此後十幾年間，他討平盤踞成都的譙縱，消滅南據廣州的盧循，又趁後秦內亂而北伐，收復了長期為異族統治的關中及黃河以南廣大地區。義熙十四年（西元 418 年），劉裕縊死晉安帝，立安帝之弟司馬德文為恭帝，並於次年自行加爵為宋王，《宋書·武帝紀》云：

元熙元年（西元 419 年）正月，詔遣大使徵公入輔。又申前命，進公爵為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宋國。七月，乃受命，赦國內五歲刑以下。遷都壽陽。以尚書劉懷慎為北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解揚州。²¹

後劉裕接受晉恭帝禪讓，篡奪了東晉政權，立國號宋，改元永初，是為宋武帝，東晉便正式宣告滅亡。《宋書·武帝紀》云：「(元熙)二年（西元 420 年）四月，徵(宋)王入輔。六月，至京師。晉帝禪位于王」²²然而劉裕稱帝仍不放心已為零陵王的恭帝，便派人刺殺他，《晉書·恭帝紀》云：

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為詔。甲子，遂遜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西元 421 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諡恭皇帝，葬沖平陵。²³

劉裕派傅亮要求恭帝遜位，而劉裕以帝為零陵王，雖有褚后侍候、保護，仍然躲不過劉裕派來的殺手。由此可見當時政治鬥爭之慘烈，在這樣的情況下，陶淵明抑或因此對政治感到絕望，從而萌生退意，不再捲入紛爭中。

²¹ (梁)沈約，《宋書》，頁 45。

²² (梁)沈約，《宋書》，頁 45。

²³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頁 269。

二、思想層面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學術思想界面臨三種情況的衝擊，其一是儒學衰微，其二是道家清談的盛行，其三是佛學的傳入。

(一)、 儒學衰微

皮錫瑞《經學歷史》云：

經學盛於漢；漢亡而經學衰。桓、靈之間，黨禍兩見，志士仁人，多填牢戶，文人學士，亦扞文網；固已士氣頹喪而儒風寂寥矣。鄭君康成，以博聞強記之才，兼高節卓行之美，著書滿家，從學盈萬。當時莫不仰望，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自來經師未有若鄭君之盛者也。然而木鐸行教，卒入河海而逃；蘭陵傳經，無救焚坑之禍；鄭學雖盛，而漢學終衰。……孔安國《尚書傳》，王肅偽作；王弼《易注》；何晏《論語集解》；凡三經，皆魏人注。杜預《左傳集解》；范寧《穀梁集解》；郭璞《爾雅注》；凡三經，皆晉人注。以注而論，魏、晉似不讓漢人矣；而魏、晉人注卒不能及漢者：孔《傳》多同王肅，孔《疏》已有此疑；宋吳棫與朱子及近人閻若璩、惠棟歷詆其失，以為偽作；丁晏《尚書餘論》，攷定其書實出王肅。據《晉書·荀崧傳》，崧疏稱武帝時置博士，已有孔氏，是晉初已立學。永嘉之亂亡失，東晉時梅頤復獻之，非梅頤偽作也。王弼、何晏祖尚玄虛，范寧常論其罪浮於桀、紂。王弼《易注》，空談名理，與漢儒樸實說經不似；故宋趙師秀云：「輔嗣《易》行無漢學。」何晏《論語集解》合包、周之《魯論》，孔、馬之《古論》，而雜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偽書；如「孰謂鄴人之子知禮乎」，孔註「鄴，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不自稱幾世祖，此大可疑者。丁晏謂孔注亦王肅偽作。杜預《左傳集解》多據前人說解，而沒其名，後人疑其杜撰。諒闇短喪，倡為邪說。《釋例》於「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一條，亟揚其波。鄭伯射王中肩之類，曲為出脫。焦循論預背父黨篡之罪，謂為司馬氏飾，

其注多傷名教，不可為訓。²⁴范寧《穀梁集解》，雖存《穀梁》舊說，而不專主一家。序於三傳皆加詆譏，宋人謂其最公。此與宋人門徑合耳；若漢時，三傳各守顯門，未有兼采三傳者也。郭璞《爾雅注》亦沒前人說解之名，余蕭客謂為攘善無恥。此皆魏、晉人所註經，準以漢人著述體例，大有逕庭，不止商、周之判。蓋一壞於三國之分鼎，再壞於五胡之亂華，雖緒論略傳，而宗風已墜矣。²⁵

皮氏所云，漢時，三傳各守顯門。而永嘉以後，王弼《易注》，空談玄理，何晏《論語集解》，引孔、馬之論，所引孔注，為偽書。郭璞《爾雅注》沒前人之說。基於學術來看待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攘善無恥」「其注多傷名教，不可為訓」適足以說明當時儒學的衰微情況，注經本是發揚先聖前賢經世濟民理念的一種表現方式，但是至其時已淪為替政治開脫辯護的手段。風氣演變至此，無怪乎儒學在當時欲振乏力。

(二)、 道家清談的盛行

自曹魏西晉時代的何晏、向秀、郭璞等學者大倡《老子》、《莊子》，並發展為玄學以後，道家思想在魏晉時代一直是蓬勃發展的。至於東晉時代，玄學清談之風仍十分流行，陳慶元認為：

東晉玄學之所以被視為是玄學理論的尾聲，主要還是因為對於宇宙本體的探討歷經何、王的貴無到向、郭的獨化自生說，理論的建立已經沒有再發展的空間所致。但東晉玄學的討論重心，並不在本體論的拓展，而是在偏安江左的現實情況和心態下，對前人的理論有所取捨，進而給名教更為合理且穩固的地位。而在名教與自然的討論中，東晉士人也往往藉此以凸顯

²⁴ 清代焦循《春秋左傳補疏》〈自序〉謂晉代杜預其父杜恕與司馬懿不合，遭後者幽禁而死，杜預自身也因此仕途不順。後司馬昭為網羅名士支持司馬家，遂將己妹嫁予杜預，杜預於是忘父仇而竭忠於司馬氏。杜預為了掩飾司馬氏弑主之行，於是作《左氏春秋集解》。案焦循所言，深以杜預《集解》乖離漢儒師說家學，乃論其生平處事，以為杜預所以如此，是為了飾司馬氏之過，故對經書有所曲說。皮氏從焦說，由此以為魏晉經學儒者其風骨不如兩漢。見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注釋十八，頁168。

²⁵ (清)皮錫瑞，周予同 注釋，《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41-164。

其名士身份。所以在名教與自然關係的討論上，東晉玄學有著與前代玄學更不一樣的特色和成果。……東晉士人在很多時候表現的曠達行為，其實只是掩飾在因環境不安導致恐懼生命消逝而生的縱欲享樂心理，然後以曠達的外表掩飾這樣的心理。在這樣的心態下，崇尚自然的言行自然不能免。

26

而這樣的心態所鑄造的士人玄學清談的風貌，亦非真正的崇尚自然，《世說新語》記載了一個故事：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²⁷

桓溫不計惠帝誤國，仍以「子繼父業」為重，可見名教的維繫仍是東晉士人十分重視的。因此陳慶元以為「東晉玄學中關於自然與名教之辨，名教始終是保持著優勢的，雖然在很多情況下玄學家們看似將名教與自然合一，但那也只不過是在彰顯自己的曠達。整個政治環境與經濟條件都不允許既得利益的士族回到嵇康式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路子上，他們只能承繼郭象的說法，而心態上又比郭象更向名教靠攏了，因為他們必須靠名教來維繫他們的身家性命，不容許過份的曠達（自然）毀了秩序。」²⁸也因此若將陶淵明與同時代的東晉名士之流相比，或許其部分思想皆有道家脈絡之影響，然而其所體現出來的心態卻是有別：

或許我們可以說，陶淵明的確受到了西晉以降莊學復興的影響，但他的寒士身份使得他不會趨近郭象而更近於原始莊子學說。……陶淵明的行徑與心態可說是東晉士人中的一個異類，他不像大部分的東晉名士那樣刻意表現曠達，實際上卻是為自己的欲望找藉口，他的矛盾反覆以及安於田園正可看出他的真誠。他雖非一嚴格定義上的思想家，但我們卻可從他身上看

²⁶ 陳慶元，《東晉士人階層玄佛道思想與文化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8年），頁75-76。

²⁷（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堦著，《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83-284。

²⁸ 陳慶元，《東晉士人階層玄佛道思想與文化研究》，頁89。

到眾家思想的影子。²⁹

因此我們對於陶淵明在文學作品中所展現的思想氛圍，除了時代、環境的因素外，也應當考慮到個人的獨特性。

(三)、佛學的傳入

佛教思想自東漢中葉傳入中土，歷經漢末、魏代至西晉初之譯經、講經階段，再歷西晉末、東晉初之「格義」佛學風氣，而到東晉中期佛學界推出了「六家七宗」之解空流別，可謂波瀾壯闊。其中尤以大乘空宗之思想日漸興顯，再經東晉末鳩摩羅什入長安，大量翻譯大小乘經、論數十部，其中有數部是針對漢末支讖、吳支謙、西晉竺法護等人所譯經典有所謬失而重新翻譯者，譯講之時並順勢宣揚其「畢竟空」之宗義，大乘空宗儼然躍居中土佛學之主流。適時江西廬山有一位法師慧遠提倡回歸印度本土佛教之運動，除主張印度原始及部派佛教教義皆應認識之外，還宣揚彌勒淨土之信仰與修行實踐，並在廬山結「蓮社」，倡導一種生時崇拜淨土諸佛、死後轉生兜率天之思想，網羅不少當時僧俗兩方之高士參與，一時之間頗具影響。事實上，佛教在東晉時期的發展，藉助了與中國社會中的士大夫階層之交流，擴大其影響層面，甚至使僧人加入士大夫流行的清談活動，而當時東晉世家貴族也往往資助佛教僧人，從而使佛教的譯經事業、寺廟建築得以獲得發展。³⁰

陶淵明與佛教僧人之往來，在《蓮社高賢傳》當中的一則記載：

(陶淵明)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³¹

可知陶淵明與佛教或許有一定程度的聯繫。陳寅恪謂：「淵明……其種姓出於世奉天師道之溪族，其關於道家自然之說別有進一步之創解，宜其於同時同地慧遠諸佛教徒之學說竟若充耳不聞也。」³²或有稍嫌武斷，平心而論，縱使陶淵明不喜

²⁹ 陳慶元，《東晉士人階層玄佛道思想與文化研究》，頁 201-202。

³⁰ (荷)許里和，《佛教征服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99。

³¹ 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合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上編》，頁 11。

³²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收於《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

佛教而尚道家，但是佛教在東晉時代其發展已屬可觀，陶淵明亦或與佛教僧人有所接觸，因此其文學作品之與佛教思想的關係，或仍有待進一步考察。

第三節 小結

陶淵明在史書上的傳記資料透露出他在性格上的三種表現：不屑官場、率性真實，以及其政治認同原則。陶淵明在南朝劉宋取代東晉王室之後，就不再以新的政權的年號用以紀事，只採天干地支的方式記錄。這項特點說明陶淵明是一個雖處隱逸，但是仍有自己價值標準，他不認同新政權不肯改換年號，而這樣的風範正如同改朝換代之後的遺民一樣，遺民未必認同新的王朝，因此他們以很多方式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諸如不仕官、不用新年號等，從這點來看，陶淵明可說是一種典型人物，與其詩作唱和，其實也正好反映出自己的堅持與不苟俗流。淵明性格可謂「簡約玄淡，不滯於物」，反映出其所以能不屑官場，主要也是率性所致，因為率性所以難以適應虛偽的官場仕途，渴望純樸無爭的自然田園生活，從這點來說，不屑官場與率性真實是一體兩面的。

當時的時代背景，在政治上反映的是東晉宗室昏庸腐敗，而大臣將領各有其野心企圖，因此或有對外征伐，或為內部的權力鬥爭，淵明雖然少有雄心，欲以儒家之濟世精神有所作為，但面臨險峻的官場情勢，最終選擇歸隱於田園，與自然為伍。就其時代之思想而言，淵明少時所研習之儒家思想，在東晉末年已呈衰微之勢，當時士人之間流行的是玄學清談與道家思想，淵明在崇尚自然、歸於本性的性格上，與道家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此外，當時佛教在中國已稍流行，從文獻亦可得知淵明與當時蓮社僧人或有來往，因此其詩文與佛教思想之間，或有一定程度之聯繫。

第三章 陶淵明的詩歌作品分析

本章的主題為探討分析陶淵明的詩歌作品，在分類上筆者分為四個部分討論。第一部分為與飲酒相關之詩作，這類作品透過飲酒呈現出淵明性格上任真自得的面貌；第二部分是田園詩，淵明與當時隱逸詩傳統不同，其所選擇隱逸的場域是農民之田園，而非高士之深山，因此這類作品反映出淵明與鄰人互動的自然情境，開創出新的隱逸詩風格；第三部分是詠懷、詠史詩，淵明承襲過去詩人的詠懷傳統，表現出其對過去歷史人物的想法，這類作品反映出淵明自我理想典範的投射；第四部分是其他類型的主題，或為因事而以詩記之，或為讀書感想而以詩記之，或無特定主題而作之者，筆者將其歸納於此類中。

第一節 飲酒詩

飲酒是古來文人的嗜好，尤其淵明。在《宋書·隱逸傳》有：「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陶)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¹可知，有酒喝，要與淵明談話就容易了。

在陶淵明的詩作當中，「酒」自是當中一個重要的象徵物，如以酒命題的〈飲酒〉二十首、〈止酒〉、〈述酒〉，或詩題與飲酒行為相關，如〈連雨獨飲〉，或詩文內容與飲酒關係密切，如〈九日閑居〉與〈己酉歲九月九日〉皆是在重陽日飲酒、〈蜡日〉則於歲末飲酒等等，或於序文中顯露出酒作為詩意起因，如〈停雲〉。筆者將這些詩作歸於飲酒詩一類加以討論分析，除〈述酒〉一詩其與飲酒之關係較不強烈以外，總合而論，此類作品多是因酒起意，飲酒為樂之作，計有二十七首，以下逐首分析。

〈飲酒〉二十首可說是陶淵明在飲酒詩上的代表作，其序文云：「余閒居寡歡，兼秋夜已長²，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

¹ (梁)沈約，《宋書》，頁 2288。

² 「秋夜」或作「比夜」，「比」為近意，猶言近來。袁行霈、王叔岷皆以為作「秋夜」於義較勝，今從之。見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35-236、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274。

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³可知此二十首詩是陶淵明酒後興來寫下的，袁行霈以為這二十首詩皆同一年秋季所寫，大約是在晉、宋交替之際，即晉安帝義熙十三年(西元 417 年)⁴。此外，葉嘉瑩對〈飲酒詩〉所作題解十分精闢，其云：「(陶淵明)的酒來源都是很不平常，很不簡單的。我們說陶淵明雖然是把他們送來的酒喝了，但是當陶淵明喝著這些並不平常、並不簡單，甚至可以說是大有來頭的酒時，他怎麼能不想到那些送酒人的『忠告』與『要求』呢？而這些『忠告』與『要求』所涉及的又全都是人生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陶淵明這二十首詩題為『飲酒』，而實為探索思考人生的原因所在。而這一結論的推導又正是因其序文中『偶有名酒』引出來的。」⁵可見酒在淵明的〈飲酒詩〉中提供了重要的解讀線索。以下茲就〈飲酒詩〉二十首作一析論。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飲酒詩〉其一)⁶

袁行霈認為此詩：「既已參透天道與人道，故不以一己之窮達為意，而能安貧守拙，躬耕自樂。此詩語調平靜、通達、自信。」⁷袁氏點出陶詩主軸在於不以自己的窮困或發達來衡量自己的人生，就像邵生一樣。邵生即邵平，他是秦代的東寧侯，原本是種瓜農家出生，後來因有戰功得晉身為貴族，秦代滅亡後，邵平身窮而無以為繼，乃在長安城重拾舊業，種瓜、賣瓜。所賣瓜果香甜，又一時聞名，時人稱之為「東寧瓜」。而陶淵明用邵平典故，正是要說明「衰榮無定在」的道理，與人「禍福無常」的道理是一樣的，因此人生只要能安貧樂道，也就能知足常樂，濁酒談笑間了。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詩〉其二)⁸

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35。

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36-237。

⁵ 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45。

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39。

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40。

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40。

此詩對善惡有報提出強烈疑問，直如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所云：「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⁹陶淵明在詩中對於善惡行為往往沒有獲得應有的應報，感到相當憤慨，然而詩末仍以固窮氣節對己勉勵，固窮一詞出於《論語》所謂「君子固窮」，其意猶言安貧。「九十行帶索」是化用《列子》中的人物榮啟期為典故，龔斌釋詩意云：「言榮啟期行年九十尚以貧為樂，何況飢寒中之壯年者。意謂壯年者更應處貧猶樂。」¹⁰葉嘉瑩云：「儒家的操守是從不計較善惡的報應的，稱天道是不可信的，就像是為善的不一定能有善報，那麼你就因而不行善了嗎？要知道，我們不是為了『報』才去『善』的，這才是根本。」¹¹淵明對於積善不無疑問，然而在此疑問下仍以「君子固窮」的態度來要求自己的人生作為，其中心境，或許正如葉嘉瑩所說的，儒家操守不計利害得失，是以信念來貫徹自己的選擇方向。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飲酒詩〉其三）¹²

此詩言有道盛世，已隔一千年，只能追念往昔有道盛世遺風，而今人已不復古人率真性情，乃至於「有酒不肯飲」，卻只是為了顧全世間的虛名。「惜其情」猶言「吝其情」，以陶氏〈五柳先生傳〉所云「不吝情去留」相證可知。人生倏忽即過，壽命不過百年而已，以世俗之虛名假節為重，而連縱情飲酒之事亦不敢做，持此規戒又能在有限的人生裡完成什麼事呢？此詩當與前詩合在一起閱讀，王叔岷以為「彼所重者身後令名，此所薄者世間俗名也。」¹³其連結前後兩詩之關鍵在於此詩起首之「道喪」，因大道淪喪，人心不古，義人固窮而時人媚俗，因此

⁹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124-2125。

¹⁰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216。

¹¹ 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頁77。

¹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243。

¹³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284。

兩詩其實是同一思維脈絡下的不平之語。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裴回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詩〉其四）¹⁴

此詩中陶淵明將自己比喻為是離群獨飛的孤鳥，「裴回無定止，夜夜聲轉悲」狀寫孤鳥仍終日徘徊於舊地，發出淒悲的鳴叫，顯露出眷戀不捨之情。不過王叔岷考訂「去來何依依」一句，或作「遠去何所依」，因此懷疑本當作「去來何所依」¹⁵，如以王氏所校詩句闡釋詩意，則「何所依」可與「無定止」相和，飛鳥所以徘徊不已，是為了尋找定居之處，且其後飛鳥來歸於孤松而得其託身之所，正和全詩意境，因此筆者從王氏之說。該詩前半營造飛鳥失去同伴群體、失去歸宿的悲傷情感，後半則以「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突顯此孤松之遺世獨立的形象，袁行霈以為此詩「以歸鳥自喻，表示退隱決心。」¹⁶猶有未盡，陶氏既以歸鳥自喻，則徘徊不已、厲聲悲鳴，當可解釋為是青壯時代欲有所為而出仕，無奈與眾鳥道不同而離群，詩中歸鳥所以悲傷，是因為不知何去何從，如以陶淵明而言，正是指在仕途過程中發現現實不合於理想，然此際人生目標頓失，無疑是一個重大打擊。後來歸鳥依於孤松，為其歸宿，終身不違，正如陶淵明尋找到其生活的方向，如孤松歲寒不凋，表達堅貞之志，故有所寄託。因此此詩其後的〈結廬在人境〉一首，正是他描繪其找到的精神寄託。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詩〉其五）¹⁷

此詩是陶詩最為人所知的一首，往往也是最能代表其精神上的自適閑然之作。詩首言「人境」，可謂與「仙境」、「異境」相對，作者定居於人間，但是卻沒有人世間的俗塵紛擾。詢問其理由，則因為是「心遠」，故所居之地能夠「自偏」。前

¹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45。

¹⁵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288。

¹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47。

¹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47。

四句可說是一種精神哲學體現於現實生活的表現，龔斌認為：「『心遠地偏』之義乃屬魏晉玄學之範疇。魏晉隱逸之風極盛，玄學改變了隱居乃逃於江海之上以避世之舊觀念，指導人們不執著於外在形跡，而去追求心境之超然無累。倘內心超脫，則隱於市朝與隱於巖穴無異。」¹⁸「採菊東籬下」以下四句言景，詩眼在「見」字，因為悠然採菊而無意之間眼中忽現南山之景，將陶淵明精神狀態裡的閑適與外在環境的自然風光作了完滿的融合，袁行霈說：「在偶一舉首之間心與山悠然相會，自身彷彿與山交融成為一體。日夕之山氣、相與之歸鳥，諸般景物彷彿不在外界而在心中，構成一片美妙風景。」¹⁹末兩句更是展現出陶淵明如《莊子》所云「大辯不言」的體悟，而真意所在的「此中」，蓋指南山(廬山)之景、飛鳥相還，王叔岷以為陶氏所云「真意」，可能可以聯繫於「飛鳥相與還」之意象，則為物當有歸之意，因此「真意」所指或當謂「返歸自然」而言。²⁰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飲酒詩〉其六)²¹

此詩袁行霈以為「本《齊物論》，感歎世俗不辨是非，雷同毀譽，自己當明達獨立。」²²前四句指出世間百態，是非本無定論，而人們所認定的是非標準卻往往是相對比較而來，且同時對此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而對事物讚譽或詆毀。故近世以來，這種情況有增無減，達士為了因應這種世間俗世的愚昧無知，或許可以仿效前人隱居避世。不必盲從。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聊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趣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飲酒詩〉其七)²³

此詩言陶淵明採菊入酒，由早至晚飲觴自得之暢然。袁行霈云：「首二句帶露采菊，時在清晨。第七句言『日入』，則已傍晚矣。」²⁴可知其時序之變化。龔斌

¹⁸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20。

¹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49。

²⁰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294。

²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50。

²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52。

²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52。

²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53。

謂「《說文》：『汎，浮貌。』可訓為浸泡。……忘憂物：指酒。」²⁵陶氏採菊而浸於酒中，飲之而使遺世情懷更加遠曠，因此日夕但飲菊酒，直至鳥返山林，萬物入息，此際悠然閑適，人生也因此獲得滿足。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飲酒詩〉其八）²⁶

此詩陶淵明以青松自喻孤高，前四句化用「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的典故，前兩句言平日因青草茂盛繁多，遮掩住青松；然則待到天寒而雜草枯萎後，青松方顯現出其卓然獨立的姿態。「獨樹眾乃奇」正是陶氏所欲營造出的詩意氛圍，王叔岷以為「奇與獨相應。惟其獨，所以奇也。」²⁷「奇」字有兩個意義，其一是奇數之意，故王氏云奇與獨相應；其二則是奇異之意，在詩意上運用獨、眾的互比來帶出其在世俗當中的奇異之感。「遠望時復為」當為「時復為遠望」的倒裝句，末四句體現出陶淵明在人間夢幻泡影中，對於名韁利鎖事了無興趣，只欲以卓然獨立於世間人格風範，享受自然界裡卓然獨立之奇景。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褰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詩〉其九）²⁸

此詩模仿《楚辭·漁父》之形式，言一老農訪見陶淵明而有勸說。老農一開始就對陶淵明歸隱田園之舉有所疑難，「疑我與時乖」，認為陶氏與時代趨勢相違背。

「褰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這四句是老農向陶淵明所提出的建言，前兩句謂衣衫褴褛的安貧生活，未必是格調較高的隱居生活，「高棲」猶言「大隱」（出仕）；後兩句謂此一代的人們皆以雷同為尚，世道既然如此，希望陶淵明入彼當中，攪和揚波，激起影響。由此來看，老農欲使陶淵明

²⁵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25。

²⁶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254。

²⁷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01。

²⁸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256。

由隱於山林的「小隱」，轉入隱於市朝的「大隱」。因此老農向陶淵明所提的建議，陶淵明並沒有因以為慍，然則陶淵明還是以天性寡和為理由謝拒。「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可見陶氏認為秉持自己的原本性情無疑是最重要的，因此袁行霈同意趙元山對此所云：「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作是篇。」²⁹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飲酒詩〉其十）³⁰

此詩解釋歷來多有異說³¹，袁行霈於詩中文字提出兩點較有說服力的看法，其一是「直至」東海隅的問題，陶淵明有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其路途為經曲阿至京口，故如謂此詩言陶淵明作劉裕參軍之事，則詩句不可云「直至東海隅」；其二，曲阿、京口，其地理位置不可說是在東海郡之「隅」。袁氏以為「東海隅」當指東海郡境內偏遠靠海之處，或即今蘇北沿海一帶。³²因此歷來雖有異說，但大抵皆以為此詩為回憶壯年出仕之時，而袁行霈則認為此詩是憶述少年往事，袁氏云：「沈約《宋書·陶潛傳》：『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據此可知淵明於弱冠之年嘗為生活所迫游宦謀生，其地位甚低也。此篇當是回憶弱冠薄宦之生活。」³³並且詩言「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則可能是未婚年少之時，如已成家，則較難謂「少許便有餘」。要不，就是很早就養成「知足常樂」的想法。至如「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龔斌、王叔岷咸以為「名計」為保住名聲之意³⁴，袁行霈以為「名」通「明」，「名計」猶言「明計」、「良策」。³⁵如欲保名聲而辭官，則何為因飢餓所驅而遠遊？因此筆者在此從袁說。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

²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58。

³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58。

³¹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31。

³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0。

³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59。

³⁴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32、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09。

³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0。

惡，人當解意表。(〈飲酒詩〉十一)³⁶

此詩一來認為前賢死後名聲，不免在世時常遇飢困；二來質疑生養寶軀，而死亦徒留枯骨之思維。詩末引漢代楊王孫之裸葬故事，以為人們應當去理解其裸葬背後的精神意涵。因此王叔岷評云：「言身後之名不可知；身前厚養不可貴。惟有稱心為好也。」³⁷可謂得其旨趣。袁行霈亦云：「淵明生前枯槁，死後反留名千載，此非有意求之而得也。」³⁸詩中「客養千金軀」一句，袁氏以為「客」字或作「各」字，後者於意較勝³⁹，王氏則謂「客」不必專指楊王孫，其可為泛稱。筆者以為，「客」亦有過客之意，人死生於世，如客旅之暫寄，因此詩文用「客」字，可以突顯出人既為此世之過客，費心養其不留之軀而逆其本性，實是荒謬。因此此處擇用「客」字，其在詩意上似能更加貼近陶淵明的本意。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飲酒詩〉十二)⁴⁰

長公指西漢張摯，《史記·張釋之傳》云：「(張釋之)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⁴¹仲理指楊倫，《後漢書·儒林傳》云：「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⁴²袁行霈云：「此詩以長公自況，又借仲理以示諷喻。」⁴³可知陶淵明在詩中以張摯為喻，示人以明「終身與世辭」之志；復以楊倫三仕為惕，「一往便當已」猶言「一仕便當止」⁴⁴，楊倫出仕三次以後，才閉門歸隱，而陶淵明以為出仕一次後如有退隱之心，便不應狐疑不決。此處可視為陶淵明對隱居不仕生活所下的決心。「當悉道」猶「尚何

³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1。

³⁷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12。

³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3。

³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1。

⁴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3-264。

⁴¹ (漢)司馬遷，《史記》，頁 2756-2757。

⁴²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2564-2565。

⁴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5。

⁴⁴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13。

言」，指又何必再說什麼。⁴⁵詩末則申言不必多加理會世間的悠悠之口，當從我隱居之志。

有客常同止，取捨邈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飲酒詩〉十三）⁴⁶

此詩陶淵明以醉士自況，以醒者喻指首句的「有客」。首兩句云有常來拜訪同住的客人，不過在志向取捨上卻大不相同。此「有客」可能是前面序文所稱的「故人」之一。詩中以一醉一醒表明在陶淵明心中孰智孰愚，然這樣在詩中直言朋友雖醒實愚，想必後來陶淵明也略覺自己失禮，因此在第二十首〈飲酒詩〉詩末書言：「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亦見陶氏之莞爾幽默。袁行霈論此詩云：「醉者若愚而實不愚，醒者若不愚而實愚。世事既不可為而強為之，徒然無益也。世事既不可為而不為，委順自然也。然淵明本欲有為者也，世之相違，不得已而退隱，遂以醉者自許。醉語中憤慨良深也。」⁴⁷龔斌謂陶氏以醉者為穎，以醒者為愚為本於道家。⁴⁸其實「大智若愚」，或者醉智醒愚之語，出發點恐或是儒家經世之業無法順利進行，因現實環境之不如意乃而選擇寄情田園生活，醉飲於歸隱，袁氏所云憤慨良深，當近於陶氏心境，故有激語。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詩〉十四）⁴⁹

此詩言故人來訪，陶淵明與之相飲酒作樂，其氣氛閑適自由，以致「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絕非當日正式會宴之禮節。然而陶氏於此體悟到「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的境界，龔斌云「言醉中不知有我，豈知外物為貴。前句寫忘己，後句寫忘物，即寫飲酒時物我兩泯的精神狀態。」⁵⁰體現出《莊子·秋水》所云：

⁴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5、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14。

⁴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6。

⁴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8。

⁴⁸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37。

⁴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68。

⁵⁰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38。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⁵¹「醉」中如「道」體，不知物我，是以無貴賤。由「物」本身看，即有分別相，故有貴賤。這種貴賤的體察，與道家思想接近。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飲酒詩〉十五）⁵²

此詩前四句陶淵明自言窮困，以至於宅屋近似荒廢，而飛鳥班班可見，但宅屋附近卻罕見行跡。「宇宙一何悠」以下四句則感歎天地之遼闊，但是歲月催人老之傷感。故詩末言「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以示人生當適其境遇，委棄窮達之想，無必強求。陳毓讌解釋說：「在這世上所面臨到種種抉擇，都應以最合乎心中的道與善者來作選擇。若以仕隱問題為例，對於仕與隱，其實都不應在人的心中存在太過分的執著，最適宜的方式是順隨著當下的現實狀況是否有道，進而決定仕或隱。若在不應為時為之，豈不是直接背棄了原本的心志與存於心中對道的那份堅持。而在詩人當下的生命裡，外在的因素已不足以動搖其心，唯有每當檢視自身的心志與反省對外在事物的意念時，才會有所哀樂，這都再再的顯示了詩人對外在的超脫與對自我的要求。」⁵³簡單的講，如《論語·憲問篇》說的：「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⁵⁴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飲酒詩〉十六）⁵⁵

此詩陶淵明由少年時代開始回憶，年少時便少與人交際往來，沉浸於儒家六經之中；即至四十歲左右，步入中年而一事無成，此或指儒家之經世之業而言；至於老年，務守固窮而飢寒交迫。「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言其所居屋宅之荒涼

⁵¹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23。

⁵²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269。

⁵³ 陳毓讌，《以〈飲酒〉之分析說明陶淵明對道的體悟》（東海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頁 65。

⁵⁴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946。

⁵⁵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271。

毀壞。「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言飢寒之生活情況如長夜漫漫，「披褐」喻指持守固窮之節，而待雞鳴以迎天明。雞之不鳴，如喻此際生活無有竟時，亦有老天與我作對之意，不免感嘆。「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則謂不遇知己者，自身的情懷抱負亦無從可傾說，只能埋藏心中。「孟公」指東漢劉龔，皇甫謐《高士傳》云：「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索，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⁵⁶陶淵明以張仲蔚自況，然無劉龔相知，不免遺憾。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烏盡廢良弓。（〈飲酒詩〉十七）⁵⁷

此詩陶淵明以幽蘭自喻，謂幽蘭待清風而釋其薰香，亦待清風而有別於蕭艾之屬，正如君子賢才，待明君而展布才華。袁行霈認為：「幽蘭本生於山谷，不染塵俗。其生於前庭者，比喻賢者不隱於山林，而出仕以預人事。」⁵⁸可備一說。「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則暗示說忘記過去平素的生活方向，沿著新道前行。然「覺悟當念還」則示陶淵明下定決心返回舊路，因為「烏盡廢良弓」的歷史事蹟，即所謂「敵國破，謀臣亡。」班班可考。王叔岷云：「陶公此詩，非僅為劉裕之誅鋤異己而託諷；蓋亦所以自警。」⁵⁹因此陶淵明此詩借古諷今，也再次表明不欲再涉入政治當中，因為沒有「清風」，優良的仕宦條件，寧使幽蘭與蕭艾毫無分別，共隱於自然之中。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語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飲酒詩〉十八）⁶⁰

子雲，即揚雄。此詩袁行霈以為專在褒詠漢代揚雄⁶¹，一方面同是好酒人，另一方面則讚賞其「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其意指仁者無論是顯言其說，或默

⁵⁶ 轉引自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72。

⁵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74。

⁵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74。

⁵⁹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28。

⁶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76。

⁶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78。

言不語，皆不會失其仁德之心。⁶²此即「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只有來者相詢戰爭殺伐之事時，有所不言。王叔岷以為詩末「仁者」蓋指柳下惠，則此詩是分詠二賢。⁶³就詩意而言，無論是專詠揚雄或分詠二賢，皆不害於詩中所強調的「不肯言」之主旨。何以有所不肯言？乃是因為持守仁心故能不失「顯默」。因此陳毓讜認為：「詩人或揚雄皆願與訪者同歡飲酒、高談闊論，不過，一旦觸及彼此心中最重要的原則與操守時，則再也無法輕易的妥協或隨意的應和。對於揚雄來說，其以『不肯言』的方式來表達自己不願伐國的立場；而詩人，則用『吾駕不可回』的堅決態度來回絕田父的出仕之邀。」⁶⁴因為「伐國」畢竟是殘忍的事，殘殺無辜，有「仁心」的人，當然不肯言。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裡。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飲酒詩〉十九）⁶⁵

此詩首言少時因為飢寒緣故，棄農從宦。但是此薄宦生活薪資微薄，不足以使家人免於飢寒。及至三十歲時，雖被徵為州祭酒，但不堪吏職，於是棄官返家。其後又因堅持耿介之原則，乃毅然辭官而不復出仕，永歸田園。「一紀」是指十二年，故從詩中可知從出仕，距離最後為官彭澤令，至少已經過了十二年。人生道路分歧複雜，使人往往迷惑而止步不前。王叔岷云：「雜詩之五：『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此云：『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陶公蓋已得止泊處矣。」⁶⁶其義較袁氏所釋清楚。因此陶淵明既已選定未來歸處，不再迷惘，雖然經濟並不寬裕，但仍任其天性，以濁酒取樂。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⁶²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45。

⁶³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30。

⁶⁴ 陳毓讜，《以〈飲酒〉之分析說明陶淵明對道的體悟》，頁 75。

⁶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78。

⁶⁶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35。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詩〉二十）⁶⁷

此詩以「真」貫穿全詩，「真」是指人的自然本性，相對於儒家所說的「禮」。⁶⁸自「汲汲魯中叟」至於「為事誠殷勤。」，概言儒學從先秦至漢代的發展過程，受到秦始皇焚書坑儒，而歸結於現今儒學之不振，「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說明了少好六經的陶淵明在那個時代如何孤獨，「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馳車」謂逐於富貴者，「問津」謂求學於道者，故王叔岷云：「似陶公慨歎時人之奔走富貴，而無向己請益者也。」⁶⁹儒學之興振既不可得，人人只知名利，不在求道，儒學終歸荒蕪！因此淵明復本歸真，適其自然天性，故「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由此可知陶淵明之好飲酒，所以期在必醉，豈其儒家之志業不能伸張，因而轉於道家思想以求自解乎？袁行霈云：「『真』者，乃道家特有之哲學範疇也，孔、孟皆未言及。」⁷⁰其實，「真」也是詩人為人的最重要的素質。袁氏從而認為「彌縫使其淳」是陶淵明將孔子道家化之表徵，謂「淳」有淳厚之意，可與「真」相通⁷¹，此固一說，但是其下言儒家之發展，似未見陶氏將之與道家思想相作結合。此外，「淳」亦通「醇」，釋為「純」義，即荀子所云「醇儒」。孔子之「彌縫」，當謂於春秋末年，以講學編次六經來補缺當時王道不振，使其純然，排斥霸道思想，故孔子之徒不言五霸，意謂使先王之道復歸於純也。因此「六籍無一親」當是使陶淵明由儒趨道的原因，並且因而使自己心境上溯於羲皇之時。

《飲酒》二十首可謂是陶淵明飲酒詩之代表，此中既有哲理者，亦有見諸性情者，或憶過往艱辛，或滿足閑適於現在生活，其內容是多樣性的。第一首言榮衰無常，與友人飲酒同歡，不再為人生志向感到迷惘；至於最後一首，陳述儒學發展之過往，及至今日幾乎已無關注六經大義、聖賢之道者，不如寄情於飲酒，尚能使性情任真返璞。此中他首或悔悟青壯時代因飢寒不得已出仕為官，或述寫自適於隱居生活。由《飲酒》諸首的思想脈絡來看，陶淵明之道家思想的展現，是因為儒家志向的不得行，且《飲酒》之作在義熙十三年(西元 417 年)，是時劉

⁶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82。

⁶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83。

⁶⁹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40。

⁷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86。

⁷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83-284。

裕因北伐而地位高漲，故陶淵明似隱有晉將易代之預感。⁷²這或許也從而加深他歸隱田園，不再入仕途的決心。以下茲論其他與飲酒相關之詩作。

〈止酒詩〉云：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裡。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信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⁷³

此詩一來句句皆有「止」字，令人玩味；二來似乎別有深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似有遠戒聲色犬馬之意，而將情欲歸止於平淡的田園生活；「徒知止不樂，未信止利己」亦有對世人只知逐樂而不知克己有所警惕；「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王叔岷云：「陶公蓋有超然遠隱之意邪？」⁷⁴總而言之，此詩雖題作〈止酒〉，但未必陶淵明真因此而有戒酒、停酒，此不必深究。此詩多見玩心卻又內蘊哲理，正似陶淵明隱居後之逍遙心境。又，〈述酒詩〉：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島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諸梁董師旅，芊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峨峨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⁷⁵

此詩袁行霈繫年於劉宋武帝永初二年(西元 421 年)，為零陵王⁷⁶被宋武帝劉裕殺害之時。詩題云「述酒」，似與詩文意旨不合，然湯漢釋云：「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逾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

⁷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37。

⁷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86-287。

⁷⁴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45。

⁷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90。

⁷⁶ 零陵王即東晉恭帝，為晉朝最後一任皇帝。

隱語，故觀者弗省。」⁷⁷此解近是。大抵此詩為劉裕滅亡晉室因而有感而發，遂作此詩。

依袁氏考諸家所說，前六句言晉室衰微，「豫章抗高門」至「安樂不為君」言劉裕篡晉之事，「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調晉安帝義熙二年(西元 406 年)封劉裕為豫章郡公，遂與高門(王室)抗衡。十五年後晉恭帝禪位於劉裕，而被後者幽禁於零陵，終遭殺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調晉恭帝被幽禁後，僅餘皇后一人仍忠心留在身旁，而詩言其時皇后憂歎之狀。「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調劉裕假借符瑞之事進行篡位，龔斌引湯注云：「義熙十四年(西元 418 年)，鞏縣人獻嘉禾，(劉)裕以獻帝，帝以歸於裕。西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有『四靈效瑞』之語。二句言裕假符瑞以奸大位也。」⁷⁸「諸梁董師旅，芊勝喪其身」調以昔日楚國之內亂喻今時晉室之內訌。諸梁，指沈諸梁，即葉公；芊勝指王孫勝，為楚平王太子子建之子，其號白公。遂欽立云：「此以葉公、白公事寓言桓玄之篡及其為劉裕所誅。」⁷⁹「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調晉恭帝禪位，歸於零陵，後猶見殺，似若謚號為「靈」者。山陽代指晉恭帝，漢獻帝禪位於曹魏後，被封山陽公；《逸周書·謚法解》云：「不勤成名曰靈」，此處轉用典故，而君主謚號為靈者，多非善終，淵明或用此典暗指晉恭帝先廢後戮。「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調晉恭帝如蜀漢後主劉禪迫於時勢，降伏於曹魏，受封安樂公。據龔斌所列，卜生有三種解釋，其一以為指卜子夏，戰國時魏文侯嘗師事子夏，而此代指魏文帝而言；其二以為指《莊子·齊物論》所云：「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⁸⁰黃文煥《陶詩析義》云：「自卜此生者，寧以人牧為善，為可安樂，而不願為君也。」⁸¹其三以為指漢代卜式，王瑤云：「劉裕剪除晉朝宗室，為行篡作準備，其法如卜式牧羊。」⁸²袁行霈引古直所論，以為「卜生」為「卜年」形訛⁸³，其說一來無版本上依據，二來於詩句文意上難解。此處筆者以為王瑤之說近是，蓋卜式曾向漢武帝言牧羊

⁷⁷ 轉引自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92。

⁷⁸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59。

⁷⁹ 轉引自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59。

⁸⁰ (清)郭慶藩，王孝魚 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104。

⁸¹ 轉引自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59。

⁸²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60。

⁸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98。

猶治民，去其惡者，無使敗壞群體。因此可聯繫於劉裕剪除晉朝宗室以及非其同黨之流者，晉恭帝其時已無大臣可輔佐左右，只能聽任劉裕進行篡權。

「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言劉裕篡晉之形勢。平王指周平王，周平王因犬戎之禍東遷雒京，雒京即洛陽；「峽」為「邲」字假借，即指洛陽，「薰」指「薰鬻」，古代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即漢代匈奴。⁸⁴「峽中納遺薰」是指劉聰攻陷洛陽，從此北方淪於胡人之手。劉聰為匈奴人劉淵之子，劉淵在西晉八王之亂後起兵反抗晉室，開啟北方胡人政權之先河。淵明以周室東遷洛陽，後洛陽陷於異族統治之事，暗喻晉室南遷後，亦終究被野心家篡奪政權。

「雙陵甫云育」以後乃託言遊仙以示無可奈何⁸⁵，「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雙陵」暗指關、洛，《左傳》有「嶠有二陵焉」，「甫云育」調剛平定，「育」指人民可以休養生息，此處指平定關、洛一帶後該地人民可以休養了；「三趾」調三足鳥，為中國古代傳說中太陽之靈，晉之代魏時曾以西域進獻三足鳥為祥瑞⁸⁶，「奇文」指世間不常出現之文，此處指九錫文，義熙十二年劉裕伐秦攻克洛陽，派長史王宏向晉帝求取九錫，詩句即指此事。「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王子」指周靈王太子王子晉，傳說中王子晉好吹竽，後在嵩高山遇仙人，詩句晉室暗指如仙人化去。「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朱公」指陶朱公，「練九齒」調習練養生之術，詩句謂淵明如陶朱公遠離世間紛爭。「峨峨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西嶺」謂崑崙山，「天容」調自然之容，「彭殤」出於《莊子·齊物論》：「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⁸⁷，此處為偏義複詞，指彭祖。詩句概指自然之道萬古不變，雖如彭祖長壽亦無可奈何，謂晉室之亡是自然而然的發展。此詩雖云「述酒」，但其實與飲酒無涉，一來是以酒隱事，二來則是以酒記事。又如，〈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故老贈餘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⁸⁴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60。

⁸⁵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03。

⁸⁶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60。

⁸⁷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 79。

此詩陶淵明自言其思想體悟，頗有哲理。前四句謂死生終有命，世間所云仙人赤松子、王子喬者至今亦不知曉其所在，此暗喻人欲求長生不死而入山訪仙，終屬無稽之談、徒勞之舉。因此「故老贈餘酒」至「任真無所先」，為言在精神上當以任真為尚，故陶淵明藉酒以忘乎人，而至於忘乎天，從而與天地合一。「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則指精神如雲鶴之飛翔，展現出脫俗遠世之高度。王叔岷云：「二句蓋喻心境之舒捲自如。」⁸⁹末四句則言陶淵明自己抱獨守一，過著清談生活，務持本性而不改易，身形雖老去，其心不變。全詩體現陶淵明對於生死之態度，以及其以道家思想為根本，進而任真自得逍遙之意境。又，〈九日閑居〉云：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壘，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謔，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⁹⁰

陶淵明該詩是以重九日閑居為題，頌酒作為引讀詩文的關鍵，從而論述至對隱居生活的肯定與認同。酒能消除憂慮，菊可延年益壽。隱者時運不值，以菊、酒自娛，安於時命。袁行霈對此詩的解讀認為：「序曰「寄懷於言」，則有深慨者也。由「世短意多」說起，歸結為隱居不仕不得謂無成，其意蓋在摒棄諸多世俗之欲，而肯定隱居之意義也。重陽無酒，可見其窮困，然窮而多娛，困而反覺有成。此不過一己之娛、一己之成耳。細細體味，似有解嘲之意。李注：「《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東坡曰『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湯注：「『空視時運傾』，亦指易代事。」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自『塵爵』以下六句實有安於義命、養晦待時之意……意欲恢復王室，語卻渾然，序所謂寄懷也。」⁹¹湯、邱之說未免斷章取義，求之過深矣。」

⁸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25。

⁸⁹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157。

⁹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72。

⁹¹ 筆者注：邱嘉穗原文云：前輩既以「空視時運傾」句為指易代之事，則自「塵爵」以下六句實有安於義命、養晦待時之意，此則陶公所自歎為深情者也。詩中「蓬廬士」，公自指也。「時運傾」，晉、宋代謝也。「塵爵」句，承酒說，「寒華」句，承菊說。有菊無酒，正貼「空視時運傾」

⁹²又，〈己酉歲九月九日〉詩云：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93

陶詩的詩旨大抵是說，秋景的蕭瑟使人感到人生的過程也如萬物在秋季之後歸於寂滅，連蟬、雁也歸之寂靜。前八句寫的是秋天景物的凋零消亡，從聲音上「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透露出秋天將要結束，無盡的風聲雨聲一方面宣告冬季即將來臨，另一方面在淒淒風中的狀聲情景裡，也使人感受到一絲淒涼。「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草木由春夏的茂盛欣欣向榮，變為逐漸萎謝凋零的樣子。「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時至秋冬，由於季節的關係，清氣逐漸上升，而濁氣卻下沉聚集於土地上，並且「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夏蟬也已壽命至期，而北方雁鳥的長鳴傳入雲霄，更使那種惆悵更為強烈。後八句則是陶淵明睹物傷情後的感嘆，「人生豈不勞」、「聊以永今朝」更透露出生命轉眼即逝，而人生當要把握時間及時行樂的心態。

又，〈蜡日〉詩：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⁹⁴

此詩題名「蜡日」，蜡，本是「十二月大祭萬物。」(鄭司農注《周禮·夏官》)，此指歲末之時風景。王叔岷以為「蜡日」當喻有「晉祚之盡」之義⁹⁵，然則觀詩中所述，實難如此解釋。袁行霈以為「此詩歲暮風物，兼及飲酒之樂。」⁹⁶較合原意。以全詩文字及脈絡而言，似較合理。王氏又認為如果陶淵明宅前種有梅樹，

意。故序以菊醪為慨，其所謂深情，只在「淹留豈無成」句。意欲恢復王室，語卻渾然，序所謂寄懷也。見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合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下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46。

⁹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75。

⁹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223-224。

⁹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310。

⁹⁵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372。

⁹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312。

則詩文作品自當多有頌詠，吳騫云：「梅喻君子」或有幾分道理。⁹⁷儘管如此，強解此詩以為如〈述酒〉有易代之隱，似又與詩文意境略有乖違。

又，〈停雲〉詩：

靄靄停雲，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⁹⁸

此詩序文云：「〈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⁹⁹陶淵明此詩為思念親近友人所作，酒罇中裝滿新酒，而庭院裡布滿初開之花，但是卻無法見到友人，因而倍感難過。此詩為四言形式，分有四章，前兩章云大雨直落，而淵明無法訪友；只能倚著東面窗子，飲酒想朋。；第三章由東園樹景聯想到歲月流逝，因而欲與友人共話平生；第四章言見飛鳥相和，而自己卻無法如願與友人相見，實是遺憾。全詩總論而言，為寫景抒情，直如序文所云思念親友。

飲酒詩題材在陶氏詩作裡最主要的代表自是〈飲酒〉二十首，當中可略分為陳述與友飲酒賞景之樂，以及回憶人生過往、尋思人生志向這兩方面，其他飲酒題材之作亦大多可依此脈絡歸納之。就陶淵明之飲酒而言，從其詩作中可看出，獨飲則為沉思，與眾人共飲則言歡。上述作品除〈述酒〉一詩為政治隱語之作，〈止酒〉或為遊戲之作外，其他詩作多為因酒寄情，由此可見陶淵明性情真摯的一面。

⁹⁷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72。

⁹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

⁹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

第二節 田園詩

陶淵明的詩作在風景描繪上，尤以田園生活居多，茲舉數首作品以說明，如〈移居〉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息。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¹⁰⁰

此詩陶淵明主要是談其生活清貧，但是自己安貧樂道，生活沒有太多要求，所居不必廣，可安牀休息即可。鄰人朋友經常往來拜訪，彼此談天說地也是一種充實的生活。此詩是講一種樂於清貧的態度，如顏回「簞瓢屢空」固窮的生活，陶淵明也是「不改其樂」。又，〈移居〉詩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¹⁰¹

陶淵明這首詩寫的是春、秋兩季有許多佳節良日，適合登高上山來吟詩歌詠，朋友之間互相往來拜訪，以酒食宴請，十分快活。等到春夏耕作以及秋後採收等農忙時，大家就各自回去勞動。等待農閒時，相思尋友，談談笑笑。這樣的和樂的農村生活讓陶淵明不由讚嘆親力耕作於田事生活上是非常有收穫的，不只於物質上的糧食，還有心靈精神上的慰藉。全詩肯定了勞動的價值必然能夠換取相當的報酬，及農務勞動的積極態度。同時，也書寫閒暇時，與村夫村婦相處，其樂融融的心情。

〈歸園田居〉五首是陶淵明田園詩中的代表作，除文字使用上體現出質樸的特色外，詩作內容也透過農事的描寫，使我們了解到陶淵明是真正投入田園生活當中，這首詩充分體現出陶氏之歸隱與東漢魏晉時人或隱於山林不同。以下茲分析論述之，如〈歸園田居〉其一：

¹⁰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30-131。

¹⁰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33。

少無適俗願¹⁰²，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¹⁰³

此詩讓人得以一窺陶淵明其田居生活之狀況，「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言其闢墾荒地以為農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則可知陶淵明所居簡陋，而附近村落人口較少，因此反而適見其閑然之態。「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言陶淵明自家所植林樹前有桃李，後有榆柳，其生長可蔽蔭房舍，「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則如《道德經》所說的小國寡民，雞犬相聞之自然情境。這些描繪都使陶淵明詩中的田園風光不比當時盛行的山水詩顯得遜色。此外，「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詩末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則是遙相呼應，說明陶氏對於世俗宦途如何心煩而厭惡，欲求返歸其實踐自然本性之生活，也就扣緊了全詩主旨：「少無適俗願，性本愛丘山」，故陶淵明在這首詩中對於能夠放下世俗包袱而全心全意歸於田園之中，有如「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我們也因此得以了解田園隱居生活在陶淵明的精神世界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歸園田居〉其二云：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¹⁰⁴

此詩首言因地處偏僻，因此居處少人拜訪。白天的時候關上屋舍大門，在內室裡靜思，斷除俗世雜念。「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調拜訪鄰人時往往需要撥分長草方能通行，「披草」調撥開草而行以通道¹⁰⁵，王叔岷認為「披草」與「墟曲」

¹⁰² 袁本作「願」，王叔岷、龔斌作「韻」，惟袁氏以為魏晉時人所用「韻」者，蓋指風雅之屬，如為世俗者則不見用「韻」字。此外，袁氏也認為該詩作「願」字，則可以與〈歸園田居〉其三所云「但使願無違」相和。今從其說，見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76-77。

¹⁰³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76。

¹⁰⁴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83。

¹⁰⁵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78。

互應¹⁰⁶，則顯示出陶淵明住處附近相當荒涼。「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意謂與鄰人相談的內容多是農桑之事，「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詩末則盡見陶淵明所關注者，如實反映出農家面對作物寒害的擔憂，袁行霈因此說：「非躬耕不能有此心情」¹⁰⁷，真實的農夫，刻畫出農家田園生活真實的一面，不同一般文士農家生活只憑想像。

〈歸園田居〉其三云：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¹⁰⁸

此詩亦言農事之艱辛，「草盛豆苗稀」謂田地雜草仍多，尚待辛勞翻墾。「晨興」、「帶月」則見陶淵明從早忙到晚，這樣的辛勞換作是同時代的一般文人，可能老早就放棄了。但是陶淵明此詩詩末云「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可見他真的是下定決心過著田園生活，即便陶淵明或許不善於農事，而農務也相當繁重，但是這些都無所謂，只要不違背他的心願就可以了，王叔岷云：「(此詩)寫安於園田之願」¹⁰⁹，因此「願無違」正是全詩詩眼所在。

〈歸園田居〉其四云：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壑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110

此詩大半部所敘述的是過去村落的遺跡種種，透過在山中砍柴的採薪者言告，陶淵明體認到人事興廢的茫然感受，「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便是陶淵明對於眼前山澤實為過去的「昔人居」，是以前的人居住之所，而今「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只剩頹然殘存的痕跡。由此陶淵明不禁感慨有形萬物終將因消亡而回歸到無形的虛無當中，「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人生也是如此，生前一切

¹⁰⁶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108。

¹⁰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84。

¹⁰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85。

¹⁰⁹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111。

¹¹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86。

種種死後都帶不走，人死之後就回歸到空無之中，這是詩人在此對人生所發出的感慨體認。

〈歸園田居〉其五云：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¹¹¹

袁行霈認為該詩「此首承上首，寫步荒墟之後，歸家途中及歸家後之情事。『漉我新熟酒』以下四句，農村生活之簡樸、鄰人間關係之親切，以及鄉間風俗之淳厚，歷歷在目，耐人尋味。」¹¹²，這是說這首詩與前一首詩有敘述性的關聯，從本詩來看，藉著遊山，濯足清水，寓言歸隱之意。又以酒、雞招待鄰居，敦睦附近左右，以寄樂天生活。詩之末則以「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應當及時行樂，來暗示人生正因終歸空無。

陶淵明亦有其他言農事之田園詩，如〈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¹¹³

此詩詩題歷來多有爭議，袁行霈云：「『西田』在山中，所種稻或係早稻也。……查《齊民要術》卷二『早稻第十二』云：早稻種於山中或下田，有九月收者。據霈實地考察，江西一帶收早稻在六月，氣候正炎熱，即使山中亦不寒，尤不應有『霜』，作『七月』與詩中所寫氣候不合。作『早稻』為是。」¹¹⁴王叔岷云：「山中風氣先寒，則題不得言『九月』，亦可證九當作七也。」¹¹⁵王說未詳細解釋何以山中風氣先寒故詩題不得云九月，而袁說似較勝。「日入負禾還」，龔斌、王叔岷以為「禾」當作「耒」¹¹⁶，如以文字傳寫過程中的訛誤情形來說，確有繁而入

¹¹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89。

¹¹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91。

¹¹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27。

¹¹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27-228。

¹¹⁵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263。

¹¹⁶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05、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265。

簡的狀況，然如以全詩觀之，詩題既云獲稻，則是其農事乃指收成而非耕耘，袁行霈以為「耒」是春耕所用農具，秋收則不用之，良是。¹¹⁷這首詩作於晉安帝義熙六年(西元 410 年)，先前陶淵明於義熙元年(西元 405 年)辭彭澤令，歸園田居，其後義熙二年(西元 406 年)春前往西田耕作；義熙四年(西元 408 年)園田居遭遇火災，而暫居舟中，即〈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詩所言；園田居修復完成後，遂於義熙五年(西元 409 年)復居於此，因此義熙六年(西元 410 年)方能前往西田收穫早稻。¹¹⁸全詩開頭即言衣食為人生至為重要之事，如果無視衣食之需，則何能往聖求道？這說明了陶淵明當日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在親身耕作勞動後，其思維是不同於往日高高在上，大言務農非君子應當著重的士大夫。陶淵明更以「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表明志向，長沮、桀溺為古之隱者，(《論語》提及)高蹈塵外，敝履祿位，藉此說明他實與古代隱士心意相通，「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躬耕雖然辛苦，但是比起官場人事之煩心，寧願長久過著這樣的勞動生活，正如「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農事忙完後洗淨手腳，喝點酒來放鬆身心，這樣農耕的生活正是陶淵明所追求的。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云：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鷄。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頽。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蓀翁，聊得從君栖。¹¹⁹

此詩作於義熙十二年(西元 416 年)，詩云「三四星火頽」，意指十二個秋季，星火指古代星名，《尚書·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袁行霈釋星火頽云：「夏曆五月(仲夏)黃昏，火星出現於正南方，六月以後遂偏西，入秋更低向西方，故曰『頽』。」¹²⁰自義熙元年(西元 405 年)始歸園田居耕作以來，恰好至今十二年。首四句言陶淵明躬耕以來，終年辛勞於農事上，「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則謂代陶淵明看顧田地之農人來信告知秋穫已至，一同分享收成的喜悅。

¹¹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28。

¹¹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29。

¹¹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31。

¹²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34。

「飢者歡初飽」可知在秋穫以前，陶淵明與一般農家一樣，大部分時間難有飽食，因此陶淵明迫不及待想要早點去田地收成，「束帶候鳴鷄」，天還沒亮的時候就已整裝待發。「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迴」言其乘舟越湖以至田地，「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描寫途中景色，乘舟過程中由夜轉晨，而寂寥氣氛也因林間飛鳥的鳴叫而告示天明到來。詩後半部為陶淵明的自勉，「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言雖年事已高，但未背棄農勞之事。「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栖」，「荷」指肩負，「荷篠翁」出於《論語·微子》：「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¹²¹「篠」字古作「筱」，指耘草農具。¹²²淵明此言自身可從古代隱士荷篠丈人一樣躬耕隱居了。此詩與前詩〈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旱稻〉均於詩末舉引古代隱士，以親身從事農務來期勉自己可與這些前賢為伍，足見陶淵明躬耕隱居志向之強烈。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云：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123

此詩首四句可見陶淵明自言由儒入農的心境，「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先師蓋指孔子，龔斌引《論語·衛靈公》云：「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¹²⁴顯見「憂道不憂貧」此語帶有瞧不起農人之意味，孔子亦云「學而優則仕」，因此對陶淵明而言，先師所教，則為官祿之道，這是他所不喜的。因此才說「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這裡體現出陶淵明的幽默，儘管不喜官祿之道，但是對於往聖先賢，他還是相當敬重，因此化用了顏淵稱讚孔子之語：「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孔子之道只得仰視而不可及，因此方改變志向長期勤於農事。「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龔斌云「解顏，猶

¹²¹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272。

¹²² 程樹德，《論語集釋》，頁1272；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273。

¹²³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203。

¹²⁴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182。

開顏」¹²⁵，袁行霈引馬璞《陶詩本義》云：「解顏者，其情見於顏，非強之也。」¹²⁶此處是說陶氏樂於耕耘勞務，而舒展心情勸勉農人勿殆農時。「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平疇」蓋指整治過的田地，其與遠風相交，形成一幅平淡樸實的農園風景。「懷新」意指生意盎然¹²⁷，袁行霈謂此「良苗」乃陶淵明予以擬人化¹²⁸，故云懷新；良苗如人懷新精神煥發，故其狀則欣欣向榮。「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言雖然沒有多所計算一年收穫之數，但是眼前所見之農田景色無不欣榮。「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言陶氏忙於農事而按時休息，不受世俗之事打擾。「無問津」亦可理解為周鄰農人將陶淵明視為同為務農之夥伴，並不把他當作士大夫那般看待，因此「無問津」也暗示說陶淵明在此躬耕而融入當地農民群體當中。末四句則顯示陶淵明過著真正農民的生活且樂於以此身分自居而無不自得。

陶淵明尚有〈勸農〉一詩，分有六章。袁行霈以為或作於晉孝武帝太元五年(西元 380 年)，是年陶淵明二十九歲，任州祭酒¹²⁹；龔斌以為此〈勸農〉詩與〈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同作於元興二年(西元 403 年)。¹³⁰如按〈勸農〉詩中對儒家貶抑農事大為不滿的立場來看，似龔說為是。〈勸農〉詩第二章云：

哲人伊何？時惟后稷。瞻之伊何？實曰播植。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¹³¹

其云舜、禹雖為天子，亦看重農事，而《尚書·洪範》所載八政，起首就是「食」，可見務農方以得食，農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第五章云：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儻石不儲，飢寒交至。顧余儔列，能不懷愧！¹³²

此云勤於農事，則糧食不匱，如果耽於安樂，則終將飢寒交至。「顧余儔列」，「余」或作「爾」，為後者俗字「尔」之訛誤。袁行霈與王叔岷均以為作「余」其義較

¹²⁵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182。

¹²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05。

¹²⁷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182。

¹²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06。

¹²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5-36。

¹³⁰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37。

¹³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4。

¹³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4。

長，推論其旨，作「余」則意指環顧我輩中人，其謂士大夫而言，即讀孔孟之書而求官祿之道者；作「爾」，則意指彼輩農人，隱有以上視下，予之規勸的意涵。既云「能不懷愧」，則當為自省之辭，而非訓斥之言。第六章云：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跡高軌。敢不斂衽，敬贊德美。¹³³

詩云孔子鄙視問農事的樊須，而董仲舒樂於詩書琴藝但不曾下田耕作。「超然」謂超脫世俗，言不問治產世事，專務於詩書琴藝。故「若能超然，投跡高軌」概言若能全然不理會世俗之事，而仿效孔子、董仲舒等前賢。「敢不斂衽，敬贊德美」言哪裡敢不整理自己的衣衫，好好地去讚揚這樣的人呢。王叔岷以為「若能超然」以下四句，係陶氏謙辭。¹³⁴然筆者以為，此〈勸農〉最末一章，固然由反面立說，但此中不無有所諷焉。因此綜合來說，〈勸農〉一詩之語調已近於義熙元年(西元 405 年)始為躬耕之心態，而袁行霈云作於任州祭酒時，其時似尚壯年，猶未有此心態，因而其說恐難以成立。

陶淵明的田園詩，亦有紀實農家可能遭遇到的災荒情景者。如〈有會而作〉：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135

其序云：「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以來，日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¹³⁶此詩當作於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西元 426 年)，袁行霈、龔斌皆取此說。¹³⁷龔氏以為詩題「有會而作」，蓋有所感悟、體會而作¹³⁸；袁氏則以為「會」即災厄之義，並引《後漢書·董卓傳贊》云：「百

¹³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4。

¹³⁴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51。

¹³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06-307。

¹³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06。

¹³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07、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66-267。

¹³⁸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66。

六有會，《過》、《剝》為災」為證。¹³⁹二說似可互通並存，是年遇有飢荒，故序文云：「而值年災」。此詩首言少時家境困難，老來又逢災荒，但求菽麥果腹即為滿足，何敢奢望其他美味的食物。「甘肥」，蓋指肉食，漢代年過七十者可分得梁肉，以作敬老。此言自身近已老邁，未得敬老甘肥之食則已，又何況突逢災荒，但求穀物粗食而不可得。「怒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怒謂飢餓之意，亞指匹、配，九飯為《說苑》所云：「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¹⁴⁰因此此處意為飢餓難耐，身體孱弱到了夏季仍得身著冬天的衣服。「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謂時常對提供粥食給飢餓的善心人士心懷感謝，而對不肯接受施捨幫助者感到遺憾。「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龔斌引《後漢書·張衡傳》云：「得之不休，不獲不吝」謂「吝」指「恥辱」¹⁴¹，此句意為乞食不足為恥辱，白白餓死只是徒留遺憾。「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龔斌引陶澍所注以為「攸」通「所」為是¹⁴²，此於詩意較通。此處意為像小人一樣斯濫之為豈是我的志向，如君子一般固窮守節才是夙願所在。「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王叔岷謂：「陶公既言『深恨蒙袂非』，則蒙袂者固非多師中之一矣。」¹⁴³此處意為效法古代賢人隱士寧以飢餓固窮守節，(不食嗟來食)其云「多師」或當為〈詠貧士〉七首所記者。

從上述陶淵明的田園詩作品來看，其內容大抵為紀實躬耕生活、描述田園風光，亦不乏言其現實的一面，如災荒乏食之悲痛。然陶淵明醉這些作品裡無論所處境遇為順或逆，他都勉勵自己當仿效古代隱士一樣過著質樸的農耕生活，反映出他經過出仕為官的生涯後，對於官場的厭惡，而一心嚮往於真正的田園生活，因此無論遭受怎麼樣的困難，他始終以固窮守節、安貧樂道來要求自己。陶氏的田園詩除文字上的風景描繪堪比魏晉山水詩以外，其在詩文內對於君子固窮的精神意志之展現也是不可忽略的。

第三節 詠懷、詠史詩

詠懷之作，如晉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因為阮籍身仕亂朝，常想遇禍，

¹³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07。

¹⁴⁰ (漢)劉向 著，向宗魯 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80。

¹⁴¹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68。

¹⁴²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66。

¹⁴³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369。

有憂生之歎。晉朝左思有〈詠史〉詩，名為〈詠史〉，借比興方式，實顯門閥制度不合理，或表明安貧知足態度。陶淵明沿襲兩漢魏晉詩人傳統，亦有詠史、詠懷之作，此中概有詠人物寄以懷古之情，以下茲舉數首說明，如〈詠二疏〉：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¹⁴⁴

此詩陶淵明作〈詠二疏〉，是以歷史人物西漢時代的疏廣與疏受叔侄兩人的典故為歌詠題材，說明功成身退，知足不辱的道理。

又如〈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¹⁴⁵

詩中「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是陶淵明個人對於荊軻刺秦王的事件之看法，其實也正是全詩的主調。詩旨便是在談論荊軻刺秦的故事。傳統上或認為這首詩是陶淵明在劉裕篡晉之後意圖報仇之作，而袁行霽則持相反意見，他說：「此說無旁證，不可取。觀淵明《述酒》等詩，其態度不至於如是之激烈也。此乃讀《史記·刺客列傳》及王粲等人詠荊軻詩，有感而作，可見淵明豪放一面。」¹⁴⁶因此這首詩在創作上也就屬於詠史興嘆形式，言荊軻刺秦王雖失敗，但留千古美名。主要是讀史書之後的感觸。

如〈詠三良〉：

¹⁴⁴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79-380。

¹⁴⁵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88。

¹⁴⁶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92。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¹⁴⁷

三良是出自《左傳》的典故。《左傳》〈文公六年〉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秦穆公任好過世，依照秦國舊習，以人殉葬，而秦國大夫子車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鍼虎也在殉葬名單之列。秦國人民感到悲痛，於是作了〈黃鳥〉一詩來諷刺秦穆公以人殉葬。陶淵明此詩有很深的意涵，袁行霈分析認為：「此詩首言人皆追求仕達，盡殷勤，建功名；次言三良受重恩於秦穆公，君臣相合，求仕者至此蓋無憾矣。而厚恩難忘，君命難違，一旦君王長逝，遂以身殉之。言外之意，反不如不乘通津，不恐功微，明哲以保身也。『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一『謬』字最可深味。為君所私，無異投身羅網。淵明既為三良之死而傷感，又為其忠情謬露而遺憾也。」¹⁴⁸這首詩體現了陶淵明看盡朝廷官場的荒謬與悲哀，「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此詩句表面上是說辛苦侍奉君主，惟恐功績不夠卓越。但是換個角度而言，越是在君王身邊忠實服役的臣子，就越容易為君王所重視，侍奉越久，厚恩難忘，君命難違。一旦君王「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讀來真是令人心寒膽顫，君王逝世之後，對於這些忠實的臣子他只有「願言同此歸」，讓他們一同殉葬，常伴君王左右。因此這首詩陶淵明的主軸便放在忠臣的結局，這樣可悲的君臣關係，還要盡心地侍奉君王嗎？值得反思。以上為詠史詩。

至於〈詠貧士〉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¹⁴⁹

袁行霈認為這首詩當是陶淵明七十來歲以後所寫的詩¹⁵⁰，詩中的悲苦與貧困的心

¹⁴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83。

¹⁴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87。

¹⁴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64。

¹⁵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65。

境可以想見陶淵明老年的哀嘆，言孤零無依，孤鳥無伴，自己只能「量力守故轍」，不能如「眾鳥相與飛」，投向火熱的官場。「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說出在爭名奪利的時代，沒有知音的悲哀！

又，〈詠貧士〉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闕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¹⁵¹

這首詩是陶淵明對於貧士(自己)歲末，穿無毛衣，飲無餘酒，廚無炊事，詩書滿地，卻無見用，所作的不滿怒吼，但是他最後勉強靠著古代安貧樂道的賢士，為自己予以釋懷。

〈詠貧士〉其七：

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¹⁵²

此詩首四句敘述從前漢代有個名士叫做黃子廉¹⁵³，他作官時名聲相當好。辭官回鄉後，家中就變得十分貧窮。第五句開始，時間拉回現在，「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因為時逢荒年，家中無以為繼，陶淵明的妻子翟氏向丈夫哭訴說：「你雖然有崇高的志向，但是也要為自己的子女找想啊。惠孫¹⁵⁴要給你物資援助，而你居然謝絕了人家的好意。」陶淵明自己則認為，君子固窮守節有何困難，以前那位前賢黃子廉不就是最好模範了。此詩一方面歌詠黃氏，一方面也是自況己身的貧士生活。龔斌《校箋》云：「《詠貧士》七首，首章總冒，次章自詠，下五章詠古代貧士，表達效法古賢，固窮守志的節操。整組詩結構完整，一氣呵成，當

¹⁵¹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66。

¹⁵²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77。

¹⁵³ 黃子廉生平不詳，袁行霽考黃子廉於文獻蓋有二見，其一見於《三國志·吳書·黃蓋傳》裴松之注云：「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其二見於《太平御覽》卷四二六引《風俗通》：「潁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於水中。」見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79。

¹⁵⁴ 惠孫為人名，可能是表字，不詳其事跡。王叔岷疑惠孫是檀道濟的字，因此「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蓋言檀道濟往送陶淵明梁肉，而被淵明拒絕之事。然此說欠缺其他佐證，聊備一解。見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457-458。

為一時之作。」¹⁵⁵這七首《詠貧士》的內容與結構，說的十分清楚。

又，〈擬古〉其一：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中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¹⁵⁶

由蘭、柳起興，言朋友之誼(同志之友曰蘭交，氣味相投曰蘭言)，而卻要相別(折柳送別)，出門之後，遠別萬里，雖遇嘉友，卻未言「心相醉」。而家中蘭、柳亦衰，相期之言亦乖，情景相生。故袁行霈認為陶淵明此詩主在講朋友情誼，而非歷來一些學者認為有指涉政治層面的事情。全詩主在感慨友情之難以持久，「相知不中厚」，袁行霈認為或許這與曹植詩辭中的「中厚少年」有所借寓。¹⁵⁷

以上列舉陶淵明的詠懷、詠史詩作品，可知就其內容而言，多為詠人物或懷古抒情，詠人物者，或為讚賞其人行事氣節，或以為當有適足效法自勉者，對陶淵明而言，以古代賢人隱士之事跡來勉勵自己保持志向，是使其於貧困生活裡維持其固窮守節意志的精神食糧。世間如遇陶淵明境遇而猶能固窮如此者幾希？也因為在陶淵明的時代，世人多馳車走馬尋求富貴，而無有問道於津者，因此陶詩詠懷古人，蓋亦出於與古人為友，慕其節操風骨而有感而發。

第四節 其他主題的詩

其他主題之詩，或為因事而以詩記之，或為讀書感想而以詩記之，或無特定主題而作之者，以下茲舉數首說明：

如〈乞食〉：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諧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勸，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¹⁵⁸

¹⁵⁵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312。

¹⁵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15。

¹⁵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19~320。

¹⁵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03。

此詩主要是談陶淵明自己飢餓難耐，所以真正的當「乞食」，即今日閩南語的「乞丐」之意。因此漫無目的地走著走著，到了一戶人家門前，因為內心羞愧在言語上表達「乞食」，然後與該家主人漫談，招待他飲食，兩人相談甚歡，直至日終。詩末陶淵明慨嘆自己並非如韓信一樣有經世幹才，能夠飛黃騰達以報漂母一飯之恩，將此事寫成詩篇，也說自己將以「冥報」的方式來報答主人的施濟。這首詩乃述陶淵明自身的乞食經驗，真性情形象躍然於紙上。

又〈雜詩〉其一：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¹⁵⁹

這首詩開頭便帶出人生漂泊不定之感，「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人生並不像植物一般有根可深扎於土地上，反而像是隨風吹散的塵埃一樣；「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只要受「風」(外在環境)影響了，此即言「非常身」，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隨時變動、變化。有點類似蘇軾所云「常恨此身非我有」一樣，因此「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一切隨緣，這就是說隨遇而安，因此土地上的人，應當是自己的兄弟了，就像《論語》上說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必非得是骨肉相連的親人呢？高興時，要玩得痛快，「斗酒聚比鄰」，與鄰居飲酒作樂，所謂及時行樂。這首詩是淵明早年之作，末四句文明顯的說明要「及時當努力」，因為「歲月不待人」，寓於積極進取精神，屬勵志詩。

又〈雜詩〉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暉，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¹⁶⁰

此詩開頭前四句先以遼闊場景將氣勢襯出，日落月出，隨後「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溫變冷，牀枕冷寒，而至「不眠知夕永」，即因為失去睡意而醒著，

¹⁵⁹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38。

¹⁶⁰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42。

方才知曉夜晚的漫長。「欲言無予和」，想要說話但是沒有志同道合的人可予談論，「揮杯勸孤影」，舉著酒杯看著夜晚燭火映照出的自己影子，自己對自己的影子揮杯勸酒，兩句合作一起，更顯孤單寂寥。唐人李白的「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似乎比較曠達。淵明想到「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從前時光的虛耗，而自己依然有志難伸，這種悲淒的心中感受讓自己整晚都沒有辦法再次安靜入睡，「終曉不能靜」。由此來看，此詩的主旨是理想不能實踐，「有志不獲騁」，因此在床上輾轉難眠，「終曉不能靜」。也是表達年輕時追逐理想未獲實踐的痛苦。

又〈讀山海經〉其一：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161

本詩起首四句先寫田廬四周的自然景色，充滿和樂氣息。中間八句以「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作為轉折，已經做好日常農務該做的事情了，農閒的時間可以讀自己的書了。「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因為深居陋巷當中，很少會有人來拜訪，也因此不受打擾。於是一邊高興地「酌春酒」，摘取田園的蔬果，此時東方下起細雨，涼風吹拂，十分快意。接著事前工作都準備好之後，陶淵明就來讀《山海經》¹⁶²一書了，「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周王傳》指的是傳說中周穆王遊歷天下奇勝的冒險故事，其故事見諸漢代左右成書的《穆天子傳》；《山海圖》是指《山海經》中的文字與圖畫，中國古代《山海經》有圖文並存的版本，因此陶淵明所見《山海圖》當為古代圖、文並有的《山海經》。這樣閱讀古代的神話故事，在很短的時間，讓陶淵明覺得探究宇宙之間的奇異，「不樂復何如？」，能不感到快樂嗎？此詩作為〈讀山海經〉的第一首，充分表現出陶淵明的閒適心情，想要了解古代神話中的中國。下面所作的系列詩作皆描述《山海經》神話世界。

〈讀山海經〉其二：

¹⁶¹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93。

¹⁶² 袁珂，《山海經校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¹⁶³

這首詩專講西王母的種種故事。「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言西王母與天地同壽，所以不知其歲數；「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言西王母神靈變化無窮，居無定所，行蹤難尋；「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言西王母酒飲愉快之後，隨口唱出新曲，豈會仿效世俗之言？此詩蓋以神話故事中西王母的記載為詩文材料，陳述《山海經》中西王母的故事，亦即以神話題材為詩。

〈讀山海經〉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為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托乘一來游。¹⁶⁴

玄圃位在崑崙山中層，而崑崙山為黃帝在下界的都城。¹⁶⁵高聳的槐江嶺即是玄圃所在。崑墟即指崑崙之丘、崑崙山。明玕指琅玕，為美石之意，或指綠松石。¹⁶⁶首二句點明崑崙山的位址，中四句則形容崑崙山光彩奪目，山上帝都的宮殿美輪美奐。清代馬璞《陶詩本義》云：「其上琅玕亭亭而直，其下瑤水落落而清，人不能到，惟周穆曾遊之。」¹⁶⁷故淵明詩末云：「恨不及周穆，托乘一來游。」足見其恨不能與周穆王共遊仙境之憾。亦即寫仙境如此美妙，羨周穆王之遊樂福份。

〈讀山海經〉其四：

丹木生何許？迺在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¹⁶⁸

密山即崑山，山上所生丹木會結出一種赤色果實，味道甘甜，食之不飢。丹水出於密山，流入稷澤之中，其處多白玉，白玉經丹水滋潤而生玉膏，即詩中所云「素

¹⁶³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98。

¹⁶⁴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400。

¹⁶⁵ 王建生，《陶謝詩選評注》(台北：秀威資訊，2008 年)，頁 122。

¹⁶⁶ 王建生，《陶謝詩選評注》，頁 122。

¹⁶⁷ 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合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下編》，頁 296。

¹⁶⁸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401。

液」。瑾瑜指美玉，「瑾瑜發奇光」謂白玉經丹水沖洗而更顯光采奪目。詩末「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謂此朱實、玉膏，不只是君子寶之，連黃帝亦相當重視。學者以為此詩意旨「言思服食丹木黃花朱實，以為不死，君子所寶，以友黃帝。」¹⁶⁹此為作者慕仙思想。

〈讀山海經〉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¹⁷⁰

《山海經·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¹⁷¹《山海經·海內西經》云：「(蛇巫之山)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崑侖墟北。」¹⁷²可憐意指可憐愛，首二句言三青鳥羽毛翩然美麗，使人憐愛。「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言三青鳥為西王母工作，終日辛勞。須，指要求、尋求。¹⁷³末四句為淵明以詼諧語氣煩請三青鳥轉告西王母，求賜美酒與長壽，溫汝能《陶詩彙評》云：「人世長飲酒與享長年，何用別求神仙。以放筆寫諧趣，其襟懷慨可想見。」¹⁷⁴淵明以為求神仙之不可能，所以不似漢武帝欲求西王母以仙丹妙藥求長生不死，但願美酒與長壽即可，可見詩中奇情與人生體悟實鑄於一體。

〈讀山海經〉其六：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¹⁷⁵

蕪臯即無臯山，扶木即扶桑，《山海經·東山經》云：「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臯之山，南望幼海(少海)，東望搏木(扶木)，無草木，多風。」¹⁷⁶暘谷指湯谷，傳說中太陽所居之處。前四句言無臯山上的扶桑樹枝葉密茂，而太陽

¹⁶⁹ 王建生，《陶謝詩選評注》，頁 124。

¹⁷⁰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403。

¹⁷¹ 袁珂，《山海經校譯》，頁 32。

¹⁷² 此文本在〈海內北經〉，袁珂以為當移至〈海內西經〉，見袁珂，《山海經校譯》，頁 226。

¹⁷³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404。

¹⁷⁴ 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合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下編》，頁 298。

¹⁷⁵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404。

¹⁷⁶ 袁珂，《山海經校譯》，頁 98。

所棲身的湯谷正隱在其中。靈人指羲和，為傳說中太陽的母親¹⁷⁷，神景猶言「靈景」，此處指太陽。¹⁷⁸末四句言太陽在湯谷丹池中，讓其母羲和為其擦拭沐浴，而後太陽出湯谷意謂黎明天亮，世上沒有任何一處幽暗之所不被其耀眼的光明所照亮的。此詩或寓意晉室無賢臣輔佐，不能如太陽出湯谷而照亮大地，因而易代以後，舉世皆幽暗不明。

〈讀山海經〉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¹⁷⁹

《山海經·海外南經》云：「三珠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¹⁸⁰粲粲為鮮盛貌，前四句言繁茂旺盛的三珠樹生長於赤水之南，桂樹亭立高大，才只八株即可為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謂鳳凰拍雲而舞，鸞鳥歌唱出如玉石般悅耳之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謂三珠樹、凌風桂、靈鳳、神鸞等物，雖非俗世之人所愛的寶貨，但是卻深得西王母的青睞。淵明以此寓指世人不知周邊有真正可貴的事物，而汲汲營營於外面的財富寶貨，甚為可歎。

〈讀山海經〉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¹⁸¹

靈長，龔斌謂「廣遠綿長。此謂長生不死。」¹⁸²首四句謂自古人生皆有死，又有誰能夠得到靈佑而長命百歲？既不會死也不會變老，活在世上已過萬年也屬平常。

「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謂以赤泉之水、員丘之樹為飲食而不老不死，《山海經·海外南經》記載交脛國：「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郭璞注云：「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¹⁸³渠央，

¹⁷⁷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344。

¹⁷⁸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485。

¹⁷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06。

¹⁸⁰ 袁珂，《山海經校譯》，頁 184。

¹⁸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07。

¹⁸²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345。

¹⁸³ 袁珂，《山海經校譯》，頁 184。

猶言遽央，渠通遽，快、速之意；央，指盡、結束。¹⁸⁴末四句言以靈境飲食使自己不老不死，如此能與日月星辰共遊，壽命無期，是為人生最大福份。淵明此詩可見其性情自然，如能長生不死，願與天上星辰遨遊，與歷史上刻意追求長生不死的秦始皇、漢武帝直是不可同語。

〈讀山海經〉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¹⁸⁵

本詩化用《山海經》中有關夸父追日的故事。《山海經·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¹⁸⁶全詩直寫夸父與太陽競走的過程，夸父雖然最後仍不敵，但是死前所棄手杖化為鄧林，亦是其強烈意志的體現。古直《陶靖節詩箋》云：「案此託夸父以悼司馬休之之死也。《晉書》：『休之敗，奔後秦，後秦為(劉)裕所滅，乃奔魏，未至，道卒。』此絕似夸父之狀。抗表討裕，是與日競走；敗奔于秦，是飲于河、渭；秦亡奔魏，是北飲大澤；未至道卒，則未至道渴而死也。……休之雖死，餘黨猶多，藉魏之力，或可以乘劉裕之隙。『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靖節所以望也。」¹⁸⁷王建生認為此詩：「言己欲中興晉室，無能誅討劉裕也。只能『功竟在身後』。」¹⁸⁸觀詩末云「餘迹」、「功竟」、「身後」等語，或淵明實有所寄託感懷。

〈讀山海經〉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夭無千歲¹⁸⁹，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

¹⁸⁴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488。

¹⁸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08。

¹⁸⁶ 袁珂，《山海經校譯》，頁 201。

¹⁸⁷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488。

¹⁸⁸ 王建生，《陶謝詩選評注》，頁 131。

¹⁸⁹ 或作「刑天舞干戚」。作舞干戚者，始於宋人曾紘改易詩句五字，並無版本上的依據。王叔岷考察古書，以為「刑天」一詞古書作「形夭」，所指仍是古代傳說中與天帝大戰的神祇，而非以字面上「形夭」解作壽命短之義。刑夭與天帝大戰而敗北，受刑斷首，自無千歲之長命，然復以乳臍為眼口，操干戚以舞，猶欲與帝相爭之姿，其云「猛志固常在」亦合。因此「無千歲」於詩意亦通，或無須用改易文字的版本。見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 489-490。

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¹⁹⁰

首二句言精衛填海之事，《山海經·北山經》云：「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詒。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¹⁹¹次二句言刑天與天帝相爭之事，《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形夭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¹⁹²言刑天雖死，猛志則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謂生死如一，無所掛懷。黃文煥《陶詩析義》云：「因遊海故被溺，因爭神故被斷，是謂同物有慮。被溺而化為飛鳥，仍思填海；被斷而化為無首，仍思爭舞，是謂化去不悔。」「化去不悔」是矣。¹⁹³末二句則為淵明自我感慨與勉勵，徒設即空設，良晨即良辰¹⁹⁴，其謂精衛、形夭雖有往日雄心，但是良辰已過也就難再有時機了。此或為淵明因讀精衛、形夭故事而感慨自己一生志業或已無法完成。

又〈讀山海經〉其十一：

臣危肆威暴，欽馱違帝旨。竊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鷓鴣豈足恃？¹⁹⁵

古代神話中，所述如臣危、欽馱、竊窳、祖江等，臣危是貳負的部下，《山海經·海內北經》云：「貳負(人面蛇身的神)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竊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¹⁹⁶欽馱是人面獸形的神，《山海經·西山經》云：「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鴟殺葆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嶠崖，欽鴟化為大鶚，其狀如鵠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鷓鴣，其狀如鷓鴣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鷓鴣，其狀如鷓鴣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

¹⁹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10。

¹⁹¹ 袁珂，《山海經校譯》，頁 69。

¹⁹² 袁珂，《山海經校譯》，頁 191-192。

¹⁹³ 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合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下編》，頁 302。

¹⁹⁴ 王建生，《陶謝詩選評注》，頁 134。

¹⁹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13。

¹⁹⁶ 此文本在〈海內西經〉，袁珂移至〈海內北經〉，見袁珂，《山海經校譯》，頁 232。

鷓，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鷓，見即其邑大旱。」郭璞注云：「葆或作祖」¹⁹⁷窳窳本是人面蛇身之獸，被貳負及臣危殺害後，變形為人面馬足。《山海經·北山經》云：「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窳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山海經·海內南經》云：「窳窳，龍首，居弱水中。」郭璞注云：「窳窳，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¹⁹⁸祖江即葆江，為前述遭鼓與欽馭殺害的神祇。首四句言作亂者如貳負之臣危、欽馭雖強勢暴虐，但終被天帝所制裁；被殺害的窳窳因善於變化，故能死後復變身形而活，祖江不能變化遂不幸而亡。因此「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言善惡有則，上天明鑒，不可心存僥倖。「長枯固已劇，鷓鷃豈足恃」，「枯」指棄市暴尸，此言被天帝處刑。¹⁹⁹或作「梏」，為桎梏之意，亦通。²⁰⁰全詩主旨在「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二句，這是相當常見的道德勸說。古人解釋此詩時，或認為其有隱涉南朝宋武帝劉裕弑君一事，不過細觀此詩，並未有明確的寓含意味。袁行霈認為不可強解比附，此詩就只是《山海經》故事的摘錄，不一定非要有喻指不可。²⁰¹即神話題材為詩之意。

〈讀山海經〉其十二：

鷓鷃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²⁰²

《山海經·南山經》云：「曰柜山……有鳥焉，其狀如鷓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鷓，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²⁰³可知鷓鷃為國家有賢士被放逐的象徵。淵明由此聯想到屈原被楚懷王放逐之事，故云「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意謂楚懷王之世，國中多有鷓鷃來棲，這是國家動盪、朝政腐敗的表現。「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謂青丘之山有種鳥名曰「灌灌」，自言獨見不惑，《山海經·南山經》云：「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鷓，其音若呵，名

¹⁹⁷ 袁珂，《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42-43。

¹⁹⁸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278。

¹⁹⁹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351。

²⁰⁰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頁492。

²⁰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415。

²⁰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415。

²⁰³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10。

曰濯濯，佩之不惑。」²⁰⁴既然佩此青丘之鳥則為不惑，因此這是為了迷惑者而生的，非用以曉諭君子，故云「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首四句言國家有賢士被放逐而出現鷓鴣，末四句言佩之不惑的青丘之鳥本為迷惑的世人而生。此詩為淵明讀《山海經》，思及屈原被楚懷王流放而有感慨所作。

〈讀山海經〉其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²⁰⁵

巖巖，高峻之貌，此處指顯赫大臣。朝市，此處指朝廷官府。²⁰⁶「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謂在高峻、常人不可及的宮庭深處，作為帝王者當慎選人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來」，共指共工，鯀為大禹之父，重華指舜，鯀與共工皆為舜之大臣。共工作亂故被舜流放，鯀受命治水而不利，被舜處刑，此二句謂為什麼要放廢共工、鯀等大臣，原因在於舜放殺共工、鯀二人，卻用鯀之子大禹來治水，解決洪水問題，體現出舜慎擇大臣以盡其才，沒有偏見，這就是舜被稱為賢君的理由。「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仲父指管仲，姜公指齊桓公，此二句謂管仲向齊桓公建言遠離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等四人，反受桓公猜疑。²⁰⁷後來齊桓公病危，易牙等四人發難作亂，使桓公不得飲食，最後自盡於宮殿之內。故云「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及至此時方能醒悟，亦其時晚矣。

由上述可知，雖然有些詩作從詩題或詩文旨趣難以歸類其目，然陶淵明飲酒之樂、田園之景、懷古之情、閑居之思、詠史、借史事感懷、飄零之感等，也或多或少雜入其中，想要仔細而精確分類言之，恐不易完成。因此本章在處理陶詩的分類工作時，依詩題的記述以及內容旨趣上，大略分成飲酒詩、田園詩、詠懷詩三類，然此三類不必然涇渭分明，飲酒當中亦含田園風景，記田園生活亦兼懷古代隱士高人，懷古幽情亦或在飲酒之際，或詠史中亦有感懷，其實陶詩的一些特點經常揉作散見於其各個詩作而渾然天成。將其分類，只是為求更易窺見陶淵明的旨趣詩意，了解其詩作之所以絕妙處。

²⁰⁴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7。

²⁰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17。

²⁰⁶ 王建生，《陶謝詩選評注》，頁 138。

²⁰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18-419。

第五節 小結

陶詩在主題上可分成飲酒詩、田園詩、詠懷詩、詠史詩等等主題類型，在淵明的詩作當中，「酒」自是當中一個重要的象徵物，如以酒命題的〈飲酒〉二十首、〈止酒〉、〈述酒〉，或詩題與飲酒行為相關，如〈連雨獨飲〉，或詩文內容與飲酒關係密切，如〈九日閑居〉與〈己酉歲九月九日〉皆是在重陽日飲酒、〈蜡日〉則於歲末飲酒等等，或於序文中顯露出酒作為詩意起因，如〈停雲〉。筆者將這些詩作歸於飲酒詩一類加以討論分析，除〈述酒〉一詩其與飲酒之關係較不強烈以外，總合而論，此類作品多是因酒起意，飲酒為樂之作。〈飲酒〉二十首可謂是陶淵明飲酒詩之代表，詩中既有哲理者，亦有見諸性情者，或憶過往艱辛，或滿足閑適於現在生活，其內容是多樣性的。除〈述酒〉一詩為政治隱語之作，〈止酒〉或為遊戲之作外，其他詩作多為因酒寄情，由此可見陶淵明性情真摯的一面。

淵明之田園詩其內容大抵為紀實躬耕生活、描述田園風光，亦不乏言其現實的一面，如災荒乏食之悲痛。然陶淵明這些作品裡無論所處境遇為順或逆，他都勉勵自己當仿效古代隱士一樣過著質樸的農耕生活，反映出他經過出仕為官的生涯後，對於官場的厭惡，而一心嚮往於真正屬於自己的田園生活，因此無論遭受怎麼樣的困難，他始終以固窮守節、安貧樂道來要求自己。陶氏的田園詩除文字上的風景描繪堪比魏晉山水詩以外，其在詩文內對於君子固窮的精神意志之展現也是不可忽略的。

在詠懷、詠史詩方面，其內容而言，多為詠人物或懷古抒情，詠人物者，或為讚賞其人行事氣節，或以為當有適足效法自勉者，對陶淵明而言，以古代賢人隱士之事跡來勉勵自己保持志向，是使其於貧困生活裡維持其固窮守節意志的精神食糧。世間如遇陶淵明境遇而猶能固窮如此者幾希？也因為在陶淵明的時代，世人多馳車走馬尋求富貴，而無有問道於津者，因此陶詩詠懷古人，蓋亦出於與古人為友，慕其節操風骨而有感而發。

陶淵明其他主題之詩，或為因事而以詩記之，或為讀書感想而以詩記之，或無特定主題而作之者。由上述可知，雖然有些詩作從詩題或詩文旨趣難以歸類其目，然陶淵明飲酒之樂、田園之景、懷古之情、閑居之思、飄零之感等，也或多

或少雜入其中，想要仔細而精確分類言之，似是不易完成之舉。筆者處理陶詩的分類工作時，依詩題的記述以及內容旨趣上，大略分成飲酒詩、田園詩、詠懷詩三類，然此三類不必然涇渭分明，飲酒當中亦敘田園風景，記田園生活亦兼懷古代隱士高人，懷古幽情亦或在飲酒之際，相互融合。其實陶詩的一些特點經常揉作散見於其各個詩作而渾然天成。將其分類，只是為求更易窺見陶淵明的旨趣詩意，了解其詩作之所以絕妙處。

第四章 陶淵明的韻散文作品分析

本章為分析陶淵明韻文以及散文作品。陶氏的韻文即為辭賦類文章，這類作品淵源於漢魏以來文人的辭賦傳統，淵明的辭賦深受這種傳統影響。散文方面，筆者依前人在《陶淵明集》中的分類，概括為三種形式，其一為記傳文，其主題多為記述人事物；其二為疏祭文，為淵明寫與自己親人的文章，其筆調可見淵明真誠性情的體現；其三為贊文，為淵明針對部分歷史人物給予的評價論述，贊文一類的作品雖然篇幅不長，但是從中可見淵明投射其中的自我理想。

第一節 辭賦

陶淵明的文集中所收辭賦類的作品計有三篇，分別是〈感士不遇賦〉、〈閑情賦〉、〈歸去來兮辭〉。以下茲就作品內容、意境析論之：

一、〈感士不遇賦〉

此文作成時間多有異說，龔斌整理各種說法認為：

一說作於淵明歸田前期。古譜義熙三年(407)條以為賦中「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等語，與〈歸去來兮辭〉相發明，「殆彭澤去官後作也」。遼繫年¹謂作於義熙二年(406)。一說作於元興二年(403)丁母憂居家時，與〈癸卯歲十二月中與從弟敬遠〉詩同時作。一說作於晉宋易代後。如王瑤注繫之宋永初三年(422)。按，此文思想內容多與〈飲酒〉二十首相近。「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二句，顯指義熙末稱疾不應徵命事，故此文大致作於義熙十一二年間。²

袁行霈引文中「寧固窮以濟意」云云，以為當作於初歸園田之時，故繫於義熙三

¹ 指遼欽立《陶淵明事迹詩文繫年》。

²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369。

年(西元 407 年)。³兩說似可並存，惟袁氏以為此文作於彭澤去官未遠之時，細究文意，尚有不平之鳴。而義熙十一、二年(西元 415-416 年)之際，陶淵明是時作〈五柳先生傳〉，似已有淡然灑脫之感。兩相權較之下，或許〈感士不遇賦〉是時序上較早一點的作品。陶淵明在〈感士不遇賦〉的序文中交代了他緣何作此文的動機，序云：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⁴

序文言為昔日董仲舒寫過一篇〈士不遇賦〉，後來司馬遷也寫了一篇〈悲士不遇賦〉。我曾經利用冬季、夜晚、陰雨天等三餘之日，以及在研討學習時的閒暇中，閱讀了他們的作品，深為感慨而哀傷不已。遵守信義，不忘忠孝，是人類的美好品德；胸懷淳樸，心地清靜，是君子恪守的素志。自從淳樸的風尚消失，於是虛偽之風盛行，鄉里間已不再砥礪廉潔退讓之節操，而社會上也盛行取巧以為官職升遷的風氣。一些胸懷正直、立志治世之士，正當壯年而隱居不仕；一些潔身自好、節操清廉之人，卻徒勞終生。所以伯夷、叔齊和商山四皓都有著「吾將何歸」的嘆息，三閭大夫屈原發出「已矣哉，國人莫我知兮(〈離騷〉)」的哀怨。人生百年，轉眼即逝，建立功業十分艱難，卻得不到應得的賜爵封地。這就是古人慷慨揮筆，一再抒發而難盡其情的緣故。能夠抒發性情意志的，大概只有文章吧？撫著古人的書卷反復思考，於是深有感觸而寫下這篇文章。

該序文多以排比的文學筆法來使情感得到強化，如「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潔已清操之人」、「潛玉於當年，沒世以徒勤」、「安歸之歎，已矣之哀」等等，有的排比甚至在句組上加入對比性，如「潔已清操之

³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435。

⁴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431。

人，或沒世以徒勤」、「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等，這類技巧都使淵明在題目所云「感士不遇」上加強其「感觸」，正是因為對這種世道現象如此橫行而感慨萬千，在此「大偽斯興」的亂世，士之不遇意謂小人當道，故淵明對此有所感觸而作此賦。

陶淵明的〈感士不遇賦〉是受到漢代董仲舒〈士不遇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的激發因而寫就的，也包括伯夷、叔齊、商山四皓等人的隱退，及屈原〈離騷〉士不遇的感慨。清代劉熙載《藝概》卷三〈賦概〉評曰：

董廣川〈士不遇賦〉云：「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此即正誼明道之旨。司馬子長〈悲士不遇賦〉云：「沒世無聞，古人唯恥。」此即述往事、思來者之情。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云：「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此即屢空晏如之意。可見古人言必由志也。⁵

因此〈感士不遇賦〉一方面是感慨士不遇時而抱負難伸，另一方面也認為只有透過文章的流傳，才能使自己的志向理想傳達給後世，故云：「導達意氣，其惟文乎？」劉熙載以為此文有晏如之意，實則陶淵明在悲憤而自解的情況下完成此作。「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是其所憤，「撫卷躊躇」、「感而賦之」則是作賦自解其不平不滿。

〈感士不遇賦〉全文可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懷念上古時代民風純樸：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志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⁶

⁵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教師、五六級四班同學 編，《陶淵明詩文彙評》（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319。

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431-432。

文中之意為嘆息於承天地之氣萬物生育，為何這人類獨為萬物之靈！稟受神情意志而擁有智慧，藉三正五常之道而得以留名。或居鄉野以擊壤遊戲自得其樂，或出仕為官救濟天下蒼生百姓。人們無論是潛隱於鄉野或是躍顯於仕官，都自然而然本於性情。但是時光流逝，世事變遷，上古社會之風氣一去不返，人群間也漸分化為不同群體。捕魚之網密織而魚恐懼，捕鳥之羅大張而鳥心驚。通達明智之人善於覺悟，於是逃避官祿隱居躬耕。高峻的山嶺中有隱士的身影，廣闊的河流上有隱士的歌聲。遙想遠古治世深深嘆息，甘居貧賤而辭退榮華虛名。世間純樸之風如清澈流水之源頭，最終不斷分出支流而善惡美醜遂涇渭分明，成為不同的路途。推究各種行為中可貴者，莫過於施行善事最可歡娛。遵從上天既定之命，效法聖人所留傳的典籍。忠於君主，孝敬雙親，於鄉里間塑造信義。憑真誠之心獲得顯達，不虛偽做作祈求名譽。

這部分最為關鍵的文字是「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賦題說感士不遇，因此士所以不得遇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無法「矯然而祈譽」，在淵明看來，小人所以得遇，是因為他們虛偽地掩飾自己，偽裝自己的言行舉止以符合朝廷的需求，這樣便能獲能聲譽，從而為官。兩漢時期的仕官制度是察舉制，仕官與否是以鄉里的地方官是否推薦給上級中央。這種制度使得許多想要從官的士人不惜矯揉做作，刻意製造出自己或親友忠孝友愛的風評，以便博取地方官的好感，從而獲得推薦。這種情況演變到魏晉時期的九品官人制，猶復如此。淵明說「推誠心而獲顯」是一種對古代理想社會的美好想像，其乃相對於現實情況下的「矯然而祈譽」。

第二部分為歷數當世種種不堪之現象，而為前賢抱不平：

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祇脩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⁷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慙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

⁷ 指爰盎，《史記》作袁盎，《漢書》作爰盎，袁、爰兩字互通。

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慟眾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⁸

「雷同毀異」，人云亦云誹謗異己，憎恨別人在己之上。把聰明之人說成糊塗，將正直之士視為狂妄。坦誠公正無猜忌，最終受辱遭誹謗。雖懷美玉握蘭草，徒然芳潔而有誰稱揚？悲哀呀！賢才不被重用，那是沒趕上炎帝、帝魁(神農名，或曰黃帝子孫)時的太平盛世。恭敬修身獨自勤勉，每日三省吾身何能廢棄。願修治德行等待良機，但良機既至卻不順利。若非爰盎向漢文帝舉薦，則張釋之將默默無聞。可憐馮唐年老而僅任中郎署長，依靠為魏尚辯解被漢文帝採納才得以升遷。張釋之、馮唐等人雖勉強可謂終有知遇，卻也苦心經營許久而荒廢許多年歲時間。明知市場上確實沒有猛虎，然則三人說有便會受到蒙蔽。可哀賈誼才華出眾，讓這樣的駿馬竟置於狹窄空間而無所奔馳。可悲董仲舒學識淵博，仍屢遭危難而倖免一死。感慨哲人孤獨不遇，淚縱橫而沾濕我衣。恭承過去往聖先王的清明教誨，其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語出《老子》)天道清澄可以明察，幫助善者保佑仁人。伯夷叔齊到老挨餓，顏回早逝家境甚貧。為請求孔子賣車以葬顏回而傷感，為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以至亡身喪命而悲痛。雖然顏回好學，伯夷、叔齊行仁義，然而為何這樣的賢人無論生死總是艱難辛苦！如此報答有德之人不免令人起疑，因而恐懼「天道無親」這句話徒為空論。哪裡是世世代代沒有賢才，只是因條條道路皆被阻塞。古人所以感慨悲歎，憂慮功名不得建立。李廣年少即從軍疆場殺敵，蓋世之功封萬戶侯也不愧。這樣的雄心壯心被羞辱於外戚小人，竟然尺寸土地未得賞賜。真誠信義留在身後，感動眾人為之悲泣。漢成帝時王商竭力謀劃拯救弊端，開始順利後而自身卻招致禍患。為何施展才能的良機易盡，為何陷害忠良的邪心焦急！

該部分以六個漢代人物、兩組古代賢人來申論士之不遇的原因，一開始淵明

⁸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432-433。

即以「雷同毀異，物惡其上」來點破何以有才之士為何不受重用，「雷同」一詞出自《禮記·曲禮上》：「毋勦說，毋雷同。」⁹意思是不要剽取他人的說法，不要隨意附和他人說法。鄭玄注云：「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¹⁰這是說打雷的時候因為雷聲很大，這時所有的聲音都會被雷聲蓋住，形成只有雷聲這個聲音。淵明用「雷同毀異」此典故，顯然喻指雷聲為當時社會中的時論、潮流，淹沒了那些不欲「時變」的士人。因為忌妒這些才識或在其上的人，就詆毀他們，使他們終不得遇。張釋之、馮唐雖然得遇，但也浪費許多歲月光陰；賈誼、董仲舒則遭受流言，前者不被重用，抑鬱而終。後者不敢暢言，掩沒才華。這四個人都有所才幹，卻因故不能在適時適地展現出來，「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言時不我予，「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¹¹謂人言可畏，這都是士所以不遇的原因之一。由此淵明再以質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感嘆伯夷、叔齊、顏回之不得善終，「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既為古賢之死痛惜，也為其時志學行義的士人感到不值，「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如果「天道無親」這句格言其實是虛假的，那麼士人又要以什麼砥礪自己的心志，以面對這樣苛刻的世道？李廣、王商立有功勞，但也因小人流言而不能獲得公平對待，若說伯夷、叔齊、顏回是立德的典範，那麼李廣、王商當是立功，二者皆不能使之有遇於時，無怪乎淵明為此深感不平。

第三部分為砥礪自己不向時勢屈從，當效法古代賢人隱士之風骨：

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狐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¹²

其大意为蒼天遙遠，天命不可知，人事不止，其變化也難以預料。世間諸事或有

⁹ (清)孫彬，《禮記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9。

¹⁰ (清)孫彬，《禮記訓纂》，頁19。

¹¹ 《戰國策·秦策二》云：「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者不殺人。』置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置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逾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見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頁135。又，袁行霽認為「審夫市之無虎」，出自《韓非子·內儲說上》，可供參考，見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443。

¹²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433。

可感應者，亦有昧而不覺者，但誰能探究其中道理？寧願固窮守節來成全自己的意願，也不願委曲事人而損害自己。既然仕途艱險難得榮耀，難道破袍在身就算羞恥？誠然是謬取守拙之路，但且欣然歸田隱居以避世。懷抱孤介之情安度此生，謝絕官府開出的優渥條件。

面對「天道無親」這說法的疑惑，淵明則回應以「固窮」作為士有不遇的應對之道。達則踐道，窮則守道，既然「固窮」是君子當為的義務，又怎麼會以己身貧賤引以為恥，這是淵明在〈感士不遇賦〉中告訴我們的人生體悟。雖然在時人眼中是「取拙」的決定，但是就淵明自己而言，心態上卻是「欣然」接受。故可以「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自安於田園躬耕生活。

袁行霈評論此文以為：「從上古說起，對淳厚之風嚮往之至。既而密網裁、宏羅制，達人逃祿歸耕，而入仕者命運多舛。歷數張釋之、馮唐、賈誼、董仲舒、伯夷、叔齊、顏回、李廣、王商等人事迹，感歎不已。最後歸結自己之人生態度，更加堅定歸隱決心。」¹³林美君認為陶淵明所以取董仲舒〈士不遇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以為仿效，是因為其直抒胸臆、坦率表達的方式深得其心，不同於《楚辭》中宋玉以及西漢賦家以來的為個人際遇感傷的狹小格局，較諸藉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的牢騷語，這種表現手法更合乎淵明的任真性格。¹⁴

二、〈閑情賦〉

本文作成時間難以確定，袁行霈繫於晉太和五年(西元 370 年)，依袁氏所制陶淵明年譜，適時為十九歲。¹⁵此說似斷年過早，雖序文有「余園閭多暇」之語，然亦難言此即少時之作。龔斌則引諸家說法云：

古直《陶靖節詩箋餘錄》據〈五柳先生傳〉：「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二語，以為此賦乃淵明「少年示志之作」。王瑤注謂淵明太元十九年(394)喪偶，此賦或即這年所作。逵注¹⁶謂作於淵明彭澤致仕後，「以追求愛情的

¹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48。

¹⁴ 林美君，〈試論陶淵明〈感士不遇賦〉的傳承與創新〉，《醒吾學報》(新北市：醒吾科技大學)，48 期(2013 年 8 月)，頁 85。

¹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52。

¹⁶ 指逵欽立《陶淵明集》。

失敗表達政治理想的幻滅」。或說作於晉宋易代之晚年，與〈感士不遇賦〉作於同時。按，賦序云：「余園閭多暇。」賦云：「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作於少年說及作於晚年說皆與「當年之晚暮」不合；且此賦熱情奔放、詞藻華美，不太像是晚年之作。故諸說中以遠注較可取，惟確切年份無可考。¹⁷

袁行霈認為將〈閑情賦〉視為是寄託之作，可能是從陶淵明其他作品作為參照，從而依陶氏作品有此慣例而推論此文或乃有所寄託，然而這種看法並非是從文本當中的脈絡推敲出來的結果，不免論說無證。¹⁸綜合以上所論，〈閑情賦〉文字誠如龔斌所說的多為熱情奔放，其文風不似歷經滄桑後的晚年之作，但是龔斌所認同的寄託之說似又難與文意相合。「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亦或有傷春悲秋之感，此亦年少常有之情感表現，斷年雖無定論，但筆者以為可能當三十歲以前之作品。

〈閑情賦〉序云：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¹⁹

有關〈閑情賦〉之創作動機，或許當從「閑」字的考察著眼。龔斌云：

閑：道德，法度。即賦序「終歸閑正」之閑。《論語·子張》：「大德不踰閑。」《廣雅·釋詁一》：「閑，猶法也。」或訓閑為防閑，或訓為悠閑，皆不確。²⁰

龔斌以為「閑」當作法度來解釋，不過袁行霈則有不同看法，其云：

《說文》：「閑，闌也，从門中有木。」注：「以木拒門也。」引申為「防」、

¹⁷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382-383。

¹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59。

¹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48。

²⁰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382。

「限」、「閉」、「正」。《廣韻》：「閉，闌也，防也，禦也。」《廣雅·釋詁》：「閉，正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故君子閉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可見「閉」有防閉之意。《閑情賦序》曰：「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止。」則「閑情」猶正情也，情已流蕩，而終歸於正。《序》又曰：「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抑」者，止也，與「閑」義近。《閑情賦》末尾曰：「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憩」者，止也，與「閑」亦義近。以上內證足以說明「閑情」意謂抑憩流宕之情使歸於正也，與淵明在序中所謂張衡《定情賦》、蔡邕《靜情賦》之「定」、「靜」意思相符。此外，「閑」之意義可參看王粲《閑邪賦》，「邪」字已指明此類「情」之性質。²¹

袁說較為完整，似亦含納龔說意指。由此可知，〈閑情賦〉一方面是陶淵明欲以仿效漢賦之勸諷作用，因此「閑情」則有防堵胡思亂想而使情緒歸於正道之意，而另一方面其內文又不能不合於賦體結構，是以文中多有鋪張雕工於情感之描繪。從文體發展演變的情況來說，陶淵明的〈閑情賦〉正是承襲了漢魏文人的閑邪傳統，陳成文以為：「以賦的體裁抒寫愛情的遐想，最後歸於閑正，是漢魏閑邪賦的感情基調，考察漢魏辭賦閑邪主題的發展脈絡，可看出其間演變的痕跡。」²²當然，從現代人的觀點，對愛情的嚮往，抒寫愛情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

序文言當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收斂放蕩之辭而以恬淡寡欲為本，賦的行文初始則放開思緒無所約束，也許是年輕熱情奔放，最後則作結於閒雅大方，後歸於理性。用它來遏止放蕩的邪心，想來有助於委婉勸諫。所謂文學之士，其後歷代相繼皆有創作賦體。因觸及同類事情而有所感發，在文辭和內容上加以擴展和發揮。淵明居家時多有空閒，也提筆寫了一篇。雖然文筆不夠美妙，或許不會偏離前代作家的用意吧？

本賦文可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讚揚賦文所歌詠的對象，多用直接描述的手法：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豔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

²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51-452。

²² 陳成文，〈析論陶淵明〈閑情賦〉〉，《人文社會學報》(台北市：國立台灣科技大學)，10：2(2014年6月)，頁 147。

以比絜，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讐。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²³

文中言如美玉般的姿容，何等超邁，舉世無雙出眾超群；容貌豔麗可以傾城，追求美德遠近傳聞。高潔可比佩玉脆音，能與幽蘭相競清芬。輕視世俗懷柔情，高雅脫俗志凌雲。悲清晨陽光易遲暮，哀人生在世長苦辛。人生同樣百年盡，樂何其少而愁何其多！揭開紅幕正襟坐，彈奏清瑟自歡欣。纖指奏樂美妙無窮，皓腕抬起袖舞紛紛。目光轉動顧盼生姿，似笑非笑難以區分。曲調彈奏近一半，日光落在西窗前。悲涼秋風吹林木，白雲繚繞依遠山。時爾抬頭望天空，時爾俯首奏鳴弦。神情儀態多嫵媚，舉止安詳且嬌妍。清音激蕩使我感動，願得促膝相對交談。欲自前往結下誓言，又怕違禮不敢冒犯。期待鳳鳥為我傳言，唯恐他人搶在我先。內心疑懼不得安寧，神魂屢變片刻之間。

第一部分淵明虛構一位外貌絕艷，品格高尚的美女，此美女「表傾城之豔色，期有德於傳聞」，並且「佩鳴玉以比絜，齊幽蘭以爭芬」，這樣的措詞使人聯想到那些潔然自身的君子，事實上，淵明篇首即云「獨曠世以秀羣」，這是他與其他漢魏閑邪主題的賦作不同之處，我們試以比較：

張衡〈定情賦〉	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 ²⁴
蔡邕〈檢逸賦〉	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 ²⁵
阮瑀〈止欲賦〉	夫何淑女之佳麗，顏以流光。 ²⁶
王粲〈閑邪賦〉	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艷逸。 ²⁷
應瑒〈正情賦〉	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哲。 ²⁸

²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48-449。

²⁴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 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477。

²⁵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 輯校，《全漢賦》，頁 596。

²⁶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 輯校，《全漢賦》，頁 617。

²⁷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 輯校，《全漢賦》，頁 682。

曹植〈靜思賦〉	夫何美女之爛妖，紅顏曄而流光。 ²⁹
陶淵明〈閑情賦〉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

由上述整理可以發現，張衡等漢魏賦家所作的閑邪主題之賦，其篇首幾為形容美女之艷容華貌，只有陶淵明的賦文云：「獨曠世以秀羣」，令人不得不聯想到他的詩文中出現的固窮守道、遺世獨立的君子形象。也因此，淵明在賦中對於美女之形容，與其他賦家相比，少了對容姿的摹寫，反而增添了不少氣質、品格上的描繪，如「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神儀嫵媚，舉止詳妍」等，這些都顯示出淵明雖模仿於漢魏賦家的閑邪主題，但是並不因襲於舊有的書寫手法，表達遇溫文儒雅的美女。

第二部分部分運用譬喻將自己與歌詠對象的周身事物相作連結，每段譬喻前半部分為正面歌頌，後半部分為反面哀愁：

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玄鬢於頰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為扇，含淒颺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³⁰

文中言願隨她身化為衣領，承享頭上華美芬芳；悲歎夜來脫下衣衫，漫漫秋夜棄我於一旁。願隨她身化為裙帶，束在她那細腰之上；歎氣候不同冷暖變，脫去舊衣又換新裝。願隨她身化為髮油，塗刷秀髮垂在柔肩；悲歎美人經常洗髮，水沖我去變為枯萎。願在她身化為眉黛，伴隨眺望安閒輕揚；悲歎脂粉講究鮮豔，華

²⁸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 輯校，《全漢賦》，頁 729。

²⁹ 越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頁 37。

³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49。

豔梳妝將我毀傷。我願化作一張草席，秋日輕托她那玉體；悲歎為那皮褥代替，再過一年才被想起。願在她身化為絲鞋，伴隨玉足前後周旋；可悲行止總有節制，晚上休息棄我床前。白天我願做她身影，形影相伴不離行蹤；悲高樹之蔭將影遮，歎不能總是相隨從。夜間我願化為明燭，柱旁照見如玉顏容；悲歎東方日放光芒，忽將燭滅不再光明。願隨她身化為竹扇，玉手握持微扇涼風；悲歎霜露清晨降落，將我遠棄已無可用。我願化為一段桐木，做成鳴琴躺她膝上；可歎樂極便又生悲，最終推我中止音響。只有對愛情的憧憬，在閑適心情下，才會表現的如此淋漓。

此部分運用了大量的排比修辭，同時也運用了示現、感歎、類疊等手法營造出作者強烈之情感。³¹細數十願，「領」、「帶」、「席」、「履」為貼身之實體外物；「澤」、「黛」為當時女性之化妝品，「澤」是潤髮用的脂膏，「黛」是畫眉用的染料；「影」、「燭」為外在環境之現象，「影」指物體的陰影，「燭」指夜晚的燭光；「扇」、「桐」為怡情器物，分指扇柄與琴身。比較於漢魏其他賦家之作，淵明此十願文句在結構上由雙句增至四句，並擴充出由正面之願轉入負面之悲的聯想：

陶淵明〈閑情賦〉	漢魏賦家之作
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 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	願為環以約腕。(〈閑邪賦〉) ³²
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 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	願在面為鉛華兮，患離塵而無光。(〈定情賦〉) ³³
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 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	思在口而為簧鳴，哀聲獨而不敢聆。(〈檢逸賦〉) ³⁴

由此可看出，淵明作此十願，將所願之化物以及與美人的互動關係描寫的更具體生動。至於十悲，也將擔憂美人停止與化物互動的原因表露出來，使得淵明〈閑情賦〉較諸漢魏賦家更能使讀者的想像空間為之擴大、豐富。

³¹ 劉楚荊，〈〈閑情賦〉修辭美學〉，《中國語文》(台北市：中國語文月刊社)，114：6=684(2014年6月)，頁44。

³²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 輯校，《全漢賦》，頁682。

³³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 輯校，《全漢賦》，頁477。

³⁴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 輯校，《全漢賦》，頁596。

第三部分則以賦體「勸百諷一」的傳統，將文章主軸由歌詠對象轉移至自我心志上的反省：

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禁。竟寂寞而無見，獨悵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昂盈軒，北風淒淒。耿耿不寐，眾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托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滯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³⁵

此段，就文氣而言是一個轉折。我所願皆難實現，徒然思慮愁苦我心。滿懷憂愁無處訴說，獨自徘徊在那南林。垂露木蘭樹下棲息，隱蔽我身青松之蔭。徘徊之間倘若相見，歡欣懼怕交織於心。始終寂寞不見身影，獨自憂思空自找尋。輕提衣襟返回原路，目視夕陽悲歎無限。步履徘徊忘記前行，心中憂慮臉色陰慘。樹葉瑟瑟離開枝條，涼風淒淒天已漸寒。日帶光影一同隱沒，月色美好現於雲端。孤鳥哀鳴獨自歸，隻獸尋伴尚未還。正當壯年傷遲暮，可恨今歲將盡。我盼夜夢與她相伴，神思飄蕩恍惚不安。比如乘船失去船槳，又似登山無處可攀。此時窗前繁星滿天，北風颯颯無限淒寒。胸中耿耿徹夜難眠，各種念頭索繞心間。起身束帶以待清晨，繁霜粲粲佈滿白階。雄雞縮翅尚未啼鳴，笛聲悠遠傳送清哀。開始細膩閒雅平和，曲終嘹亮使人心碎。料想佳人就在此處，寄託行雲以送情懷。行雲消逝並無語言，時光漸逝隨即已過。徒然苦思自尋悲念，最終仍被山河阻隔。面對清風消除煩憂，雜念付與東流之波。痛斥〈蔓草〉男女私會，當誦〈召南〉正大詩歌。坦露內心保持真誠，放蕩思緒已當止遏。對於愛情，思之不得，求之不得，只能轉念。

³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49-450。

此部分以「考所願而必違」將全文語氣急轉直下，前面所述的十願自然皆只淵明獨自幻想，而所願必違的口吻也暗示作者明白這些都是不可能成真的。但是淵明似乎在文中仍間接透露出自己仍有所期待，或有人指出：「在〈閑情賦〉中，淵明不斷有與心上人不期而遇的期待心理，甚至刻意去製造巧遇的機會。」此即：「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禁。竟寂寞而無見，獨悵想以空尋。」甚至於「耿耿不寐，眾念徘徊」，但欲求見伊人，此處「眾念」亦可玩味，其中既有欲以見之的念頭，也有懼不能見的想法，想像伊人在茲的情境，實際上又明白伊人實不在茲的現實，這些諸多思緒被包裹於「眾念」當中，而詩人猶獨自徘徊於現實與幻想裡頭。事實上，淵明在文末提到的《詩經·鄭風·野有蔓草》，本身即是指男女不期而會的詩作，雖然淵明自斥其非，但是從刻意提到此詩來看，似乎反而更顯其內心對於心上人邂逅相交之事眷戀不已。亦或就受《楚辭·離騷》影響，屈原於楚王比喻成「美人」，希望能與美人成婚，寓君臣相合；可惜的是，「美人」只能存於心中，無法成就結婚的美夢。

此賦評價向來正反兩面皆有，反面意見如龔斌所引蕭統〈陶淵明集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風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³⁶顯然在當代人眼中，即便對陶淵明讚譽有加的昭明太子蕭統，對〈閑情賦〉也不免有所微詞。正面意見如袁行霽所引蘇軾《東坡題跋·卷二·題文選》云：「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³⁷無論如何，此賦對歌詠對象多所運用文學筆法描繪其神韻姿態，亦僅於文末略加告誡自己當使胡思亂想的思慮回歸於誠心，而篇幅其實幾乎是言情文字，因此將〈閑情賦〉視為是陶淵明的懷念故主、有所寄託之作，恐怕是不太適宜的。或有人指出：「如果這是一篇託諷之作，對美人的思慕即是對國君對大道的依戀、對自悲身世、對聖君明王的眷念，這怎麼算是淵明序文中所自我否定的『逸辭』？又怎可說是『邪心』呢？何須『防檢』？何須『抑止』？歷來對此賦的託諷一說，實是脫離客觀的作者自序文本，而出於讀者主觀的詮釋或自我投射，並非淵明本心。」在傳統的禮教下，不能對淵明〈閑

³⁶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389。

³⁷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459。

情賦〉作一合情合宜的解說，是有些遺憾。

三、〈歸去來兮辭〉

有關「歸去來」一詞的釋義，袁行霈考證認為：

先秦文獻屢見「歸來」一詞，如《楚辭·招魂》：「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戰國策·齊策》：「長鉞歸來乎！食無魚。」此後仍不乏用例，如淮南小山《招隱士》：「王孫兮歸來！山中不可以久留。」王褒〈碧雞頌〉：「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來」字置於「歸」字之後，有強調、呼喚之語氣，而其意義或已虛化，……不言歸去，而曰歸來，歸來猶歸去，其方向性已經虛化。至於「歸去來」乃六朝習語，《樂府詩集》卷二五梁鼓角橫吹曲〈黃淡思歌辭〉其四：「綠絲何葳蕤，逐郎歸去來。」……《樂府詩集》卷八九《梁武帝時謠》：「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總之，「歸去來」之涵義重在「歸」字，而「去」、「來」之方向性已逐漸淡化，重在表示強調、呼喚之語氣。³⁸

因此「歸去來」一詞其實偏義於「歸去」一義。此文作成時間並無疑義，由序文中所寫「乙巳歲十一月」，可知作於晉義熙元年(西元 405 年)，陶淵明剛辭彭澤令歸園田居之時。³⁹

序云：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餽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稔，過足為潤⁴⁰，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

³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64-465。

³⁹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393。

⁴⁰ 原作「足以為酒」，袁行霈以為此序文極為莊重，首言「耕植不足以自給」，亦言「飢凍雖切」，因此「足以為酒」似過於詼諧，或不合序文之意。從袁說改之，見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61-462。

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⁴¹

家叔當指陶夔，陶夔時任尚書，而非地方性的刺史，因此「遂見用於小邑」一語，可能並不是陶夔任用陶淵明以為職官。袁行霈認為「家叔以余貧苦」的「苦」字或當「告」字形誤，故情況應是陶夔知陶淵明家境貧困之窘況，將此情形告知諸侯，而推薦陶淵明以作吏職。⁴²其說似較合理。文中「風波」一語概指桓玄篡晉，劉裕起兵討伐桓玄之事。可見當時政治風波不斷，故陶淵明希望求任於住家附近的職官，以避時局動盪。然則從事官場，畢竟不合陶淵明的本性，為官八十餘日後，感到愧對自己平日的志向，因而最後還是掛冠求去，歸隱田園。

序文言我家貧窮，靠種地不夠養家糊口，幼子又多，米缸裡沒有餘糧，如何才能得到生活所需，我實在沒有辦法。親戚朋友多勸我去謀個官職，我內心豁然有所動念，只是一時沒有門路求得。適逢多事之秋，諸侯以施愛於人為美德，叔父因我貧苦而舉薦我，於是我被任命在彭澤這個小縣做縣令。當時時局不定，心裡害怕到遠處做官，彭澤縣離我家僅有一百里地，作為俸祿的官地中的收穫，剛好足夠支應開銷，所以我就請求做彭澤縣令。到任後不久，因思念家鄉便產生了回家的念頭。為什麼呢？我生性真率自然，不是勉強自己做作得來。挨餓受凍雖然痛苦，但違背本心卻更加痛苦。以前也曾出仕為官，都是為了養家糊口、填飽肚皮而自我驅使。於是惆悵感慨，內心激動不平，為有負于平生報國之志而深感慚愧。本指望幹滿一年之後，便應該收拾行裝乘夜悄然離去。不久，我那位嫁給程氏的妹妹在武昌去世，按情理應當疾速奔赴那裡，所以我也就自己免官離職。從仲秋到入冬，在任八十多天。因辭官歸隱這件事順遂了我的心意，所以寫此文章題為〈歸去來兮〉。時為乙巳年十一月。

正文可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言去官還家的喜悅：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

⁴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60。

⁴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68。

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⁴³

文中言：歸去吧，田園將要荒蕪，為何不歸？既然知道仕宦是追求物慾而奴役精神，明知此事自己所為，何必惆悵獨自悲！深知往事不可挽救，來日尚可努力追回。確實迷路好在不遠，感到今是而昨日為非。歸舟漂蕩輕快飛揚，寒風飄飄吹拂我衣。問行人前程有多少，恨天未亮晨光暗昧。一眼望見我家陋宅，心中歡快向前飛奔。年輕童僕上前歡迎，幼子盼望等在家門。家園蕭條近於荒廢，青松秋菊尚喜猶存。領著幼兒進入室內，已備有酒滿滿一樽。取來酒壺舉杯自飲，在家中漫步心喜開顏。靠在南窗寄託孤高之情，深知居室雖小卻自適，易得安閒。每天漫步家園有趣味，院中雖有柴門常閉關。拄著拐杖漫步休息，時爾抬頭遠眺閑觀。閑雲悠悠飄出山間，鳥兒疲倦也知飛還。夕陽漸暗日將落山，撫持孤松而流連，自己的內心與孤松似乎連結在一起。說出自己從政是「心為行役」，所以辭官歸去，而後，心情舒暢，所見景物亦舒暢情景。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可說是淵明對於自己前半生的經歷感到難以忍受而揚棄的最佳寫照，「今是」呼應了「來者可追」，正說明淵明經過各種考量後，選擇徹底歸隱田園以免違背本性之「往過」一錯再錯下去。「舟遙遙」、「風飄飄」既形容返家途中之心情，借著風飄舟搖來襯托。同時也露透出淵明歸心似箭的心情。回到家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儘管離家仕宦期間居宅環境多已荒廢，然而看到所植松、菊仍然欣榮，不免感到安慰。因松樹與菊花，正是他精神象徵。此景其實也是淵明當時心情的反映，雖然出仕為人效犬馬多年，然而心中對於君子氣節松、菊般的理念，絲毫未有減損，「就荒」暗喻淵明家中無人整理，荒蕪多年。但是「猶存」也透露出淵明並沒有因為在宦海沉浮就拋棄自己的理想。「雲無心以出岫」謂浮雲裊繞於峰巒之間，悠哉悠哉。這是說淵明即使多年出仕，其心性本就無意於如俗常之人汲汲於官職上，因而「鳥倦飛而知還」，

⁴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60-461。

此處寓意有二：其一是知「倦」，知道自己其實倦於這種官場生活；其二是知「還」，知道應當在什麼時候回歸於本性自然。淵明在此處隱隱表現出其人生哲理，歸向自然。

第二部分言返家後的各種自然風光以及與親戚、鄰人之交流，使其再次領悟為官非其心願所在：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⁴⁴

末言歸去吧，讓我與世斷絕不再交遊！世俗與我互不相容，還駕車出遊何所求？心喜親戚知心話語，愛好琴書可消我憂。農民們告訴我春天來到，我將從事春耕西邊田頭。有時駕著帶帷馬車，有時劃起一葉小舟。山溝深遠尋幽探勝，道路不平經歷山丘。草木茂盛欣欣向榮，涓涓泉源細水慢流。羨慕萬物皆得其時，感慨自身生命將休。算了吧，人生在世能有幾時，何不隨心聽任去留？為何要匆促不安而又要到哪裡去？榮華富貴非我所願，神仙世界不可希冀。盼望佳日獨自出遊，或者躬耕整理田地。登上東面高崗縱情長嘯，面對清澈溪流吟誦新詩。姑且順應自然變化了此生，樂天安命還有什麼可懷疑！「樂天知命」，順應自然，是本文主旨。

此段之「請息交以絕遊」，這是說淵明此後不再與人交友了嗎？當然不是的，淵明歸隱後，仍有一些友人前去攜酒拜訪，未嘗拒之門外。那麼這句話應當怎麼解釋？事實上我們從「富貴非吾願」可以推測出，淵明所以云「息交」，是指建立於出仕為官作為目的的友誼，可以斷絕了，至於不以遊宦為目的的友誼，是可以繼續維持的。正是因為「世與我而相違」，那些世俗的官場作為違反了我的本性，遠不如歸隱後「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同時淵明也在此認識到，「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這樣的耕讀生活，

⁴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61。

才是他所追求的境地。既不求富貴之門，也不嚮往天帝之鄉，神仙世界。富貴與帝鄉皆示人之有所求，而淵明既已歸隱，徜徉於自然，耕田讀書而無不自得，安身立命，不須外求。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卷五引歐陽修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⁴⁵因為該文表現淵明順應自然的真性情。

第二節 記傳文

陶淵明的記傳文有三篇，分別是〈桃花源記〉、〈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除文章外尚并錄〈桃花源詩〉一首，以下茲就析論。

一、〈桃花源記〉并詩

〈桃花源記〉并附〈桃花源詩〉，為陶淵明頗著名的記敘文。其中「桃花源」是否真有其地，歷來不乏學者考證。龔斌引諸家說法云：

關於桃源之有無及究在何地，古今異說紛紜。康駢稱淵明所記桃源，「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見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卷六引）。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四十〈送劉武陵詩引〉謂「古桃源實在武陵境內。」杜維耀〈桃源洞說〉謂桃源洞去桃源縣邑治三十里。（見清余良棟等修《桃源縣志》卷十三）近人陳寅恪撰〈桃花源記旁證〉，博引《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等地理著作，疑〈桃花源記〉之取材，「間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從劉裕入關途中所聞見。」《桃花源記》「殆取桃花源事與劉麟之二事牽連混合為一。」「真實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真實之桃花源後人先世所避之秦乃符秦，而非嬴秦。」⁴⁶

龔斌對於這些欲以認為「桃花源」實有其地、實有其事的說法予以反駁：

桃源實在武陵說，蓋附會文中「武陵人捕魚為業」一語。陳寅恪氏據地志

⁴⁵ 轉引自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00。

⁴⁶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09。

中有「桃源」、「桃林」、「桃林塞」、「桃林宮」之名，遂謂桃源在北方，淵明或得知劉裕參軍戴延之入關途中之見聞。此殆臆說而已。一是天下桃源其名其地，所在皆有，非僅見於關中。二是戴延之欲泝洛川竟不達其源之事，淵明何由知之？淵明故友羊長史固銜使秦川，但非與戴同行，未必知戴事。陳氏又因主桃源在北方之說，故稱桃花源居人先世乃避符秦，而非嬴秦。……若避符秦，則符堅之亡國距宋武入關不過三十年，顯與「俎豆猶古法」等與難通。⁴⁷

袁行霈以為〈桃花源記〉本為一仙境故事，其與一般的神仙故事亦無太大不同。⁴⁸因此故事中種種人事地物亦不必有其實指，此誠如先秦以來的寓言故事體裁，其中有所寄寓作者意旨，而不必問其是否真實存在發生。

此文的撰寫時間應當是陶淵明晚年時期，龔斌以文中云「晉太元中」，以為當入劉宋後方云「晉」，屬於追敘之筆；且〈桃花源記〉文筆精妙，境界神高，亦不似少年之作，因此龔斌繫年於宋永初二年(西元 421 年)。⁴⁹袁行霈則參酌諸家說法，繫於宋永初三年(西元 422 年)。⁵⁰無論如何，此詩作成詳細時間固難以斷言，惟可以確定的是當作成於晉亡入宋以後，這大概是學者公認的。〈桃花源記〉文云：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⁴⁷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09。

⁴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83。

⁴⁹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05。

⁵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85。

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⁵¹

「外人」一語，於文中出現三次，袁行霈皆作桃花源以外的人⁵²，龔斌則認為「男女衣著，悉如外人」當中「外人」乃指「方外之人或塵外之人」⁵³，從文中脈絡來看，桃花源人見漁人則大驚，必當是服飾已明顯不同，故知非桃源中人。

文中言晉朝太元年間(西元 376-396 年)，武陵郡有一位以捕魚為生的人。有一天他划著小船沿溪前行，忘記走了多遠。忽然遇見一片桃花林，溪水兩岸百步之內，除桃樹外沒有其它雜樹。芳草鮮豔美好，落下的桃花瓣飄飄灑灑。漁人十分驚異眼前的景色。他繼續往前划行，想走到桃花林的盡頭。桃花林的盡頭也正是這條溪水發源的地方，這裡有一座山。山間有個小洞口，隱隱約約透出一點光亮。漁人離船上岸，進入山洞。山洞起初很狹窄，僅容一個人通過；再往前走幾十步。便一下子開闊明亮起來。只見土地平坦廣闊，房屋排列整齊，這裡有肥沃的田地，清澈美麗的池塘，還有桑樹、竹子之類；田間小路交錯相通，還能聽到村落間雞鳴狗叫的聲音。那裡來來往往耕種田地的人們，不論男女，衣著打扮同山外的人有所不同。不論是老人還是兒童，都顯得那麼愉快而自得其樂。他們看到漁人，十分驚訝。問他從何處來，漁人都作了回答。山裡的人邀請漁人到家裡，為他擺酒，殺雞，做飯款待他。村裡聽說來了這樣一位客人，都跑來打聽外界的消息。據山裡的人自己表示，他們的祖先為了躲避秦朝的暴政，帶領妻兒、鄉親來到這與外界隔絕的地方，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出去過，於是同外面的人斷絕了來往。問如今外界是什麼時代，他們竟不知有過漢朝，就更不用說曹魏和晉室了。漁人把自己所知道的外界之事一一講給他們聽，大家聽後都感慨嘆惜。其他人也分別把他邀至家中，都拿出酒食款待他。住了幾天，漁人向大家告辭。山裡人囑告漁人說：「這裡的情況沒什麼好對外面的人說的。」漁人從山洞出來，找到自己的船，便沿著原路往回行，一路上處處做了標記。來到武陵郡城下，前去拜

⁵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79-480。

⁵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85-486。

⁵³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05。

見太守，述說自己此行的所見所聞。太守馬上派人隨漁人到桃花源去，尋找先前所做的標記，結果卻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到原路。南陽有位劉子驥，是個高雅之人。聽說此事後，高興地要計畫前往尋找桃花源。尚未成行，不久因病去世。以後就再也沒有人去尋找桃花源了。

此文開頭用「緣」、「忘」、「忽」數字，以精簡的筆調帶動捕魚人發現桃花林過程的緊湊，「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兩句更是生動地將漁人探索桃林的行動躍然於紙上，「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則使探索的結果更顯神秘。按理說，一般山洞是不會有光的，除非是通往其他地方。因此作者在此處揭示第一階段的探險是漁人沿著溪河而上，發現了一處十分盎然的桃花林地；接著他又欲窮其源頭，乃發現一座山，山的外圍有一個小洞，洞口隱隱露出光亮，至此是第二階段探險。「便舍船從口入」揭示漁人上陸展開第三階段的探險，「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山洞通道十分狹窄，漁人勉強穿越後，竟看到另一片天地。淵明在此故意先云「豁然開朗」，而不提漁人看到什麼，在筆法上堪屬高妙，因為前述的兩階段探險都有所重大發現，第一段探險是發現了「落英繽紛」的桃花林，第二段探險是「林盡水源」後發現了一個透出亮光的山洞，因此從篇首至於「豁然開朗」，淵明試圖營造出一種層次性的驚奇之感。出了山洞，眼前所見竟是「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天地，並且當中有男女老幼村人在此居住生活，至此作者將故事情節帶入了高潮，「豁然開朗」之前，〈桃花源記〉的行文不脫常識所及，自「豁然開朗」之後，洞內別有世界，這就超乎原本讀者的常識範疇。至於「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是全文最引人注目所在，這些洞內之人與現實世界脫節很久，他們竟然不知道現實中的歷史、朝代，不只是讓淵明筆下的漁人大驚，就連讀者讀到這裡也不免感到驚異。當漁人要離開時，村人告誡「不足為外人道也」，言下之意即不希望漁人將桃花源告訴其他洞外之人。後來其他人無論如何嘗試，也無法再次找到桃花源所在。文末記劉子驥欲探訪桃花源之事，有些奇怪，前已述桃花源「迷不復得路」，也許劉子驥聽了他人的傳言，想要窺探究竟。劉子驥的「規往」就文氣來說，另作一波，讓這篇文章感覺餘波未盡。但是從文學上的內容來說，這是在虛構故事上置入實際人物產生出虛實難辨的閱讀效

果，從這方面來說，陶淵明在此文營造出彷彿真有其人其事的氣氛，也使後代為「桃花源」是否真有其地爭論不休，可見其文學創作之成功。

〈桃花源詩〉云：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寢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童孺縱行歌，班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

54

此詩前四句言時局動盪而賢者隱居山林以避亂世，所謂桃源中人亦復如是，「往跡寢復湮，來徑遂蕪廢」則謂隱居後幾未與外界交流，「相命肆農耕」至「班白歡遊詣」謂言桃花源內的農村實際生活情景，後半則為陶淵明藉桃花源事抒發感想，以為世俗中人豈能明瞭桃花源內的自然氣氛其可貴之處。詩中「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其實正是呼應文中「後遂無問津者」一語，南陽高尚之士劉子驥病故後，便再也無人探訪桃花源了，顯示出陶淵明以為桃源之事如理想國，雖然是烏托邦，畢竟是心裡嚮往的世界，在東晉末年亂世，只能借此文來滿足自己的想像。

二、〈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本文作成時間據龔斌考證，當陶淵明居母喪期間，陶淵明母孟氏卒於晉隆安五年(西元 401 年)冬季，故龔氏繫年於隔年元興元年(西元 402 年)。⁵⁵此文所記人物為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鄆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空。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君

⁵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80。

⁵⁵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15。

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里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

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並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名，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

舉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腳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

君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

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

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鐘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贊曰：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問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⁵⁶

袁行霈以為傳文中對孟嘉的諸多讚譽之詞，皆可用以評論陶淵明本人。⁵⁷其中孟嘉的灑脫與好酒，形象直與陶淵明類似，如「常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等。

文中言已故孟君諱名嘉，字萬年，江夏郡鄆縣人氏。曾祖父孟宗，因孝行而聞名，在吳國做官，為司空。祖父孟揖，晉惠帝元康年間做過廬陵太守。孟宗死後葬在武昌郡陽新縣，子孫在那裡安家，於是成為該縣人氏。孟嘉少年喪父，奉養母親同二弟住在一起，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的第十女為妻，在家孝敬長輩，兄弟和睦，無人能使他們相互疏遠，為此受到當地人的稱讚。孟嘉襟懷淡泊，語言簡默，很有度量，二十歲時，已受到同輩人的敬佩。同郡的郭遜，以清高的節操而聞名，當時名聲在孟嘉之上。他常讚歎孟嘉溫文儒雅、平易曠達，認為自己不如孟嘉。郭遜的堂弟郭立，也是有才華有志向之人，他與孟嘉同時而名聲相當，

⁵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90-492。

⁵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01。

卻常對孟嘉推許心服。因此孟嘉名冠州里，聲傳京城。

太尉庾亮為潁川人，他以皇帝舅父的身份和在國內的威望，受命輔佐朝政的重任，坐鎮武昌，兼任江州刺史。他徵召孟嘉為其所部廬陵郡的從事。一次孟嘉下郡回來，適逢庾亮召見他，問他當地風俗吏治情況。孟嘉回答說：「孟嘉不知道，待我回旅舍時當問問隨從的小吏。」庾亮拿著拂塵掩口而笑。其他從事離開後，庾亮叫來弟弟庾翼並對他說：「孟嘉畢竟是有盛德之人啊。」孟嘉告辭出來之後，自己除去其從事的官名，就步行還家，老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過了十多天，孟嘉被改任為勸學從事的官職。當時庾亮重視修建學校，選拔德高望重者為儒官，憑著孟嘉的名望和實才，所以符合這一重視道德修養的職務。太傅褚裒是河南人，他幹練而溫和，很有度量且有才識，當時他任豫章太守。一次他離開豫章來朝見庾亮，適逢正月初一，庾亮會客各地州府人士，其中大多是賢俊名流之輩，孟嘉的座位離主座很遠。褚裒問庾亮說：「江州有位孟嘉，他在哪裡？」庾亮說：「他在此，您只管自己尋找。」褚裒一一看過，於是指著孟嘉對庾亮說：「難道不是這人嗎？」庾亮高興地笑了，喜的是褚裒能認出孟嘉來，同時也為孟嘉能被褚裒認出來而感到驚奇，於是就更加器重孟嘉。

孟嘉被推舉為秀才，又做過安西將軍庾翼府的功曹，還做過江州別駕、巴丘縣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的參軍。孟嘉為人和氣而且正派，桓溫非常看重他。九月九日，桓溫游龍山，所部參佐官吏全都到齊，他的四個弟弟，二兩外甥也都在座。當時下屬官員都穿著軍裝，一陣風將孟嘉的帽子吹落在地，桓溫目示左右及賓客不要講話，以觀孟嘉的舉止。孟嘉開始並沒在意，過了好一陣子起身上廁所去了，桓溫叫人把帽子撿起還給孟嘉。廷尉太原人孫盛時任諮議參軍，當時在坐，桓溫使人拿來紙筆，讓孫盛寫文章嘲笑孟嘉這件事。文章寫好後給桓溫看，桓溫把它放在孟嘉的坐處。孟嘉返回坐處，見嘲笑自己的文章後，便請求紙筆作答，細毫不加考慮，文辭超眾卓越，四座之人為之讚歎。奉命出使京城，被任命為尚書刪定郎，他沒有接受任命。晉穆帝司馬耽聞其名，要在東堂親自召見孟嘉，孟嘉以腳疾為藉口推辭不去，說自己不能做拜見的禮節，皇帝還是下詔命人將他扶入東堂相見。

孟嘉曾經做過刺史謝永的別駕。謝永是會稽人，不幸去世，孟嘉請求前去弔

喪，以盡往日下屬之情，途經永興縣。高陽人許詢，有俊才，辭去榮祿不願做官，常常隨心所欲，獨來獨往，此時正客居在永興縣界。一次他乘船到附近去，正遇孟嘉經過，他讚歎道：「都城府邑裡的優秀人物我全都認識，唯獨不識此人。也只有中州的孟嘉，只聞其名未見其人，這難道不正是他嗎？可是他又因何而至此地呢？」許詢請人去向孟嘉的隨從打聽。孟嘉告訴來人說：「我本就打算前去拜訪他，現在容我先去弔喪盡義，不久回頭就到許先生那裡去。」孟嘉返回時，於是就在許詢處連住兩夜，兩人相互成為知音，彼此很是投機，像是多年的老友。孟嘉回到桓溫府後，轉官為從事中郎，很快又升遷為長史。孟嘉在州府隨順和氣，只是憑著自己的正直和順而待人接物罷了。家中沒有閒雜的客人來往，嘗遇內心有所感觸體悟，就超然灑脫，命人駕車，直去龍山，顧影痛飲，至晚方歸。桓溫曾經和緩地對孟嘉說：「人不能沒有權勢，這樣我才能駕馭您。」後來孟嘉因病在家去世，終年五十一歲。

從孩童時代直到五十歲，孟嘉行事從不苟且求合，言辭之中從不自我吹虛，從未有過喜怒哀樂的表情。喜歡酣暢飲酒，即使過量仍言行不亂。至於放縱情懷、得其意趣之時，便心寄世外、恬適安然，旁若無人。桓溫曾經問孟嘉：「酒有什麼好處，而您如此嗜好它？」孟嘉笑著回答說：「明公您只是沒得到酒中的意趣罷了。」桓溫又問關於歌妓彈唱，為什麼聽起來弦樂不如管樂，管樂不如歌喉聲樂呢？孟嘉回答說：「那是因為逐漸接近自然的緣故。」中散大夫桂陽人羅含，為孟嘉賦詩說：「孟嘉善飲酒，不失其本意。」光祿大夫南陽人劉耽，過去與孟嘉同在桓溫府中供職，我的叔父太常卿陶夔曾經問劉耽：「孟嘉如還在世，是否可以做到三公的職位？」劉耽回答說：「他本來就應當是三公中的人物。」孟嘉就是如此被當時人所推重。我已故的母親，是孟嘉的第四個女兒。正如《詩經·凱風》寒泉之思那樣，對母親的思念，充滿我的內心。我謹慎地採錄。考察孟嘉生平的行蹤事蹟，寫成這篇傳記。只恐有錯誤之處，而有損於這位大雅君子的德行。所以寫作不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贊語是：孔子曾說：「提高道德修養，增進學業知識，是為了把握時機發揮才幹。」孟嘉以高潔的情操隱居柴門之時，則美名遠揚；出仕做官之時，則有口皆碑。天道悠遠而人命短促，沒能終成大業，多麼可惜啊！仁者必定長壽，這話

難道說錯了嗎！

此文為淵明記其外祖父孟嘉生平事蹟的傳記，先述生平大要，後述見聞逸事，本之司馬遷《史記》以來的體例形式。其中關於孟嘉的逸事記載，在淵明筆下，如見淵明本人。桓溫問孟嘉喝酒有什麼好的，孟嘉回覆：「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近若他人問淵明何以嗜酒，淵明恐怕亦作如此回答。逸事中尚有如清談議題者，問「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以之故？這是就音樂以問哲理的命題，孟嘉回答：「漸近自然」，其實也可以視為是淵明對此問題的回應。

三、〈五柳先生傳〉

本文作成時間有異說，大抵為早年說以及晚年說。龔斌主早年說，其云：「宋傳稱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蕭傳、蓮傳、南傳、晉傳同。據此，本文當作於起為州祭酒前。今暫繫於太元二十年乙未(395)。」⁵⁸袁行霈主晚年說，其云：「細審文章意趣，頗為老成，五柳先生之形象亦不類青年。……淵明於晉義熙十一年乙卯(415)六十四歲前後與友人交往較多，其狷介之情益發突出，姑繫於此年下。」⁵⁹筆者以為，陶淵明傳文云「少有高趣」，不必與「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為同一時序。「時人謂之實錄」一語，似非陶淵明少年家貧未得其名之時所發生之現象，〈五柳先生傳〉旨趣已相當無視世俗名利，少年若即有此覺悟，何來壯年反「誤入塵網中」？以此觀之，或袁氏所主晚年說似近合理。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

⁵⁸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22。

⁵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04。

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⁶⁰

文中言先生不知是什麼地方的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表字。他的住宅邊有五棵柳樹，因而就用「五柳」當作自己的別號。悠閒恬靜，少言寡語，不慕榮華利祿。喜歡讀書，只求領會要旨，不在表面字句上鑽研。每當有所領悟書中意旨，便高興得忘記吃飯。生性喜好飲酒，家中貧困不能經常如此。親戚老友知道他這樣，有時就準備好酒請他去喝。喝酒時總是要喝得盡興，希冀一醉。醉酒之後就退席，毫不在意去留這種客套禮儀。家徒四壁，空空蕩蕩，不能擋風遮日。粗布短衣破了就打補丁，家中往往缺乏伙食，即便如此他還是一副平靜安逸的模樣。常寫文章以自得其樂，也很能表達自己的心志。得失心皆置之度外，就這樣過此一生。

贊語是：春秋時代魯國人黔婁的妻子曾說過：「不為貧賤憂慮煩惱，不為富貴鑽營奔忙。」推敲她的話，黔婁大概就像五柳先生那一類的人吧。暢快地飲酒作詩，愉悅自己的心志。他是上古無懷氏時代的人呢？還是葛天氏時代的人呢？

文中所言「不慕榮利」、「好讀書」、「性嗜酒」、「晏如也」、「忘懷得失」俱是淵明的自我寫照，首言「不慕榮利」呼應了末言「忘懷得失」，正因為富貴名利皆無欲求之，因此五柳先生才不詳姓字、不知何許人也，如欲求得富貴，姓名籍貫在晉代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五柳先生兩者皆不詳，何以如此？或不欲人知，不在乎別人知道不知道，而非無有姓名籍貫，因此「不慕榮利」解釋了五柳先生何以只有別號的原因。「好讀書」而「欣然忘食」，說明五柳先生是為自己而讀書，不是為求仕官；「性嗜酒」而「曾不吝情去留」，則說明五柳先生雖嗜酒卻不貪酒，其界限就在於「醉」，飲酒則「期在必醉」，一旦喝到醉了就退席離開，體現出灑脫的精神。儘管家貧身陋，簞瓢屢空，但是卻能和悅接受這樣的環境與生活，此即「晏如也」。因此這些構成五柳先生「忘懷得失」的要素，正是陶淵明對自我的投射與期許。龔斌引錢鍾書《管錐編》謂此文「正激於世之賣聲名、誇門地者而破除之爾。」⁶¹可作此文另一參解。固然陶淵明在此文當中體現出不慕榮利，悠然於隱居之生活，然此五柳先生之寫照或亦可為當世汲求於富貴者的反諷，贊語所稱讚五柳先生或為上古時代之民，反面意思便是今世之人不可能有五柳先生，

⁶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02。

⁶¹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24。

此平淡之中含有譏世意味，足以令人深思。

第三節 疏祭文

疏祭文有四篇，分別是〈與子儼等疏〉、〈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自祭文〉。以下茲就析論。

一、〈與子儼等疏〉

本文作成時間頗有異說，龔斌、袁行霈皆以為此文當作於陶淵明初過五十歲時，殆無疑義。爭議點有二，其一為此文是否於入宋以後所作，袁行霈以為「晉時」可與「漢末」相對，故未必入宋後乃追言「晉時」，這是從行文脈絡的對比所推論。⁶²然此說無旁證，且亦不合前論〈桃花源記〉用例。賴義輝〈陶淵明生平事迹及其歲數新考〉云：「云『晉太元中』，云『晉時』是追述之詞。」⁶³其二為對陶淵明壽年所持歲數不同，袁行霈定陶淵明辭彭澤令為五十四歲，且謂此文當作於去彭澤後，故繫於義熙三年(西元 403 年)；龔斌以義熙十四年(西元 418 年)作陶淵明五十歲，且因有「晉時」之語，必作於入宋後，故從王瑤所說繫於宋永初二年(西元 421 年)。⁶⁴筆者以為此文當為陶淵明五十歲以後所作，卻未必初過五十歲時。文中告誡諸子當和睦友愛，其子或在成年元服之後，不必為稚齡。「年過五十」一語，或取「五十而知天命」之義，可能不一定作實數解。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窮苦荼毒，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

⁶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33。

⁶³ 賴義輝，〈陶淵明生平事迹及其歲數新考〉，《嶺南學報》(廣州：私立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第六卷第一期(1937 年 1 月)，頁 94。

⁶⁴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45。

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⁶⁵

西漢劉向有〈誠子歆書〉、司馬徽有〈誠子書〉，東漢鄭玄有〈戒子〉，魏王肅、王昶有〈家誡〉，諸葛亮有〈誠子〉（見袁行霈《箋注》引，屬告誡類。）本文中淵明告訴儼、侯、份、佚、佟諸子：天地賦予人類以生命，有生必定有死。自古至今，即便是聖賢之人，誰又能逃脫死亡呢？子夏曾經說過：「死生之數自有命定，富貴與否在於天意。」孔子四友之輩的學生，親身受到孔子的教誨。子夏之所以講這樣的話，豈不是因為人的窮困和顯達不可非分地追求，長壽與短命永遠不可能在命定之外求得的緣故嗎？我已經年過五十，年少時即受窮苦，家中常常貧乏，不得不在外四處奔波。我性格剛直，無逢迎取巧之能，與社會人事多不相合。自己為自己考慮，那樣下去必然會留下禍患。於是我努力使自己辭去官場世俗事務，因而也使你們從小就過著貧窮飢寒的生活。我曾被王霸其賢妻所說的話為之感動，自己穿著破棉襖，又何必為兒子不如別人而慚愧呢？這個道理是一樣的。我只遺憾沒有求仲、羊仲那樣的鄰居，家中沒有像老萊子之妻那樣的夫人，懷抱著這樣的苦心，內心很是慚愧。我少年時曾學習彈琴、讀書，間或喜歡悠閒清靜，打開書卷，心有所得，便高興得連飯也忘記吃了。看到樹木枝葉交錯成蔭，聽見候鳥不同的鳴聲，我也十分高興。我常常說，五六月裡，在北窗下面躺著，遇到涼風一陣陣吹過，便自認為是伏羲氏以前的古人了。我的思想單純，見識稀少，認為

⁶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29-530。

這樣的生活可以保持下去。時光逐漸逝去，逢迎取巧那一套我仍十分生疏。要想恢復過去的那種生活，希望又是多麼渺茫！自從患病以來，身體逐漸衰老，親戚朋友們不嫌棄我，常常拿來藥物給我醫治，我擔心自己的壽命將不會很長了。你們年紀幼小，家中貧窮，常常擔負打柴挑水的勞作，什麼時候才能免掉呢？這些事情總是牽掛著我的心，可是又有什麼可說的呢！你們兄弟幾人雖然不是一母所生。⁶⁶但應當理解普天下的人都是兄弟的道理。鮑叔和管仲分錢財時，互不猜忌；歸生和伍舉久別重逢，便在路邊鋪上荊條坐下暢敘舊情。於是才使得管仲在失敗之中轉向成功，伍舉在逃亡之後回國立下功勞。他們並非親兄弟尚且能夠這樣，何況你們是同一父親的兒子呢！穎川的韓元長，是漢末的一位名士，身居卿佐的官職，享年八十歲，兄弟在一起生活，直到去世。濟北的汜稚春，是晉代一位品行高尚的人，他們家七代沒有分家，共同擁有財產，但全家人沒有不滿意的。《詩經》上說：「對古人崇高的道德則敬仰若高山，對古人的高尚行為則效法和遵行。」雖然我們達不到那樣高的境界，但應當以至誠之心崇尚他們的美德。你們要謹慎為之，如此我也就沒什麼好多說的了。

淵明此文自敘平生，感歎家庭貧困，疾病纏身，而不被妻子所理解。勸勉諸子安貧樂道，和睦相處。關於「室無萊婦」一語，萊婦指楚國老萊子之妻，老萊子逃世躬耕，楚王欲以之為官，老萊子之妻勸誡之，於是老萊子隨其妻遷至江南，以避楚王。龔斌云：

按，蕭傳、南傳云：「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然此處云「室無萊婦」，味其意，若謂翟氏不如老萊之妻能安貧樂道。則蕭傳「同志」之言不足憑信也。抑其時翟氏已死耶？考〈詠貧士〉其七云：「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翟氏其時似尚在。故知「室無萊婦」之感歎實有所指。

67

此可見淵明的家庭成員未必同淵明一樣，他們對固窮守道或許不無埋怨，並且又因生母不同，或有不和，因此淵明為文告誡諸子當和睦相處，並且述論自己為何不仕，「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淵明需要在文中作這番解

⁶⁶ 據龔斌考證，淵明五子中，儼、俟、份、佚當為第一任妻子所生，佟為第二任妻子翟氏所生，淵明三十歲時喪妻。見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263-264。

⁶⁷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48。

釋，顯見諸子並不理解其父的志向。及至於兄弟之間口角相爭，淵明不得不引古人、今人的事例諸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來勸告諸子當思齊焉。此外，文中亦可見淵明對於自己選擇歸隱而使家人貧困，亦不無歉意：「使汝等幼而飢寒」、「良獨內愧」、「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這也體現出淵明在現實環境中的掙扎，也暗示了歸隱田園這條路，必然是淵明考量許久後所下的決定，縱然這樣的選擇不免累及家人，但是強迫自己出仕，最後也是在官場上「與物多忤」，終究「必貽俗患」。這篇文章一方面讓我們認識到淵明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另一方面也了解淵明所選擇的人生道路既有性情上的解放，然也不免於現實問題帶來的憂愁。

二、〈祭程氏妹文〉

此文作於義熙三年(西元 407 年)，據〈歸去來兮辭〉所記，程氏妹卒於義熙元年(西元 405 年)，故此文為程氏妹卒後一年半所作。⁶⁸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俯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疏。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儆。我聞為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雪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瑩瑩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⁶⁹

此文可見陶淵明對其妹誠摯的思念情感，「慈妣早世」至於「撫髻相成」，慈妣，

⁶⁸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52。

⁶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41。

指淵明庶母，程氏妹生母，則陶淵明與程氏妹自幼相扶持，一同成長，感情深厚。

「咨爾令妹」至於「可象可儆」，則讚揚程氏妹有諸多良好的品格優點，但是「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抱怨老天不公，奈何這樣的好人卻不得長命。「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雪掩晨，長風悲節」，陶淵明以悲苦淒涼的冬景來描繪自己心中對程氏妹過世之傷痛，最後慟言「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其情感直切。「慈考」原作「慈妣」，龔斌以為「慈妣」當作「慈考」，據文中「人亦同生」之語，陶淵明與程氏妹其生母相同。⁷⁰其說合理，袁行霈以為慈考說無版本依據，難以採信⁷¹，然就「同生」一詞於史書上的用法，殆指同母而言，若以生母、庶母之說來解釋陶淵明與程氏妹之親屬關係，恐於文意難合。

文中言晉代義熙三年五月六日，為程氏妹服喪已滿十八個月了。淵明用豬、羊二牲為妹祭奠，躬身以酒灑地。嗚呼！寒往暑來，歲月漸逝，屋樑上塵土堆積，庭院裡雜草叢生，一片荒蕪。寂寞空曠的屋裡悲哀哭啼的是她遺下的孤女。陳列著酒肉只能作虛空的祭奠，你已逝去，不知去往何處！誰無兄弟姐妹，同樣都是同一母親所生。我們兄妹之間的感情，卻超過一般人的百倍。慈父早年去世，當時你還很小，我十二歲，你才九歲。就從那無知的童年時代，我們相互愛護著一起長大。你是我善良的妹妹，既有優良的德行，又有美好的操守。你安靜謙遜，少言寡語，聽到美好的事情就內心高興。你為人端正而又溫和，既和兄弟友愛，又能孝順長輩。你言行舉止都符合女性的規範，值得學習和效法。我聽說行善之人，只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就能獲得幸福，可是蒼天為什麼這樣不公正，沒有給她以善報！過去在江陵之時，再一次遭到上天的懲罰，母親去世，你我分散而居，相隔異地。惟有我們兄妹二人，經受著無數的哀痛。高空烏雲密布，冬月寒風蕭蕭，清晨白雪覆蓋大地，大風在冬季裡悲號。我悲傷感慟得叩頭哭號，每當傷心眼中就哭出血來。追思過去的日子，事情就像在眼前一樣，並不遙遠，互通的書信依然還在，你的遺孤就在眼前。為什麼你一去就永遠不返！寂靜的高堂上，何時再有你的足跡？幼小的孤女，能依靠誰呢？你那孤獨遊蕩的魂魄，有誰主祭把呢？如何是好啊程妹，就這樣永遠完結了！如果死後有知，那我們將來就在墓地相會吧。悲哀啊！兄妹之間，真情真愛，表露無遺。

⁷⁰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53。

⁷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46。

三、〈祭從弟敬遠文〉

本文作於晉義熙七年(西元 411 年)，敬遠安葬之時。⁷²據文中「父則同生，母則從母」，可知陶淵明之父與敬遠其父為同母兄弟，兩人的母親則為姊妹，因此其關係又比一般族中兄弟更加親密。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側側以摧心，淚愔愔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

於鑠吾弟，有操有概。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盤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采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

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眾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

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陡。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⁷³

文為(義熙七年)辛亥年八月十九日，為堂弟敬遠作，並言占卜擇定了日子下棺安葬，永遠安息於地下。感念我們平日同遊共處，我為你一去不返而悲傷，我心情

⁷²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550。

⁷³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547-548。

悲痛感傷，傷心得熱淚滿眼。於是用園中之果和新釀制的酒，為你的靈柩安葬而送行。悲痛啊，悲痛！

我那光明磊落的弟弟，既有節操又有氣度。少年時代即知孝順父母，對兄弟的友愛本於天性。無憂無慮，追求不多，既不固執，也不孤僻。遇事先為別人打算，然後才考慮自己；面對財物時，總想惠及他人。內心不計較得失，性情不趨附世俗。態度溫和，言辭嚴肅。以結交高雅之友為樂，愛好詩辭文章與琴棋書畫。遙遠的神仙世界，使他感到好奇，於是他不食煙火，拋棄世俗事務，隱居於山林深處。淙淙作響的瀑布，森鬱昏暗的荒林，清晨採摘仙藥，晚上研習素琴。孔子曾說：「行仁德者可以長壽。」我偏偏相信了。可是為什麼這句話，卻白白地將我欺騙呢？敬遠年齡剛過三十，卻忽然與世長辭，永遠安眠于地下，遙遙沒有回還之日。

我與你之間，不僅僅是親愛友善，我們的父親是親兄弟，我們的母親是親姊妹。在童年時代，我們又都失去了父親，我們的感情實在太深，我們的友愛確實很厚！想想過去的日子，同住一處的歡樂，雖然冬天沒有粗布棉衣，夏天飢渴了，靠簞食瓢飲勉強度日。但我們以道義相互勉勵，相互愉悅以解憂愁。難道生活不是很貧困嗎？只是我們忘記了飢寒之苦。我曾經外出做官，為那些往來應酬之事纏身，雖四處奔波，卻一事無成。只怕辜負了平日的志向，我辭去官職回到家鄉。你知道我的心意，常願與我攜手同遊，而不顧及世俗的議論。每當回憶起那秋收之時，我將要去收割莊稼，和你一道前往，一同乘舟渡水。我們在那河邊連宿三夜，且飲酒取樂。澄靜的明月掛在高空，夏季的熱風已經消失。我們持杯暢談，事物長存，人生短暫。這是為什麼啊，我的弟弟，你竟在我之前離開了人世！

往事難以追尋，思念哪有盡頭？歲月流逝，寒暑更替。一死一生各在一方，一存一亡界域相隔，等待清晨為你安葬，準備踏上去往墓地的路程。你留下的呱呱啼哭的幼兒，尚未能學會說話。你拋下的悲哀的寡婦，非常懂得禮儀。庭院中的樹木依舊，屋舍之中空空蕩蕩，誰說敬遠何時能再歸還？我揣想別人，不會理解我們這種親密的感情。占卜好了的吉祥之日，按照規定的喪禮制度為你送行。眼看著輕快飄動的魂幡，我拿著筆啼淚不止。你的神靈如有知覺，就會明白我心中的誠意。悲痛啊！悲苦之情，溢於言辭。

此文悼祭從弟敬遠，文中多有回憶兩人相處過往，「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淵明與敬遠兩人自幼父親即已過世，故淵明與敬遠關係特別親近，也是因為身世相同。「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兩人自幼相互扶持，同住一房而共為貧困，因為有彼此的鼓勵，才能熬過飢寒交迫的日子。淵明較敬遠年長，因此較早出外求仕，「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求仕無成的淵明擔心自己不能實踐士人濟世的志向，「斂策歸來」，不過敬遠卻已明白這不是淵明的過錯，「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眾議」，既云「眾議」，表示或許家族中其他成員對於淵明未能仕官掙錢有所微詞，敬遠則不理會這些蜚語，成為家族中最能賞識淵明的人。在祭文之末，淵明所以云「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認為他人是無法了解其與敬遠是有多麼親近，正是因為上述祭文中提及的兩人自幼處境相似，成長過程相知相惜，成年後也只有敬遠明白淵明的志向抱負，因此當敬遠早逝，留下稚子寡婦後，這種情景又宛如當年他們一樣幼年喪父，母親辛苦扶養孩童。新痛舊傷之下，無怪乎淵明此祭文寫來悲愴至極。

四、〈自祭文〉

此文作於宋元嘉四年(西元 427 年)，是年陶淵明亡故，故此〈自祭文〉當為其絕筆。⁷⁴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於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淒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

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犢，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

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歿亦見思。

⁷⁴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64。

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捭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

寒暑愈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75

「律中無射」，龔斌釋云：「古時樂律分為十二律，陰陽各六，與十二月相配。無射為陽律的第六，與九月相應。」⁷⁶故知此文作於秋季九月，「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於征，草木黃落」其景合於秋季。陶淵明此文以第三人稱視角狀寫自己死後，親友祭弔的場景。第一段言親友初來祭弔，情景淒冷，「候顏已冥，聆音愈漠」更是寫盡死時寂兮寥兮之感。第二段言陶淵明一生的過程，其為勤勞於農務，而悠樂於讀書，生活自在，以此終年。第三段言陶淵明對自己的一生沒有遺憾，沒有餘恨，能夠至老而善終，對於人生復無它求。第四段回到親友祭弔的場景，親友將陶淵明葬於荒野之中，不欲墳墓之建營，「不封不樹，日月遂過」不堆土作墳，不在墓旁種樹，見其灑脫，亦不必後人之祀祭。

文章其大意为現在是丁卯年九月，天氣寒冷，秋夜漫長，景象蕭條冷落，大雁南飛，草木枯黃凋零。陶子淵明將要辭別這暫時寄居的人世，永遠回到自己本來的住處。親友們懷著淒傷悲哀的心情，今晚一道來祭奠我的亡靈，為我送行。他們為我供上了新鮮的果蔬，斟上了清酒。看看我的容顏，已是模糊不清。聽聽我的聲音，更是寂靜無聲。悲痛啊，悲痛！

茫茫大地，悠悠高天，你們生育了萬物，我也得以降生人間。自我為人，就遭遇到家境貧困的命運，飯筐水瓢裡常常是空無一物，冬天裡還穿著夏季的葛布衣服。可我仍懷著歡快的心情去山谷中取水，背著柴禾時還邊走邊唱，在昏暗簡陋的茅舍中，一天到晚我忙碌不停。從春天到秋天，總是在田園裡作活，又是除草又是耘土播苗，作物不斷滋生繁衍。捧起書籍，心中欣歡。彈起琴弦，一片和

⁷⁵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555-556。

⁷⁶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65。

諧。冬天曬曬太陽，夏天沐浴於清泉。辛勤耕作，不遺餘力，心中總是悠閒自在。樂從天道的安排，聽任命運的支配，就這樣度過一生。

人生一世，無論是誰都愛惜它，唯恐一生不能有所成就，格外珍惜時光。生前為世人所尊重，死後被世人所思念。可嘆於我自己獨行其是，竟是與眾不同。我不以受到寵愛為榮耀，污濁的世俗豈能把我染黑？身居陋室，意氣傲然，飲酒賦詩。我自己識運知命，所以能無所顧念。今日這樣死去，可說是沒有遺恨了。我已至老年，仍依戀著退隱的生活，既以年老而得善終，還又有什麼值得留戀！

歲月流逝，死既不同於生，親戚們清晨便來弔唁，好友們連夜前來奔喪，將我葬在荒野之中，讓我的靈魂得以安寧。我走向幽冥，蕭蕭的風聲吹拂著墓門，我以宋國桓魋那樣奢侈的墓葬而感到羞恥，以漢代楊王孫那過於簡陋的墓葬而感到可笑。墓地空闊，萬事已滅，可歎我已遠逝，既不壘高墳，也不在墓邊植樹，時光自會流逝。既不以生前的美譽為貴，誰還會看重那死後的歌頌呢？人生道路實在艱難，可人死之後又能怎樣呢？說不定死不如生，悲痛啊！

淵明的〈自祭文〉與傳統祭文相較，增加了對秋景的描寫。丁振翔認為：

自《夏小正》、《呂氏春秋》、《淮南子》、《禮記·月令》以來，大同小異的秋節時物描寫文字其實已反覆被抄錄，而且愈來愈固定，例如《禮記·月令》中，秋節時物從「涼風至—寒蟬鳴—鴻雁來—玄鳥歸—霜始降—草木黃落」，成為一套時物知識，可以做為推論的準則，成為「秋」的必要驗證，其背後是「引譬連類」的原則。⁷⁷

當淵明的〈自祭文〉云「鴻雁於征，草木黃落」時，不只顯露出《禮記·月令》中的時物知識為當時詩人常見的「引譬連類」，同時也反映淵明將其自身辭世納入此「涼風至—寒蟬鳴—鴻雁來—玄鳥歸—霜始降—草木黃落」此關係網中，淵明〈自祭文〉又云：「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逆旅之館指現世人生，本宅則指死後真正歸所，因此淵明視死亡為大自然變化之一環，人身不過是暫時的寄居處，還有一個永遠的「本宅」才是真正的歸宿。⁷⁸人生過程既然只是暫時棲身之所，是故淵明在〈自祭文〉中回首一生歷往，談論的只有自己的耕讀懷抱，

⁷⁷ 丁振翔，〈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再讀陶淵明〈自祭文〉〉，《思辨集》（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1期（2008年3月），頁57。

⁷⁸ 丁振翔，〈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再讀陶淵明〈自祭文〉〉，頁58。

王國瓔認為：「其中仕宦生涯中的挫折與悲哀，與鄰里之間的交遊，與妻室兒子之間的互動關係，均未涉及。其筆下勾勒的，乃是一幅不具社會背景，沒有人際關係的自畫像，帶有自我期許，自我肯定的意味。」⁷⁹淵明的自我肯定，即表現在「樂天委分，以至百年」一語中，然而〈自祭文〉之末淵明又云：「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學者對此詮釋頗有爭論，王國瓔以為此係平靜之中吁出一聲輕嘆，彷彿認清自己的命運，接受了不盡如人願的現實人生⁸⁰；呂興昌則認為，「窅窅我行」以下的愁慘氣氛中，展現出死亡對於艱苦的人生畢竟無可如何的感慨，所謂超然云云，轉成虛語。⁸¹筆者以為「樂天委分」固然是淵明經歷漫長人生經驗後的體悟，然則「人生實難」卻是客觀上的現實呈述，人生之艱難並不會因淵明「樂天委分」就變得比較簡單，而是透過觀照者的自我心境昇華，實難的人生方才得以委分而樂天觀之，《論語》云：「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人生道路充滿磨難，一般人面對困境自是怨天尤人，惟有砥礪心志者才能不怨天也不尤人。因此「樂天委分」與「人生實難」兩者是不相衝突的。至於「死如之何」，據錢鍾書《管錐編》云：

陶潛《自祭文》：「人生實難，死如之何！」按語意本《全三國文》卷五二
嵇康《聖賢高士傳·尚長》：「喟然歎曰：『吾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
如亡爾！』」⁸²

若依「死如之何」原出處的語氣，那麼淵明此處所要表明的可能不是生死問題，而是對於人生富窮貴賤的答覆，已有定論。

第四節 贊文

傳統上《陶淵明集》或錄有〈五孝傳〉(天子孝傳贊、諸侯孝傳贊、卿大夫孝傳贊、士孝傳贊、庶人孝傳贊，合稱五孝傳)、〈四八目〉(即《聖賢羣輔錄》，

⁷⁹ 王國瓔，〈樂天委分，以至百年—陶淵明〈自祭文〉之自畫像〉，《中國語文學》(韓國：嶺南中國語文學會)，34 輯別刷(1999 年 12 月)，頁 337。

⁸⁰ 王國瓔，〈樂天委分，以至百年—陶淵明〈自祭文〉之自畫像〉，頁 340。

⁸¹ 呂興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論陶淵明的死亡焦慮與因應方式〉，《科技整合研討會論文集》(二)「文學」(1987 年)，頁 142-143。

⁸² 錢鍾書，《管錐編·第四冊》(北京：三聯書店，2 版，2007 年)，頁 1936。

四八目為其原名)，龔斌據《四庫提要》認為其為偽作，據陶澍《陶靖節集》之編次刪此二篇⁸³；袁行霈則謂〈五孝傳〉、〈四八目〉未必是偽作，但或屬陶淵明平日手札，原非具備完整思想之文章。⁸⁴因此本節所論贊文，便不論此兩篇。

〈扇上畫贊〉與〈讀史述九章〉似俱為晚年所作，龔斌與袁行霈皆以為〈讀史述九章〉當作於晉宋易代之後，殆無異論。〈扇上畫贊〉則不詳其年代，龔、袁皆保留意見不論斷年。

一、〈扇上畫贊〉

此詩就扇上所畫古代八位隱士，所作贊語，前八句與後八句是總述和結語，中間每四句讚揚一位隱士，依序為荷蓀丈人、長沮桀溺、於陵仲子、張長公、丙曼容、鄭次都、薛孟嘗、周陽珪。所作贊語依其生平事迹為言，從「是以達人，有時而隱」來看，陶淵明是時或已去官彭澤，寄情於務農的隱居生活，因此荷蓀丈人、長沮桀溺居於列前。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羣。

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

岿岿邴公⁸⁵，望崖輒歸，匪驕匪吝，前路威夷。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

孟嘗游學，天網時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美哉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尚，悠然白娛。

⁸³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例言〉，頁 1。

⁸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600。

⁸⁵ 原作「丙公」，龔斌以為當從《漢書》所記改作「邴公」，見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38。

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日琴日書，顧盼有儔。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托契孤遊。⁸⁶

文中言，三皇五帝盛世遙遠，淳樸風尚日漸消盡。九流學派見解不一，相互之間有增有損。世人皆隨物變遷，並無一定的是非標準。所以那些明智之人，度時而選擇歸隱。孔子不能參加勞動，五穀莊稼不能區分，荷蓑丈人隱居世外，日暮仍在田中耕耘。長沮桀溺距今遙遠，並肩耕作自得歡欣，鳥兒飛近並不驚心，隱居偏遠與獸為群。道德高尚陳仲子君，涵養深厚正氣浩然，蔑視那些高官厚祿，甘心隱去為人灌園。張摯曾經一度出仕，後因事歸家，其自念與世不能相容，高蹈遠去不再為官。邴曼容君德操高尚，被封高官便辭官歸家，既不驕縱也不貪鄙，深知仕途險阻艱難。鄭敬與世不能相合，隱居垂釣大澤之邊，故友來訪則於林下共飲，暢談終日大義微言。薛包篤行潛心遊學，仕途佈下羅網也能逃避，顧念往日賢智之友，一同振衣攜手逃離。周陽珪值得讚美，托疾辭官在家閒居，寄心塵外清操高尚，悠然適意自得歡娛。樹蔭之下柴門陋舍，泉水湧出激蕩長流。有琴可彈有書可讀，左顧右盼琴書為友。生活所需稍有即足，其他一切皆無所求。遙遙懷念千載之上，寄心知音獨自遨遊。

清代方宗誠《陶詩真詮》云：「〈扇上畫贊〉，蓋淵明心所嚮往之人。」⁸⁷文中所列八名高士，就其類別，大抵可分成務農不仕與辭官歸隱兩類，荷蓑丈人、長沮桀溺、於陵仲子屬於務農不仕者，他們自始便為隱逸者。張長公、邴曼容、鄭次都、薛孟嘗、周陽珪屬於辭官歸隱者，除周陽珪不詳其生平外，其他皆為漢代人。淵明讚揚此八人的氣節風範後，文末八句希望自己與這樣古人在精神上為友，清代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云：「總結八句，殊為自己寫照。」⁸⁸言之成理。

二、〈讀史述九章〉

〈讀史述九章〉為陶淵明讀《史記》後有所感觸而寫的短文筆記心得。袁行霈引

⁸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07-508。

⁸⁷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教師、五六級四班同學 編，《陶淵明詩文彙編》，頁 371。

⁸⁸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教師、五六級四班同學 編，《陶淵明詩文彙編》，頁 371。

唐代劉知幾《史通·論贊》云：「馬遷⁸⁹《自敘傳》後，歷寫諸篇，個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⁹⁰龔斌繫年於宋永初元年(西元 420 年)⁹¹。

(一)、〈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⁹²

文中言伯夷叔齊互讓君位，相伴逃離至於海濱。武王伐紂而伯夷、叔齊兩人則匿跡遠處，過著窮困生活。采薇充飢悲哀高歌，慷慨思念黃帝虞舜。貞廉之風超越世俗，感奮振動了懦弱之人。

淵明一方面肯定武王伐紂，認同此為救黎民於水火中的義舉，因此詩云「天人革命」，表明淵明贊成將武王伐紂理解為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行動。另一方面，對於伯夷、叔齊二人堅守君臣本分，維護傳統倫常道德的節操，也予以充分的肯定。⁹³

(二)、〈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僇之歌，淒矣其悲。⁹⁴

一般人離開家鄉那種感情，尚且依戀難以捨棄。何況是改朝換代，眼前一切皆與昔日不同。箕子哀傷無限悲痛，心中如何才能平息？感慨下所作〈麥秀〉之詩，哀傷淒涼深表其悲。

宋代葛立方《韻語陽秋》以為〈夷齊〉、〈箕子〉、〈魯二儒〉此三章可證淵明

⁸⁹ 指司馬遷。

⁹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13。

⁹¹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頁 425。

⁹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12。

⁹³ 黃世錦，〈論陶淵明的〈讀史述九章〉〉，《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屏東市：國立屏東教育大學)，37 期(2011 年 9 月)，頁 8。

⁹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14-515。

「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邪？」⁹⁵但是此章所云「狡僮之歌，淒矣其悲」，明顯是感傷於易代所產生的「觸物皆非」，何況箕子亦事於姬周，因此對殷商故墟只能獨泣而不能哭弔，故淵明此章是以易代之感所生的悲悽為文意。

(三)、〈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⁹⁶

文中言瞭解別人已不容易，能獲知音實在困難。君子之交淡泊為美，利益相違友情不變。管仲功成名就，鮑叔牙則安居齊國。罕見的友情交相輝映，完美名聲永遠流傳。

淵明此章稱讚管仲、鮑叔牙兩人友誼可貴，「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或似有所指，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云：「此似借以譏白蓮社中人。公不願入社意，或出此。」⁹⁷但備一說。

(四)、〈程杵〉

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⁹⁸

先言捨棄生命實為不易，君子獻身甘為知己。為義而死視之如歸，程嬰、公孫杵臼這兩人確實如此。為了趙氏孤兒，程嬰赴義揮劍自盡，以免恥辱。二人美德永遠傳揚，百代之後仍可為後世所紀念。

黃世錦認為，淵明詩文所記的朋友相交之樂，是他長期與之互動的情感累積。但是至於此章所言程嬰與公孫杵臼，其「望義如歸」的情緒，卻是受到史傳中那些慷慨激昂的人物事蹟所影響。⁹⁹

⁹⁵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教師、五六級四班同學 編，《陶淵明詩文彙編》，頁 369。

⁹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16。

⁹⁷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教師、五六級四班同學 編，《陶淵明詩文彙編》，頁 369。

⁹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17-518。

⁹⁹ 黃世錦，〈論陶淵明的〈讀史述九章〉〉，頁 15。

（五）、〈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淦至言。慟由才難，感為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¹⁰⁰

說仲尼弟子恭敬從學，沒有一個不是溫恭賢能之人。他們的高尚道德輝映日月，一同聆聽夫子的至理名言。然則孔子悲痛人才難得，情感總為弟子所牽。顏回不幸過早去世，唯獨子貢享得長年。

「回也早夭，賜獨長年」隱含了淵明認為世間俗人或如子貢一樣，善於巧辯者長壽，而像顏回「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正如自己不慕榮利、不求聞達的心願，難以被人理解。

（六）、〈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鵬獻辭。¹⁰¹

先言為增進道德提高學業，盼望及時有為於世上。就像舜時的稷、契，誰不希望像他們一樣深受君王信任？可嘆屈原、賈誼這兩二位賢人，遭逢猜忌，而君主疏遠忠良。因此屈原向鄭詹尹問卜，寫〈卜居〉以明心志；賈誼有感於鵬鳥止於座隅，乃作〈鵬鳥賦〉。

此章為淵明感懷屈原、賈誼之不得時，故首云「進德修業，將以及時」，然則若以不時，那麼為有所用而累積的術業也無處可以發揮。淵明對屈、賈二人之同情，未嘗不是因為自己也有相似遭遇，因有所感而發。

（七）、〈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伎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¹⁰²

¹⁰⁰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519。

¹⁰¹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520。

¹⁰²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523。

首言巨大的狐狸隱藏山穴，因皮毛美麗而遭捕獵，蒙受災禍。君子不被時所重用，到老只能作看門小吏而地位低賤。機巧的行為使自身處於災禍當中，強辯也會引來患難。韓國公子韓非的遭遇實在可哀，知說之難而在秦國死於自己的《說難》一書上。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哀矣韓生，竟死《說難》」，此兩組文句不僅突顯韓非雖富才智，卻因此而死的不幸遭遇，同時也暗暗告誡來者，「巧行居災，伎辯召患」，縱有才智靈巧，遭遇不時仍將有殺身之禍。¹⁰³淵明以此詩警惕自己涉入官場的危險，寧歸隱於窮困之田園生活，也不能在亂世中如韓非一樣自禍其身。

(八)、〈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汙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¹⁰⁴

首言世間認為應易代隨時，不知時變則為愚蠢。耿介孤高的魯國二位儒生，乃是忠貞之人。積德尚未能達百年，違反古法實在有辱斯文。他們決意不理朝廷徵召，穿粗布衣幽然隱居。

李偉泰認為叔孫通所作漢制禮法，其實本於秦制，遠非古禮。¹⁰⁵叔孫通譏諷魯國二儒生之不知時變，顯露出其人阿諛奉承於權勢者，同時二儒生堅持不隨叔孫通附勢，亦可作為「君子固窮」的體現。「介介若人，特為貞夫」正是淵明對魯二生的至高讚譽。

(九)、〈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竭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¹⁰⁶

¹⁰³ 黃世錦，〈論陶淵明的〈讀史述九章〉〉，頁 11。

¹⁰⁴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525。

¹⁰⁵ 李偉泰，《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述論稿》（台北：長安出版社，1988 年），頁 53-54。

¹⁰⁶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527。

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首言張摯真是高遠過人，其寂寥而默言卻為何事？世間道路分歧多端，眾人竟皆與張摯相異。於是他收起韁繩辭去官職，獨自修養其志趣。隱居終身不再出仕，而有誰能理解此中深意！

淵明此章乃以張摯的人生選擇自勉，張摯其人世不能容，遂隱居而終身不仕。淵明亦有值逢不時的感觸，世事「皆為我異」，自當「獨養其志」。借古人以明己之意。

第五節 小結

陶淵明的韻文和散文作品可分四類，分別為辭賦、記傳文、疏祭文、贊文。陶淵明的辭賦文章有三篇，分別是〈感士不遇賦〉、〈閑情賦〉、〈歸去來兮辭〉。〈感士不遇賦〉為淵明感慨有能士人不遇其時之悲哀，既然不能進為濟世天下，則當退為君子固窮；〈閑情賦〉為淵明以傳統上的閑邪主題所寫的抒情之作，或以為有所寄託於君臣關係；或許抒發對愛情的嚮往。〈歸去來兮辭〉為淵明辭官彭澤令後所作，其文道盡淵明欲歸返自然的心願。陶淵明的記傳文有三篇，分別是〈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桃花源記〉刻劃出淵明心中理想的社會狀態；〈五柳先生傳〉描繪出淵明自我的形象投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為淵明替自己外祖父孟嘉作傳，文中孟嘉的飲酒形象與淵明頗為類似。疏祭文有四篇，分別是〈與子儼等疏〉、〈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自祭文〉。〈與子儼等疏〉告誡諸子當和睦相處；〈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追悼與淵明自幼最為親近的親人；〈自祭文〉以第三人稱記寫淵明自己死後的喪禮，並從中帶出自己對人生的回顧。贊文則有〈扇上畫贊〉與〈讀史述九章〉，文中俱見淵明對古代隱士人物心生慕仰，引以為典範。陶淵明的文章雖然數量不多，但大抵多為述志表意之作，或直言之，或假借情景、人物而寄寓之，從中皆可顯現淵明的志趣所在。

第五章 從陶淵明詩文看思想態度

本章將從淵明的詩文作品中，探討其中所反映的文化思想。筆者認為淵明的思想一方面受到時代背景之影響，另一方面則與個人生平經歷相關，因而在其詩文中或交雜了儒家、道家、佛教等不同文化思想的洗禮，儒家的濟世理念、道家的反璞歸真、佛教的信仰觀念，在不同程度上鑄造出淵明獨特而自我一家思想特質來。在淵明的作品中，我們既可看到儒家對現實世界的關心，同時也看到道家主張的自然與人的和諧狀態，淵明選擇歸隱於田園而非山林，顯然與他個人將儒、道兩家精神合歸於一體有關。雖然當前學者多認為淵明的作品在思想上與佛教較無直接性關聯，但是考察其詩文部分之用字遣詞，淵明未必與佛教全無關係，因此本章亦於第三節處理這個問題。

第一節 儒家的入世思想

陶淵明雖生當東晉儒學衰微、玄學清談流行的時代，但一生出處進退，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至深且遠。梁啟超曾言：「他(陶淵明)雖生長在玄學佛學的氛圍中，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都在儒學。」¹觀察陶淵明一生自幼歷經艱困，及長出仕，至辭官彭澤為止，期間或仕或隱，最後選擇歸於田園終老，從其詩文所透顯的思想來看，儒家思想可說是他終身奉行不悖的人生指導原則。第二章中探討了他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生平經歷，從這些文史資料可知形成陶淵明儒家思想的因素有三，即時代、地域與家學。就時代而言，東晉有鑑於西晉末清談誤國的弊端，加上外有強敵環伺，因此仕風轉為注重經世致用的儒家學說。就地域而言，陶淵明所處的江州前後有范宣、范甯提倡儒學、設立學校，教化所及，使當地讀書風氣，堪比齊、魯兩地。江州士人多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²，由於二范的努力使當地成為儒學發展中心。就家學而言，淵明曾祖陶侃為晉室大司馬，祖父陶茂曾為武昌太守，外祖孟嘉也出身儒學世家，陶淵明自幼受儒學薰陶，游好六經，心懷經

¹ 梁啟超，《陶淵明》(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15。

²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頁2360。

世濟民的志向。³由此可見以上三項因素使得陶淵明思想中儒家色彩極其濃烈。

蕭統〈陶淵明傳〉云：「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脫穎不羣，任真自得。」⁴可見陶淵明自小便有旺盛的求知欲，而幼年的豐厚積累成為他文章傑出的重要原因。淵明於〈飲酒詩〉亦自云他自小偏好的書籍即是儒家經典，其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詩〉其十六）少年時代的陶淵明因家風所及和地方風氣之影響，其學習愛好便是儒家的孔孟聖賢思想，並將儒家之道作為行為楷模。淵明發自內心喜好六經並熟讀記誦，使儒家的經籍成為其思想的淵源與創作的養分，並且內化到生命中，成為日後人生理想的追求與立身處世的準則。

淵明不只愛好儒家典籍，並將曾刪詩書、定禮樂的孔子視為先師，私淑孔子之立身處世。在〈飲酒詩〉中的第二十首，淵明賦詩歌頌了孔子整理禮樂詩書的功勞，並對秦火焚書後整理六經有功的漢代儒者，也極為肯定，其云：「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⁵上古時代純樸善良的風氣早已不復存在，整個世道都是充滿欺騙、虛偽，沒有真淳。此時魯國出現了一個老先生，也就是孔子，他四處奔走，企圖把破裂墮落的社會修補完整。雖然天下並未因此太平，但經過他的整理，禮樂因此得到整理而保存。可是孔子死後的戰國時代，反而更加不重視仁義道德，致使終年戰亂不止，而民眾身陷水深火熱之中。到了秦朝，秦始皇焚毀詩書，幾乎使古代文化毀於一旦。幸賴一些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儒者，辛勤蒐羅經書或是口授抄寫，並加以注解釋義後，才使得這些典籍得以保存下來。從以上的論述可知淵明甚為重視儒家文化，不但自己游好六經，連整理保存六經的孔子與漢代儒者，也對他們備極推崇。但是到了淵明身處的東晉，又是一個政治極為動盪的亂世，此時已經沒有孔子四處奔走力挽狂瀾，淵明所能作的，便是學習效法孔子的行誼，躬身實踐孔孟聖賢之道。因此在〈感士不遇賦〉裡，淵明雖然感慨自己的初衷無法實現，但仍舊以遵循儒家之道自我砥礪，其云：「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

³ 鄭安森，《陶淵明思想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頁32-34。

⁴ （南朝梁）蕭統，〈陶淵明傳〉，引自《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上編》，頁6-7。

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282。

⁶淵明認為自己肩負上天重大的使命而來到世上，自小學習聖賢哲人的經籍教訓。因此自己此生必定要對國家忠誠、對長輩孝順，在鄉里間講信用、修仁義。立身處世願以忠誠之心獲得任用，絕不矯情做作以博取美名。自幼至老，陶淵明都沒有忘記自己的初衷，游好六經不僅是少年的喜好，也是一輩子的堅持。

儒家的孔子是中國文化精神方向的決定者。他的偉大，在於其以生命真切實踐他的理想與信念。從早期的從政，中期的周遊列國，至晚期的文化著述及教學，都表現他對理想的實踐與執著。可以說孔子畢生所為，皆在弘揚道統。⁷儘管處於極為困厄的處境，也有充足的信心與勇氣去堅持著道德標準，不被惡劣的環境所擊潰。孔子曾經在陳國絕糧，當時跟隨的弟子都生了病，起不來，子路面露慍色去見孔子，對這種窘迫的處境提出質疑，孔子回答他：「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⁸君子在窮困的時候能安守節操，小人窮困了就會為所欲為。越是險惡的環境，反而越能考驗出一個人品格的優劣。而且孔子也曾說過：「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⁹讀書人是立志行道的，倘若貪戀著美好的物質享受而不注重品學的精進，那這樣的人不足以跟他談論學問。孔子甚至說：「朝聞道，夕死可矣。」¹⁰這句話來強調生命的意義在於道德理想的完成，若是為了實現理想，犧牲生命也是值得的，何況只是甘於貧賤呢？這種精神亦即日後淵明所推從奉行的「君子固窮」。

自幼愛好六經，深受儒學薰陶的淵明深受孔孟學說的影響，也在若干詩文中表現出「君子固窮」的思想，如其詩作〈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云：「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¹¹孔子是陶淵明極為欽佩的聖人，也是他學習效法的楷模，所以他尊為先師，可見孔子在他心中地位非凡。孔子所說的諸多關於君子義理的箴言，淵明奉為圭臬，時時在其詩文中體現出來，可見儒家安貧樂道、君子固窮的思想早已深化為淵明人格特質的一部份。梁啟超認為陶淵明：「一生品格立腳點，大略近於孟子所說的『有所不為』、『不屑不潔』的狷者。」¹²淵明對個人道

⁶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432。

⁷ 王邦雄 等撰，《中國哲學史》(台北：里仁書局，2005 年)，頁 55。

⁸ 程樹德，《論語集釋》，頁 1050。

⁹ 程樹德，《論語集釋》，頁 246。

¹⁰ 程樹德，《論語集釋》，頁 244。

¹¹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203。

¹² 梁啟超，《陶淵明》，頁 18。

德極為看重與堅持，立身處世以儒家標舉的「道」為準則，〈榮木〉一詩云：「匪道曷依，匪善奚敦？」¹³依於儒道、歸於至善是其理想。淵明晚年所作〈詠貧士〉組詩，可視為他為安貧樂道的人生所下的注腳，〈詠貧士〉其四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淵明從古代固窮守節的志士身上學習、仿效其作為，遵循孔子「君子固窮」的教誨，贊頌黔婁等貧士固窮之精神，明確表示出「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詠貧士〉其二）¹⁴、「誰云固窮難？藐哉此前脩」（〈詠貧士〉其七）¹⁵。用他們的高尚情操來安慰自己，勉勵自己，這種強大的精神力量使他像歲寒的松柏一樣傲世獨立。因此淵明稱讚榮啟期「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詩〉其二）¹⁶，正是淵明對自己人生的寫照。

第二節 道家的自然思想

淵明的詩歌，與人一種濃厚的親切自然之感，仔細分析其成因，段幼平認為「他的詩歌貼近生活，充滿真情實感。其中對『真』的抒寫，不僅體現他對平淡自然風格的追求，也包含著他豪華落盡之後對生活真諦的領悟，對宇宙人生的哲學思考，更是他率真人格的真實體現。」¹⁷所以，「真」此一字眼與意象，大量出現在淵明的詩歌中，如「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勸農〉）¹⁸、「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¹⁹、「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²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其五）²¹、「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感士不遇賦〉）²²，這些文例都顯明「真」這個字詞大量地出現在淵明的詩文之中，故陳怡良云：「真即自然率真，真誠表露，講求真心誠意，至

¹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3。

¹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66。

¹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77。

¹⁶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40。

¹⁷ 段幼平，〈略論陶淵明對「真」的人格和美學追求〉，《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江西：九江學院)，2005 年第 4 期，頁 10。

¹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34。

¹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25。

²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80。

²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247。

²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31。

情至性，反對任何虛偽與矯飾。陶淵明在詩文中，經常提到『真』，即是『自然』。²³然而此一「真」或「自然」的概念，卻鮮少出現在儒家典籍中，而大量出現在《老子》、《莊子》等道家經典中。如《老子·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²⁴其第七章復云：「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²⁵其三十四章又云：「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²⁶此三者綜合而論，即在強調自然力量的無所不在，及其可長可久的最高性。此種自然反映於具體世界中，故《莊子·繕性》云：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²⁷

莊子強調只有自然，而沒有人為知識干擾的遠古時代，才是完滿純一的境地。老、莊皆強調源於自然的真，方是萬物最佳的運行法則。因此莊子描繪古代理想世界的居民則云：「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²⁸當去除了人類的一切認知與感受，生命固然可以無憂無夢，還原最真的境界。淵明嚮往於道家所描述的上古社會，當時民心自然淳真，毫無造作。此心願所以歸於道家，主要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相關。淵明為了實踐理想曾數度出仕，但卻親身經歷士大夫階層的虛假詐偽、驕奢淫逸，社會道德淪喪，人性受到扭曲，因此發出深沉的感嘆：「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²⁹對於當時士風敗壞，鑽營奔走的情形厭惡至極，冀望人性能回歸真樸自然，社會回復善良風俗。他由衷讚美上古人民的生活，認為他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³⁰，懷抱著最純樸的本性過日子，不需要爾虞我詐、勾心鬥角。道德的淪喪乃因為「巧智既萌，資待靡因」³¹，機心巧詐使人民不復純真，所以他渴望成為上古之民，如〈與子

²³ 陳怡良，《田園詩派宗師—陶淵明探新》（台北：里仁書局，2006年），頁355。

²⁴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64。

²⁵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19。

²⁶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85。

²⁷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550-551。

²⁸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228。

²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431。

³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34。

³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34。

儼等疏〉云：「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³²

〈五柳先生傳〉亦云：「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³³這些文字在在呈現出淵明期盼回復上古社會純樸生活的主張，也就是「自然」。

故「自然」為道家思想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自然」的內涵卻不易說明，強為言之，概可分為兩種意涵，就廣義說，所謂自然指的是具體的自然界；就狹義說，自然指的是萬物本身各自盡其性的自然狀態。³⁴王弼注《老子·第五章》云：「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³⁵郭象注《莊子·逍遙遊》云：「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³⁶由以上引文可知，宇宙萬物的運行是順任自然而變化，自然就是道的最高表現。道體的自然運行，乃為人所必須依循的法則。淵明生在道家思想極為流行的時代裡，理所當然接受過老莊思想中道法自然的觀念。〈歸去來兮辭·序文〉云：「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³⁷淵明自言稟賦自然，兼受道家思想之影響，故而一生愛好大自然，畢生行事也以不違反自然純樸的本性為依歸。因此〈歸園田居·其一〉則云：「少無適俗願，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³⁸等語，淵明自認是個生性愛好自然的人，自幼便無意追隨世俗潮流。其出仕為官，雖為經濟所迫，然終究不合其本性，因此仕宦生涯被他稱之為「誤落塵網」，可見淵明實在無法適應不得自由、徒為五斗米折腰的生活。

詩人羨慕著游魚與飛鳥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終究還是選擇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中，過著簡單純樸的生活。雖然物質生活匱乏辛苦，但精神生活卻能愉悅悠閒。淵明此詩表明對過往仕宦經歷所受束縛的厭棄，以及追慕自然態度，這是因為在大自然當中他可以擺脫人世間社會的強制與拘束，過著與自然契合的生活。因此歸隱於田園讓他感覺自己「復始為人」，不再像隻籠中鳥、檻中猿那般不得自由。順應自己的本性回歸自然，也是向天道回歸。這種思想在仕宦期間便已顯現於詩文，如〈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所云：「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

³²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29。

³³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02。

³⁴ 郭銀田，《田園詩人陶淵明》(台北：桂冠，1975 年)，頁 172。

³⁵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 13。

³⁶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0。

³⁷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60。

³⁸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76-77。

慚高鳥，臨水愧游魚。」³⁹〈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亦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⁴⁰可見淵明思想中受老莊自然思想的影響是既深且遠的。

恢復自然，表現在道家的政治思維裡，便是小國寡民的社會結構，故《老子·八十章》云：「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⁴¹

《莊子·胠篋》云：「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⁴²老子、莊子皆認為理想的社會，除了有足夠百姓安居樂業的環境外，最好與鄰國互不來往。這樣設計的用意，或許即出於《老子》中，「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⁴³的構想，讓人民免於戰爭殺伐的威脅。淵明的〈桃花源記〉中，即依此提出了他理想社會的藍圖，文云：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44

〈桃花源詩〉亦云：「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⁴⁵可見淵明理想中的桃花源境確實脫胎於老、莊道家思想中的小國寡民架構。此外，除了避免紛爭發生的小國寡民結構外，還有無為而治、不擾民生的理想。《老子·三十七章》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⁴⁶《莊子·天地》云：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何故也？」

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

³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80。

⁴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191。

⁴¹ (魏)王弼 注，樓宇烈 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 190。

⁴²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357。

⁴³ (魏)王弼 注，樓宇烈 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 8。

⁴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79。

⁴⁵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480。

⁴⁶ (魏)王弼 注，樓宇烈 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頁 90。

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挹
挹乎耕而不顧。⁴⁷

人民只要順著自然四時的運行而耕作，自能衣食無虞。因此道家主張人民不需要統治者，以及統治者所訂定的法令。此外，淵明所描繪的桃花源境，又恰恰與他所處的現實世界截然不同。桃花源境的社會結構不僅脫胎於道家的思想，部分也出於對現實無奈之抗議。可以說，桃花源境是淵明以他的生命體驗為基礎，融入道家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並通過他心中的自然情致與人文關懷，所營造的清新天地。

除了回到自然田園的生活環境外，順服於天道變化也是追慕自然的又一表現。《莊子·大宗師》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⁴⁸人要明白生命中的一切遭遇，都是大化運行的無心顯現，非天地有所偏私，能領悟這個道理便可謂知命。能知命則能安命，順應天命的安排而置身其中，不去強求徒增煩擾。淵明既已體認天地間運行的法則，必須因任自然各安其命，否則便會被人世間社會的紛亂所干擾而煩惱痛苦，因此他也漸能看清生命的本質，對於不合理想的現實世界處之泰然，從而獲得超脫的愉悅與自由。是以他對生死問題以達觀的方式看待之，合於莊子思想，《莊子·大宗師》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⁴⁹莊子認為生死是人生的必經過程，生死不過如晝夜之輪替，又何足懼焉？生原為寄，死乃是歸。莊子所云「生寄死歸」的思想影響淵明甚深，反映於其〈自祭文〉所云：「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⁵⁰、「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⁵¹可知在生死問題上，淵明是以道家思想的觀念來自我回應。

陶淵明質性自然，一生行事瀟灑率真，從不願為迎合世俗而扭曲自己。蘇軾極為推崇陶淵明，曾云：「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⁵²一語道破淵明的

⁴⁷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423。

⁴⁸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86。

⁴⁹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41。

⁵⁰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55。

⁵¹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556。

⁵² (宋)蘇軾，〈書李簡夫詩集後〉，《津逮秘書·卷三》，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合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上編》，頁 33。

率性自然，乃在於「真」這一「古今貴之」的性格。淵明順應自然本性作出仕隱抉擇，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一生任真自得的生命情態，著實呈現老、莊思想的人格典範。

第三節 佛教思想

陶淵明所處的東晉時代，佛教在中國已頗為興盛，湯用彤看待魏晉思想的發展時，將魏晉思想分為「正始時期」、「元康時期」、「永嘉時期」、「東晉時期」四個時期，認為東晉時期亦可稱「佛學時期」。⁵³東晉時期何以佛教得以在中國發展起來，陳慶元認為：「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歷史上長時間處於動盪的時代成為了佛道二教孕育的溫床，儒家學說對內在的修養與提升和外在的行為與秩序有直接的助益，但對於不可知的世界與難以捉摸的命運卻無力解答。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知識份子乃至於平民百姓都試圖尋找解答或解脫。.....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把眼光轉回東晉，就可以發現東晉時期的宗教之所以在民間至士人階層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最大的因素當然是動盪的時局下不確定的環境所造成的無常感。」⁵⁴在這種艱困時局下，人民往往需要某些精神寄託以彌補現實處境所帶來的痛苦與不滿，因此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認為：

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⁵⁵

一般民眾感於現實的壓力而選擇宗教信仰作為心靈慰藉，東晉時代新興的佛教自然是吸引這些人的潮流，無論是知識分子或社會大眾對此皆有需求。然而兩者面對佛教思想的態度卻又有不同。寧稼雨認為：

士族佛學所關心的主要是佛教中的教理和教義，而不大關注佛教作為宗教

⁵³ 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附錄：魏晉思想的發展〉，收於《魏晉思想（乙編三種）》（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頁136。

⁵⁴ 陳慶元，《東晉士人階層玄佛道思想與文化研究》，頁117。

⁵⁵ (德)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收於中共中央編譯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56年），頁453。

的教主崇拜、教規組織形式，以及修煉方式等。換句話說，它主要是佛教哲學作為意識型態的『學』，卻不是作為宗教的『教』。……士族佛學在本質上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宗教，而是一種寄託士族文人精神理想的觀念和信仰。⁵⁶

因此東晉士人對宗教的投入之初或與一般百姓無異，他們顯然是在面對多難的環境下無所適從與無可奈何的心態而轉入了宗教的境地，但士人所關注的終究是理論的建立與理想的實踐。

陶淵明其詩文與佛教思想存在何種關係，陳寅恪認為：

凡研究淵明作品之人莫不首先遇一至難之問題，即何以絕不發見其受佛教影響是也。以淵明之與蓮社諸賢，生既同時，居復相接，除有人事交際之記載外，其他若蓮社高賢傳所記聞鐘适道等說皆不可信之物語也。陶集中詩文實來見贊同或反對能仁教義之單詞隻句，是果何故耶？⁵⁷

陳寅恪解釋就東晉時代士人的情形來看，其與佛教的關係可分成三種：第一種是家學風氣本為天師道信仰，因而在立場上堅決反對佛教，如作《神滅論》的范縝；第二種是捨棄天師道信仰而轉就佛教者，如梁武帝蕭衍；第三種是調和道、佛兩教，兼採兩方學說，不盡棄家傳之天師道，亦不全然否定外來之佛教者，如南齊之孔稚珪。⁵⁸陳氏認為陶淵明與佛教關係當屬第一種類型，即反對佛教者。如若其然，恐怕淵明應當也不會與蓮社中人有所往來，這點筆者持保留態度。

然無論如何，淵明詩文作品與佛教思想似較少有直接聯繫，不過其詩文中的用字遣詞，在某種程度上似又受到佛教影響。何劍平在〈陶淵明的詩歌創作與晉宋佛教之關係〉提出幾個文例，用以說明這些詞語源於佛教經典，如「幻化」、「空無」⁵⁹，何氏以為源出無羅叉所譯《放光般若經》以及鳩摩羅什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⁶⁰；「我」⁶¹，何氏以為出於佛教思想中的「我」及「我所」⁶²；「無心」

⁵⁶ 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2003年），頁347。

⁵⁷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收於《金明館叢稿初編》，頁217。

⁵⁸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收於《金明館叢稿初編》，頁218。

⁵⁹ 〈歸園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⁶⁰ 何劍平，〈陶淵明的詩歌創作與晉宋佛教之關係〉，《普門學報》（台北市：佛光山文教基金會），15期（2003年5月），頁21。

63，何氏以為出於支婁迦讖所譯《道行般若波羅蜜經》⁶⁴；淵明〈雜詩·其一〉所云：「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乃是化用於《維摩詰經》：「是身無作，風力所轉」諸語⁶⁵；又〈雜詩·其五〉所云：「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是源於佛教的「現在不住」觀念，陶詩所云「壑舟」，出於《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⁶⁶「壑舟」之喻與佛經所云「現在不住」的時間觀念頗相似，且常為東晉南朝文人所習用。⁶⁷由以上諸例可窺見淵明縱然在個人思想上難言與佛教思想有密切關聯，但是在詩文創作上可能或多或少有從佛教典籍、用語借取其詞彙與觀念，如以此種角度詮釋，淵明詩文亦別有可玩味者。

第四節 融合成自我一家的思想

由前三節的討論來看，陶淵明在思想上確實深受儒家文化與道家思想的薰陶，同時也部分受到佛教教義的影響。他透過豐富的學養與一己的生命將儒、道、佛三家加以調和融通，將之表現於詩文作品中，體現於世，時時流露出有別於東晉時人的思維，淵明之思想置於東晉南朝，可說獨樹一格。

陶淵明自幼熟讀儒家典籍，受儒學薰陶成長，儒家思想成為他生命中人格養成的重要指標，終身都在追求人格的完美與理想的實踐。儘管日後面臨官場的混濁黑暗，儒家思想中要求完美人格也成為促使他歸隱以求獨善其身的其中之一。而另一方面，稟賦所生就是質性自然、恬淡寡欲的個性，自幼成長的環境又是不受拘束的鄉野之間，養成他嚮往逍遙自由的生活，所以少年時期的陶淵明既心懷濟世之壯志，又具有愛好山林自然的天性，這兩種思想長期以來便深植於其內心當中。然而由於家境的窘迫，以及更重要的原因，亦即實踐兼善天下的理想，淵明進入官場，展開長達十幾年的仕宦生涯。滿心懷抱著效法聖賢風範的夢想，卻

61 〈飲酒詩·其十四〉：「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62 何劍平，〈陶淵明的詩歌創作與晉宋佛教之關係〉，頁 3。

63 〈歸去來兮辭〉：「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64 何劍平，〈陶淵明的詩歌創作與晉宋佛教之關係〉，頁 4。

65 何劍平，〈陶淵明的詩歌創作與晉宋佛教之關係〉，頁 6。

66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44。

67 何劍平，〈陶淵明的詩歌創作與晉宋佛教之關係〉，頁 8-10。

發現真實的官場並不如想像中美好，這時淵明的內心常常出現現實與理想兩者糾結交錯的矛盾。淵明心中儒家的入世志願與道家的自然本性產生劇烈衝突，讓他數度仕宦而又去職，擺盪在自我實現的意識與人格精神的完整之間，掙扎許久，難以定奪，因而產生「遙遙從茲役，一心處兩端」⁶⁸之感慨。

陶淵明固然希望實踐濟世天下的理想，但這也必須建立在人格的獨立自由之上，他不願意為五斗米而折腰，不願意為了違反自己心中的儒家精神而屈從於世俗風氣，其對自我的操守要求相當嚴格，乃以「君子固窮」勉勵自己。淵明後辭彭澤令，終於擺脫仕宦生活的枷鎖，保有精神生活的獨立完整，看似簡單的抽身，實則經歷一番艱難的自我調適，正因儒、道兩家思想並融於胸中，使其雖在官場，仍能保持自然本性。隱居後的陶淵明之所以能固窮守節、安貧樂道，儒家思想是支持他的巨大力量，同時老、莊的自然思想更是幫助他超脫生命中的困頓挫折，使淵明晚年寄情於田園當中而怡然自得。

從淵明的生命歷程來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講求積極入世，終其一生致力於實踐經世濟民的理念。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卻是追求逍遙自適，關注焦點在於歸返自然。因此儒、道兩家一直以來都是影響陶淵明生命的兩股巨大力量，自少至老，陶淵明生命軌跡呈現儒、道兩家隱顯交替於胸中的變化。因此少年時代是「猛志逸四海」，中年以後卻「有志不獲騁」，因此淵明的思想一方面是本於儒家的有為入世，卻歸於固窮守節的隱逸作風；一方面是本於道家的無為自然，卻以田園躬耕作為寄託。其展現的思想特色不同於當時儒、道兩家思想在社會選擇上的面貌。儒家思想是積極入世的，以天下為己任，關注的人生課題在如何建構和諧有序的社會，終極目標是實現大同之治。但是淵明在仕途上屢受挫折，難以實踐自己的理想時，他選擇以隱士的方式固守自己的儒家精神，而非但為出仕便捨棄風骨節操。道家思想是消極避世的，崇尚清心寡欲，關注的人生課題是如何安頓一己的生命，從倒懸的痛苦中解脫出來，返璞歸真。淵明對道家的主張並非全盤接收，他固然崇尚自然，但他的自然是融入了日常生活、心靈歡樂、審美感受的自然。這使得淵明的自然多了一份親切，而非莊子其自然思想的玄奧。淵明用這種態度來面對他的際遇，看待他的生死，便形成一種委運任化的人生態

⁶⁸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356。

度，讓他在面對人生種種順逆之境時，皆能淡泊看待、坦然面對。儒、道兩家其思想看似不同，但是淵明卻能取己所需加以調和，融會而成自己獨特的思想風格。因此鄭安森認為：

儒家的積極進取，希冀求善的道德觀，與道家的守柔自保，返璞歸真的陰柔思想似乎是相對峙，但陶淵明卻吸取了兩家的菁華，以善養真，以陽剛的性格克制真的濫施，以陰柔的性格烘托出儒家的守善，二者互為調和、補充。⁶⁹

淵明身處於儒家式微、道家大盛、佛教新興的時空環境下，對於儒家文化選擇以刻苦的「君子固窮」來實踐己志；對於道家思想則以「復返自然」的態度而有別於當時清談作風；對於佛教教義則或取其詞語入其詩文，以體現自我對生命與世事的感悟。此三者構成了淵明遊於儒、道、佛三家卻獨立自成一家之思想特質。

因此淵明在〈形影神〉組詩中表現了自己對生命的獨到見解，在〈形贈影〉詩中，其云：「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⁷⁰這是說萬物必有形體，而形體必有消亡之時，故「形」羨慕天地山川之不化，意謂壽命有限的人羨慕壽命無窮的自然，這是常人一般的想法；在〈影答形〉中，則云：「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⁷¹這是將「影」代指「名」，亦即影隨形滅，猶如名從身亡，但是透過自身的努力，便能使名聲在形體消逝後繼續流存，這是士人名教的思維；在〈神釋〉中，其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⁷²這是說不以早逝為苦，亦不以長壽為樂，不以名盡為苦，亦不以留下名聲為樂。如此則「形」、「影」兩方之所憂，亦不復存在。因此「神」所代表的正是陶淵明個人對世間俗常與魏晉名教兩種人生觀的反思，從而塑造出自己對人生的獨特態度。

⁶⁹ 鄭安森，《陶淵明思想研究》，頁 367。

⁷⁰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59。

⁷¹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64。

⁷²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頁 67。

第五節 小結

陶淵明的思想可分成三個部分來討論，第一是儒家的入世思想，第二是道家的自然思想，第三是佛教思想。淵明自幼受到環境影響，因此儒家經世濟民的理念深深影響他的人生目標。然而仕途不順，且在遊宦的過程中屢見官場上不堪入目之諸多情況，致使淵明選擇以退守士節、君子固窮來實踐其儒家思想。同時淵明在詩文中體現的任真自得，一方面是他本來心性便喜愛自然，另一方面也是對現實失望而寄情於此，然而淵明並未就此遁世離群，他選擇歸隱於田園，將生活範圍由世人階層轉向於鄰里農民，因此淵明在詩文中的自然思想沒有太多玄奧的哲理，反而增添了許多與人互動之情誼；沒有山林間冷酷寂寥的意象，反而是田園生活中自然而然的的面貌。淵明的詩文中雖然沒有佛教思想明顯的痕跡，不過他詩文中的一些詞語可能與佛教不無關係。要言之，淵明身處於儒家式微、道家與盛、佛教新興的時空環境下，對於儒家文化選擇以「君子固窮」來實踐己志；對於道家思想則以「復返自然」的態度，有別於當時清談作風；對於佛教教義，則或取其隻詞片語入其詩文，以體現自我對生命與世事的感悟。筆者認為此三者構成了淵明遊於儒、道、佛三家卻獨立自成一家之思想特質。

第六章 結論

陶淵明在史書上的傳記資料透露出他在性格上的三種表現：第一種是他的不屑官場。在他說道他不願為了區區五斗米的薪餉就向官場文化屈服時，陶淵明恐怕是中國文人裡第一個這麼說也這麼做的人，他的事蹟讓後代文人在仕途不順或厭倦官場文化時，得以擁有一種精神上的支持與奧援。第二種則是他的率性真實，陶淵明過著隱居生活並不是矯情以博取高名，也非圖謀所謂終南捷徑，別人帶著酒來拜訪他，他喝完睏了想睡覺就直接趕客人回去，表現他的真率。他的官員朋友來拜訪他，他也不違本性只是順著自己愛喝酒的性格行事，在精神上全然地無拘無束逍遙自由，而這也是後代文人在尋求烏托邦式的典型人物指標時，不由得就會想到他，期盼自己在生活上也能或多或少仿效他，這也是陶淵明備受推崇的原因之一。第三種，是他的政治認同原則。陶淵明在南朝劉宋取代東晉王室之後，就不再以新的政權的年號用以紀事，只採天干地支的方式記錄。這項特點說明陶淵明是一個雖在隱居但是仍有自己價值標準，他不認同新政權不肯改換年號，而這樣的風範正如同改朝換代之後的遺民一樣，遺民未必認同新的王朝，因此他們以很多方式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諸如不仕官、不用新年號等，從這點來看，陶淵明可說是一種典型人物，與其詩作唱和，其實也正好反映出自己的堅持與不苟俗流。學者以為淵明性格可謂「簡約玄淡，不滯於物」，反映出其所以能不屑官場，主要也是率性所致，因為率性所以難以適應虛偽的官場仕途，渴望純樸無爭的自然田園生活，從這點來說，不屑官場與率性真實是一體兩面的。

就陶淵明的詩作而言，可分成飲酒詩、田園詩、詠懷詩、詠史詩等等主題類型，在淵明的詩作當中，「酒」自是當中一個重要的象徵物，如以酒命題的〈飲酒〉二十首、〈止酒〉、〈述酒〉，或詩題與飲酒行為相關，如〈連雨獨飲〉，或詩文內容與飲酒關係密切，如〈九日閑居〉與〈己酉歲九月九日〉皆是在重陽日飲酒、〈蜡日〉則於歲末飲酒等等，或於序文中顯露出酒作為詩意起因，如〈停雲〉。筆者將這些詩作歸於飲酒詩一類加以討論分析，除〈述酒〉一詩其與飲酒之關係較不強烈以外，總合而論，此類作品多是因酒起意，飲酒為樂之作。〈飲酒〉二

十首可謂是陶淵明飲酒詩之代表，詩中既有哲理者，亦有見諸性情者，或憶過往艱辛，或滿足閒適於現在生活，其內容是多樣性的。由〈飲酒〉詩諸首的思想脈絡來看，陶淵明之道家思想的展現，是因為儒家志向的不得行。總結而論，飲酒詩題材在陶氏詩作裡最主要的代表自是〈飲酒〉二十首，當中可略分為陳述與友飲酒賞景之樂，以及回憶人生過往、尋思人生志向這兩方面，其他飲酒題材之作亦大多可依此脈絡歸納之。就陶淵明之飲酒而言，從其詩作中可看出，獨飲則為沉思，與眾人共飲則言歡。淵明飲酒主題的作品除〈述酒〉一詩為政治隱語之作，〈止酒〉或為遊戲之作外，其他詩作多為因酒寄情，由此可見陶淵明性情真摯的一面。

陶淵明的田園詩作品，其內容大抵為紀實躬耕生活、描述田園風光，亦不乏言其現實的一面，如災荒乏食之悲痛。然陶淵明這些作品裡無論所處境遇為順或逆，他都勉勵自己當仿效古代隱士一樣過著質樸的農耕生活，反映出他經過出仕為官的生涯後，對於官場的厭惡，而一心嚮往於真正屬於自己的田園生活，因此無論遭受怎麼樣的困難，他始終以固窮守節、安貧樂道來要求自己。陶氏的田園詩除文字上的風景描繪堪比魏晉山水詩以外，其在詩文內對於君子固窮的精神意志之展現也是不可忽略的。

陶淵明的詠懷、詠史詩作品，其內容而言，多為詠人物或懷古抒情，詠人物者，或為讚賞其人行事氣節，或以為當有適足效法自勉者，對陶淵明而言，以古代賢人隱士之事跡來勉勵自己保持志向，是使其於貧困生活裡維持其固窮守節意志的精神食糧。世間如遇陶淵明境遇而猶能固窮如此者幾希？也因為在陶淵明的時代，世人多馳車走馬尋求富貴，而無有問道於津者，因此陶詩詠懷古人，蓋亦出於與古人為友，慕其節操風骨而有感而發。

陶淵明其他主題之詩，或為因事而以詩記之，或為讀書感想而以詩記之，或無特定主題而作之者。由上述可知，雖然有些詩作從詩題或詩文旨趣難以歸類其目，然陶淵明飲酒之樂、田園之景、懷古之情、閑居之思、飄零之感等，也或多或少雜入其中，想要仔細而精確分類言之，似是不易完成之舉。筆者處理陶詩的分類工作時，依詩題的記述以及內容旨趣上，大略分成飲酒詩、田園詩、詠懷詩三類，然此三類不必然涇渭分明，飲酒當中亦敘田園風景，記田園生活亦兼懷古

代隱士高人，懷古幽情亦或在飲酒之際，相互融合。其實陶詩的一些特點經常揉作散見於其各個詩作而渾然天成。將其分類，只是為求更易窺見陶淵明的旨趣詩意，了解其詩作之所以絕妙處。

陶淵明的韻文和散文作品可分四類，分別為辭賦、記傳文、疏祭文、贊文。陶淵明的辭賦文章有三篇，分別是〈感士不遇賦〉、〈閑情賦〉、〈歸去來兮辭〉。〈感士不遇賦〉為淵明感慨有能士人不遇其時之悲哀，既然不能進為濟世天下，則當退為君子固窮；〈閑情賦〉為淵明以傳統上的閑邪主題所寫的抒情之作，或以為有所寄託於君臣關係；或許抒發對愛情的嚮往。〈歸去來兮辭〉為淵明辭官彭澤令後所作，其文道盡淵明欲歸返自然的心願。陶淵明的記傳文有三篇，分別是〈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桃花源記〉刻劃出淵明心中理想的社會狀態；〈五柳先生傳〉描繪出淵明自我的形象投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為淵明替自己外祖父孟嘉作傳，文中孟嘉的飲酒形象與淵明頗為類似。疏祭文有四篇，分別是〈與子儼等疏〉、〈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自祭文〉。〈與子儼等疏〉告誡諸子當和睦相處；〈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追悼與淵明自幼最為親近的親人；〈自祭文〉以第三人稱記寫淵明自己死後的喪禮，並從中帶出自己對人生的回顧。贊文則有〈扇上畫贊〉與〈讀史述九章〉，文中俱見淵明對古代隱士人物心生慕仰，引以為典範。陶淵明的文章雖然數量不多，但大抵多為述志表意之作，或直言之，或假借情景、人物而寄寓之，從中皆可顯現淵明的志趣所在。

陶淵明的思想可分成三個部分來討論，第一是儒家的人世思想，第二是道家的自然思想，第三是佛教思想。在儒家的人世思想中，淵明自幼受到環境影響，其興趣一直都放在儒家典籍上，也因此儒家經世濟民的理念也深深影響他的人生目標。然而仕途不順，且在遊宦的過程中屢見官場上不堪入目之諸多情況，致使淵明的人世為官的念頭逐漸消退。然淵明並未因此放棄儒家思想，他選擇以退守士節、君子固窮來實踐其儒家思想。在道家的自然思想中，淵明以其詩文體現逍遙自適、返樸歸真的精神，一方面是他本來心性便喜愛自然，另一方面也是對現實失望而寄情於此，然而淵明並未就此遁世離群，與歸於道家思想而匿於山林的隱士不同，他選擇歸隱於田園，將生活範圍由世人階層轉向於鄰里農民，因此淵

明在詩文中的自然思想沒有太多玄奧的哲理，反而增添了許多與人互動之情誼；沒有山林間冷酷寂寥的意象，反而是田園生活中自然而然的的面貌。在佛教思想中，淵明雖然沒有這方面明顯的影響痕跡，不過他詩文中的一些詞語可能與佛教不無關係，這方面也值得學者日後加以探研。總而言之，淵明身處於儒家式微、道家與盛、佛教新興的時空環境下，對於儒家文化選擇以「君子固窮」來實踐己志；對於道家思想則以「復返自然」的態度，有別於當時清談作風；對於佛教教義，則或取其隻詞片語入其詩文，以體現自我對生命與世事的感悟。此三者構成了淵明遊於儒、道、佛三家卻獨立自成一家之思想特質。

參考書目

一、陶淵明集注本

-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王建生，《陶謝詩選評注》(台北：秀威資訊，2008年)
方祖桑，《陶潛詩箋註校證論評》(台北：蘭臺出版社，1971年)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清)陶澍，《靖節先生集》(台北：華正書局，1975年)
遼欽立 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台北：正文出版社，1999年)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二、古籍

- 袁珂，《山海經校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袁珂，《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張懷瑾，《鍾嶸詩品評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越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 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唐)房玄齡 等撰，《晉書》(台北市：鼎文書局，民國69年)
(魏)王弼 注，樓宇烈 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南朝宋)劉義慶 撰；徐震堦 著，《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梁)沈約，《宋書》(台北市：鼎文書局，民國 69 年)
-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 (清)孫彬，《禮記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 (清)郭慶藩，王孝魚 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三、 專著

- 王國瓊，《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台北：允晨文化，2009 年)
- 王邦雄 等撰，《中國哲學史》(台北：里仁書局，2005 年)
- 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合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上編、下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教師、五六級四班同學 編，《陶淵明詩文彙評》(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
- 李長之，《陶淵明傳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0 月)
- 李偉泰，《漢初學術及王充論衡述論稿》(台北：長安出版社，1988 年)
-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
- (德)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收於中共中央編譯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956 年)
-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 唐翼明，《魏晉文學與玄學：唐翼明學術論文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 年)
- (荷)許里和，《佛教征服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
- 梁啟超，《陶淵明》(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 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台北：文津，1993 年)
- 陳怡良，《田園詩派宗師－陶淵明探新》(台北：里仁書局，2006 年)
-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
- 葉嘉瑩，《葉嘉瑩說陶淵明飲酒及擬古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葉嘉瑩，《迦陵文集·第三卷·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年)

葉嘉瑩，《迦陵文集·第八卷·漢魏六朝詩講錄》(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收於《魏晉思想(乙編三種)》(台北：里仁書局，1995年)

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2003年)

錢鍾書，《管錐編·第四冊》(北京：三聯書店，2版，2007年)

四、 期刊論文

賴義輝，〈陶淵明生平事迹及其歲數新考〉，《嶺南學報》(廣州：私立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第六卷第一期(1937年1月)

呂興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論陶淵明的死亡焦慮與因應方式〉，《科技整合研討會論文集》(二)「文學」(1987年)，頁142-143。

王國瓊，〈樂天委分，以至百年——陶淵明〈自祭文〉之自畫像〉，《中國語文學》(韓國：嶺南中國語文學會)，34輯別刷(1999年12月)

何劍平，〈陶淵明的詩歌創作與晉宋佛教之關係〉，《普門學報》(台北市：佛光山文教基金會)，15期(2003年5月)

段幼平，〈略論陶淵明對「真」的人格和美學追求〉，《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江西：九江學院)，2005年第4期

吳國富，〈陶淵明與天人相適的心靈和樂〉，《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江西：九江學院)，2006年第4期

丁振翔，〈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再讀陶淵明〈自祭文〉〉，《思辨集》(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1期(2008年3月)

黃世錦，〈論陶淵明的〈讀史述九章〉〉，《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屏東市：國立屏東教育大學)，37期(2011年9月)

葉常泓，〈「前隱逸」與「後仕宦」的視野遞換——陶淵明宦遊主題中出處記憶的造現〉，《中央大學人文學報》(桃園：中央大學)，49期(2012年1月)

周靜佳，〈陶淵明「飲者」形象的建構--由〈五柳先生傳〉談起〉，《南臺學報》(台南：南臺科技大學)，38卷2期(2013年6月)

林美君，〈試論陶淵明〈感士不遇賦〉的傳承與創新〉，《醒吾學報》(新北市：醒吾科技大學)，48期(2013年8月)

陳成文，〈析論陶淵明〈閒情賦〉〉，《人文社會學報》(台北市：國立台灣科技大學)，10：2(2014年6月)

劉楚荊，〈〈閒情賦〉修辭美學〉，《中國語文》(台北市：中國語文月刊社)，114：6=684(2014年6月)

簡澤峰，〈生的欲求與死的觀照--〈形影神〉的自我辯證與詮說〉，《興大中文學報》(台中：中興大學中文系)，36期(2014年12月)

謝君讚，〈論《莊子》與陶淵明「自然」思想的異同〉，《中正漢學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2015：1(2015年6月)。

劉奕，〈五柳與孤松--陶淵明的文化偶像與魏晉風度〉，《文與哲》(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27期(2015年12月)。

五、學位論文

顏國明，《魏晉儒道會通思想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鄭安森，《陶淵明思想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林昭毅，《陶淵明與隱逸之風研究》(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年)

陳慶元，《東晉士人階層玄佛道思想與文化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8年)

陳國恩，《陶淵明之思想及其田園詩》(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年)

黃巧妮，《陶淵明飲酒詩之意象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林瑞真，《陶淵明的詩歌研究》(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邱俊揚，《陶淵明作品中詩人形象及其修辭現象探索》(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語文

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 年)

王雅華，《陶淵明思想矛盾及其超越研究》(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陳毓謙，《以〈飲酒〉之分析說明陶淵明對道的體悟》(東海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傅怡菁，《論陶淵明之思想及其實踐》(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年)

附錄：陶淵明詩文作品繫年

（採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說法）

中國紀年	西元紀年	作品名稱	陶淵明年歲
晉太和五年	370	閑情賦	十九歲
晉太元五年	380	勸農	二十九歲
晉太元十四年	389	命子	三十八歲
晉太元十六年	391	榮木	四十歲
晉太元二十一年	396	和郭主簿二首	四十五歲
晉隆安元年	397	擬挽歌辭	四十六歲
晉隆安四年	400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四十九歲
晉隆安五年	401	遊斜川	五十歲
晉隆安五年	401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	五十歲
晉隆安五年	401	責子	五十歲
晉元興元年	402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五十一歲
晉元興二年	403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五十二歲
晉元興二年	403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五十二歲
晉元興三年	404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五十三歲
晉義熙元年	405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將軍使都經錢溪	五十四歲
晉義熙元年	405	雜詩十二首	五十四歲
晉義熙元年	405	歸去來兮辭	五十四歲
晉義熙二年	406	歸鳥	五十五歲

晉義熙二年	406	歸園田居五首	五十五歲
晉義熙二年	406	酬劉柴桑	五十五歲
晉義熙二年	406	讀山海經十三首	五十五歲
晉義熙三年	407	連雨獨飲	五十六歲
晉義熙三年	407	感士不遇賦	五十六歲
晉義熙三年	407	與子儼等疏	五十六歲
晉義熙三年	407	祭程氏妹文	五十六歲
晉義熙四年	408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五十七歲
晉義熙五年	409	和劉柴桑	五十八歲
晉義熙五年	409	己酉歲九月九日	五十八歲
晉義熙六年	410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旱稻	五十九歲
晉義熙七年	411	祭從弟敬遠文	六十歲
晉義熙九年	413	形影神三首	六十二歲
晉義熙十一年	415	五柳先生傳	六十四歲
晉義熙十二年	416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六十五歲
晉義熙十二年	416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澗田舍穫	六十五歲
晉義熙十三年	417	贈羊長史	六十六歲
晉義熙十三年	417	飲酒二十首	六十六歲
晉義熙十四年	418	歲暮和張常侍	六十七歲
宋永初元年	420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六十九歲
宋永初元年	420	於王撫軍座送客	六十九歲
宋永初元年	420	讀史述九章	六十九歲

宋永初二年	421	述酒	七十歲
宋永初三年	422	桃花源記并詩	七十一歲
宋景平元年	423	答龐參軍四言詩	七十二歲
宋景平元年	423	答龐參軍五言詩	七十二歲
宋元嘉二年	425	詠貧士七首	七十四歲
宋元嘉三年	426	乞食	七十五歲
宋元嘉三年	426	有會而作	七十五歲
宋元嘉四年	427	自祭文	七十六歲